第七届全国老友大聚会

MAJLIS HIMPUNAN NASIONAL KAWAN KARIB TAHUNAN KE-7

跨峽雙橋迎戰友

成城衆志邁征途

多元团结为正义
存异求同捍民权

BERGABUNG DALAM KEPELBAGAIAN
UNTUK KEADILAN SOSIAL

纪念特刊

2014年 12月 21日　槟州老友联谊会出版　槟城韩江中学大礼堂

Raiya 雷王牙膏 Since 1962

REVIVE

富联【马】有限公司

至诚恭贺

第七届全国老友大聚会

圆满举行

惠存

憶當年壯志凌雲興大業

看今日凱歌動地出新人

第七届(2014年)全国老友大聚会

多元团结 为正义
存异求同 捍民权

Bergabung Dalam Kepelbagaian
Untuk Keadilan Sosial

Unity In Diversity For Social Justice

檳州老友聯誼會 敬贈
2014年12月21日

槟州老友联谊总会
PERSATUAN KAWAN KARIB PULAU PINANG

跨峡雙橋迎戰友
成城衆志邁征途

目录 Contents

1 惠存
2-3 目录
4 大聚会缘起
5 专题论坛缘起
6 筹委会主席陈克昌献词
7-8 大会主席杜乾焕博士献词
9 马来西亚21世纪联谊会献词
10 砂拉越中区友谊协会献词
11 森州老友联谊会献诗/甲州老友联谊会献词
12 雪隆老友联谊会献词
13 柔州老友联谊会献词

专题文汇

14-15 多元族群、语群、教群国的建国之道 / 孙和声
16-17 马来西亚：文化多元共存的困境和路向 / 陈雪文
18-19 马来主权与扶弱政策 / 江伟俊
20-22 “人民主权”，不是“马来人主权”/ 赛胡先阿里博士－李蕙卉译
23-25 新马来西亚：人民独立与公正 / 赛胡先阿里博士－朱进佳译
26-27 创办华校、承传文化、维护尊严 / 莫泰熙
28-30 华教风雨路 / 李万千
31-34 为何团结？如何求同？—论民联三党的结盟 / 王国璋
35-36 重建左翼力量 / 朱进佳
37-39 冷战亚洲枢轴/ 希沙姆丁莱益斯－NK HO译
40-42 奥巴马、ISIL、战争 / 希沙姆丁莱益斯－杨健燕译
43 马来文大会缘起
44 马来文论坛缘起
45-46 Democracy and social justice/ Dr. Toh Kin Woon
47-49 多元族群、语群、教群国的建国之道：英译 / 孙和声－蔡耀成译
50-51 马来西亚：文化多元共存的困境和路向：英译 / 陈雪文－蔡耀成译
52-53 Promoting Ethnic Harmony / 侯亨能
54-55 创办华校、承传文化、维护尊严：巫译 / 莫泰熙－朱进佳译
56-59 “Ketuanan Rakyat” not “Ketuanan Melayu” / Dr. Syed Husin Ali
60-63 Malaysia Baru: Merdeka Rakyat Dan Keadilan / Dr. Syed Husin Ali
64-69 Singapore's “Battle for Merger” revisited/ Dr.Poh Soo Kai
70-71 老爸老妈改革运动缘起

风骨诗篇赤子心

72-74 胡德周老友荣获跨族群“英雄奖”/ 刘道南
75 Samad Said诗选《缝旗颂》《圣洁之火》/ 北雁译
76-77 Said Zahari诗选《所谓“反国家”》/ 北雁译
《决心》《刺与火》《辩证》/ 曾荣盛译
78 《铁窗情》《清明》/ 蔡庆忠
79 《炼狱受难记》/ 杨小黑
80 《春山诗联》/ 春山

文献/会务活动/声明

81 老友会的定位
82 老爸老妈改革运动缘起
83 庆祝三八国际妇女节献词
84-86 柔州老友联谊会
87-88 槟州老友联谊会
89-91 雪隆老友联谊会
92-93 森州老友联谊会
94-95 甲州老友联谊会
96 警惕日本复活军国主义
97 用手中一票，反对各种不公政策
98 吁请废除煽动法令

99 **贺词**

103 **广告**

战歌金曲

106 欢迎战友
107 我站在铁窗边
108 越是艰险越向前
109 坚持一贯立场
110 团结紧/ 团结就是力量

111 **鸣谢**

112 **编后语**

全国老友联谊会联委会主催 · 槟州老友联谊会主办
第七届（2014年）全国老友大聚会

主题：多元团结为正义 · 存异求同捍民权

缘　起

作为2014年度全国老友联谊会联委会轮值主席州，槟州老友联谊会有幸受托主办本年度第七届全国老友大聚会。这项常年聚会活动，自2008年起，每年都由七个成员州属之一负责主办，至今已进入了第七年。

根据往年的记录，受邀出席此聚会的各州老友及相关友会，人数多达千人之众，反应可谓热烈。出席的老友包括来自雪隆、霹州、彭州、森州、甲州、柔州，甚至东马、新加坡和印尼的各方老友们。大家不辞舟车劳顿，即使乘搭飞机，也都赶来参与其盛。

槟州老友联谊会规模虽小，人力财力十分有限，但为了不负众望，仍然义不容辞地接受了承办本届大聚会的任务。此外，为了推进族群交融与团结的工作，本会也顺此筹募一些活动基金。我们相信，事在人为，只要我们秉持多元开放的信念，面向未来，着重加强组织，诚邀友好团体与热心朋友的协助与支持，就有可能办成一场具有槟州多元文化特色、且富有时代意义的盛会。

首先，这场大聚会经订于21/12/2014（星期日）全日假槟城韩江中学大礼堂举行。活动的主要内容包括（1）举办一场跨族群专题论坛，邀请各族社运老将与新秀，前来探讨共同关心的全民国家课题；（2）出版一本内容素质较为充实且多语的纪念特刊以馈赠出席者；（3）举办一场演出节目力求丰富多元的联欢晚宴；（4）提供可让各地老友进行叙旧的午间自由餐（5）推出数辑反映我国人民重要抗争史实的图片与短片展。

为了达致上述目标，一个以拿督杜乾焕博士为大会主席、陈克昌先生为筹委会主席的筹委会团队已经成立。我们希望，槟州内外关心与认同我会上述努力的各方友好们，都能给予筹委会大力的精神支持与物资赞助，特别是光临出席这场全国性老友盛会，以期与远道而来的新朋旧雨难得相聚，话旧谈新，并同友族先进们交流民声国事，齐为促进民族团结与社会进步而尽力。

槟州老友联谊会
第七届全国老友大聚会筹委会　同启

2014年6月15日

第7届(2014年)全国老友大聚会专题论坛缘起：

贪腐霸权下
——人民力量团结之路

进步力量在60年代末期以及70中期年代被削弱及镇压后，进步力量如工人运动、青年与学生运动、左翼政党的力量都被削弱甚至劳工党的注册被吊销。取而代之是宗教的复兴运动，不仅是伊斯兰教，还包括了基督教及佛教团体。

1969年513事件后，巫统通过1971年的新经济政策及80年代的伊斯兰化政策，加强了对马来社会的监控与同化，导致进步政党人民党的发展也因此受到限制。然而，社会的不平等、印裔社会贫穷的问题在80年代，也催生了Alaiga及CDC两个进步组织，即其中两股重要促使组成社会主义党的力量。基于巫统的马来霸权，实行单元化教育及民族压迫的政策，华人社会特别是华团如董总及隆雪华堂也非常活跃，从1982年三结合、1985年华团诉求、1990年两线制、1999年诉求等等。当年的茅草行动也影响了一些华裔学生如理科大学华文学会。至于议题性质的运动如女权运动、原住民运动、反红泥山运动等等也相当有组织性。

1997年金融风暴及1998年烈火莫熄的运动爆发，马来（西）亚社会继1974年后再次爆发群众运动。1998年的烈火莫熄也促使了替阵的成立，替阵在马来（西）亚政治历史上是首次将所有反对国阵的政党团结起来，同时还未准册成功的社会主义党也在替阵参与1999年全国大选，虽然行动党在大选后就退出替阵。除了政党之外，议题性的组织也包括了1999年妇女改革议程（women's agenda for change）、反对医疗私营化的Citizens Health Initiative、17点华团诉求（不过不再如80年代那么有动员能力及代表性）、青年与学生、选举监督运动、5万个要求让园丘工人拥有更好的工作环境签名运动、反对巴贡水坝联盟、影响原住民的雪兰莪水坝等等。

2008年，反对党在有默契（避免三角战）的情况下，第一次否决了国阵的三分之二多数国会议席，也在数个州执政。2008年后再次爆发另一轮大规模并得到青年参与的群众运动如709及428的净选盟世代、绿色运动。除此之外，505大选前，我们也看到了不同议题的联盟如垦殖区之子（ANAK）、归还石油税(royalty)、马来西亚青年团结阵线(SAMM)、大专生团结阵线(SMM)、老爸老妈改革运动、净选盟妈妈、向日葵选举教育、柔南黄色行动小组等团体的出现。

505后，巫统继续玩弄皇室、宗教及种族课题。到底，被压迫人民、追求社会正义的爱国人士、青年与学生、政党、议题性非政府组织及民间团体在经历505后，应该如何行动，继续推动社会改革？

第七届全国老友大聚会筹委会　启
2014年6月15日

命运与共，各族人民团结起来！

陈克昌
暨全国老友大聚会筹委会主席
全国老友联谊会联委会轮值主席
槟城老友联谊会主席

献词

当前世界尽管有许多不平等的事件发生，个别西方大国自恃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超强实力，恃强欺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小国，也尽管国际形势持续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新的摩擦不断发生，新的挑战不断涌现，但和平与发展始终是时代的主题。人类为繁荣进步与摆脱困境，踏上了包容,发展的列车，携手合作，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各种挑战，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

我国已经独立57年，不幸的是国阵统治集团还是死抱着殖民地残留下来的恶法及违背基本人权的高压手段来维持其腐败不堪，威信尽失的政权；更不惜采取种族分化的手段，不断挑起宗教敏感课题来打压少数族群和不同宗教，以通过制造种族矛盾与宗教矛盾来达到其政治目的。

尽管在308和505两届大选国阵经历惨痛教训,特别是马华民政更是兵败如山倒，当权者理应痛定思痛，深入检讨政经文教领域等课题，解决人民生活困境，寻策如何创造有利经济环境，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

但国阵却反其道而行，政治上纵容巫统内的极端派，挑起各种不利全民团结的事件；经济上则提高各种税收，处处维护朋党利益，倒贴拯救连年亏损上亿的马航，普腾汽车，大道局等；贪腐日愈严重，近年的年度国家稽查师报告就透露了各政府部门在采购上，就频频出现以超出市价几十倍的价格来购买器材；一些部门行政首长所涉及的案件，数目更是以亿来计算。

教育向来都是提升人民生活素质、改变建设经济基础的依据。教育归教育,政治归政治,但我国所奉行的却是政治干预，以当权者既得利益为依归，任意解聘学术人员，干涉校园选举和结社自由，大学排名每况愈下，人材不断外流.

多元是我国特色，其多元文化教育更是反映丰富多彩的生活来源。华教在本国已有悠久的历史，也培育出各方面的人材，为国家建设出过不少力量，但却偏偏饱受无尽的摧残。在中国崛起带来无限商机的同时，也掀起了学习华文的高潮，但讽刺的是国阵虽然承认国外多所中文大学，国内华小却长期面对，师资不足、拨款不公及统考不受承认的窘境。

我国是各族人民相互依存、共同发展凝聚而成的命运共同体，每一个族群都是这个大家庭的组成部分；在国家的建设、和平与稳定过程中，各民族都以自己的方式作出了重要贡献。大家都必须获得公平的对待。

我国的建国与发展是一部各民族不断团结凝聚、共同奋进，互相尊重的历史，民族团结是国家发展进步的基石，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为了国家的美好未来，人民必须进一步团结起来，以共同应对贪腐，朋党，种族霸权的挑战，迎接未来国家的改革。我们坚信，时代洪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始终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

民主与社会正义
—— 出了什么问题？

大会主席杜乾焕博士

献词

前言

过去数年来，世界各大城市数以百万计的人们走上街头，大规模抗议存在于政治、经济、与社会领域的压迫和不公。其中有发生在纽约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中东埃及、利比亚、突尼西亚和巴林的起义，曼谷的街头示威，吉隆坡由净选盟发动的街头示威，以及香港的占中行动。所有这些跨越全球的大规模群众发泄不满和挫折的事态原因何在？其答案或可在以下表述中找到，即：**事关 1% 源于1%为了 1% (of the 1% by the 1% for the 1%)**。上层与下层社会之间在财富、收入与谋生机会分配上的不平等，造成差距继续扩大，肯定是导致抗议者中对各自社会失去希望的主要原因之一。汤姆斯皮克迪在他的名著《**21世纪的资本主义**》一书中，就已确定所有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一不平等趋势。他在其研究中所累积的丰富数据，确认10%的上层社会拥有50%，在一些国家甚至高达90%的**财富**，其中包括股票、产业、土地和资金。

令人忧虑的是，这一趋势可能仍将持续，消除贫富差距的希望甚微。富者仍将继续富有，因为他们的财富和机会将代代相传。在许多社会，他们经常施展巨大的政治影响力，即使并未直接拥有权力。他们因此控制了许多国家机关，从而设计出有利于富者和权贵的政策。许多国家的社会不平等，因缺乏表达不满和自由的空间而加剧。

马来西亚的专制寡头政治

在我们国家马来西亚的情况尤其是如此。它长久以来已被描绘成一个推行寡头民主的专制国家。比如这里的财富分配和政治权力，集中在一小撮人（寡头）的手里，他们中的大多数来自巫统，虽不是全部，我说并非全部，担任了许多国家权力机关的首长，如总检察署、警署、官僚机构、司法机关以及马来西亚反贪污委员会，分别掌控了这些国家权力。同样的，一些以马来族和伊斯兰为基础的非政府组织如土权和回教组织穆连会，以及媒体如马来前锋报，都对政策方向施加了相当大的影响力。这些大多以极端和激进种族主义和伊斯兰为基础的影响力之所以得以施展

，只因巫统和那些掌控各种权力机关的头目们为他们提供了施展的空间，这些空间却绝不对那些巫统的反对者而开放。

巫统寡头们自独立以来得以持续掌权，是通过一个充满欺诈、滥权、贪腐、渎职和操弄选区划分的选举制度，以及诉诸霸权来维持。这些寡头不但掌握和操控了政权，他们还滥用这些权力来赞助和扶植资本家们。他们联手通过获取兴建大型基建工程计划、公共设施、准证、和伐木特许权来榨取大量的盈利。

一个阶级分化的社会

和其他资本主义社会一样，马来西亚是个非常阶级分化的社会，它因财富和收入分配的巨大不均而突显了社会的不公平。2007年，国家的基尼系数高达0.46。.在同一年，20%的马来西亚上层家庭拥有51%的国家收入，而40%的下层家庭则只拥有14.5%。这40%的下层甚至40%的中层家庭，还可能因生活费的高涨而负担日益加重。它正逢国库体制的重建，其中涵盖了对贫者津贴的减少或甚至取消。这些同时又伴随富者税务的减少，从而导致有者和无者之间鸿沟的扩大。与此同时，当前国家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高达87%，这显示许多马来西亚的家庭必须依靠借贷以购买基本家用如房子、汽车与电器消费品。这些经济问题，从不平等的加剧到高家庭债务，连同联邦政府国库的危机，都是国家统治菁英管理不当、贪腐、浪费和进行非必须项目挥霍的结果。

寡头统治的争议

面对如此差劲的政府记录，马来西亚人民并非无所作为。无论如何，公民社会与反对党在全国范围所展开的反对巫统菁英的劣政、滥权、社会不公、紧缩不满空间、专制、种族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亲富经济政策的群众性抗争已经涌现、推展和持续了一段时期。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因此，只要那里有不公不义和不平等，那里就会有为争取正义和平等的抗争。

但这些为公平正义而展开的运动要取得成功，一个联合所有对平等、合作、和谐与相互包容拥有共同理想的跨越族群、宗教、地区和性别的广泛人民阵线必须铸成。我对它的铸成充满信心，因为我相信，所有马来西亚人民都要求正义、平等、和平与和睦相处。

坚持多元团结，扬弃种族政策

献词

马来西亚二十一世纪联谊会会长李学智

第13届大选，输了选票的国阵继续掌权。为了挽回颓势，巩固其统治根基，巫统保守派和极端种族主义分子，重复祭出马来人课题，有组织性地玩弄种族主义，把矛头指向华裔及民联执政的州属，玩弄皇权，利用种族与宗教问题制造事端然后嫁祸於人，更有甚者，直闯民联执政州属政府办公楼和议会厅闹场，总之在这期间，种族课题和宗教课题闹得沸沸扬扬，满城风雨，极端种族言论不断涌现；若不是背后有人唆使和庇护，会如此目无法纪，狂妄嚣张吗？

大选前，首相纳吉自诩为“全民首相”，提出“一个马来西亚”各民族平等的理念，在华人社区，许下多少诺言，包括将承认统考。大选后为了赢取马来基本选票和保住基本盘，迫使纳吉在保守与开明之间选择保守，对眼前涌现的破坏民族团结的言论，制造种族关系紧张的局面，听之任之，视若无睹。

原本决定在大选后，取代煽动法令的国家和谐法案则被挪后提呈国会。相反地，煽动法令则被用来对付和逮捕敢怒敢言的反对党议员、专家学者、青年学生领袖、律师、爱国民主人士，等等。还利用司法程序，剥夺议员资格，进而削弱敌对势力，搞垮反对党，压制社会民主改革运动。

从五、六十年代走过来的老友和社运志士都知道，联盟直至国阵政府能执政50多年，靠的是实行反动的民族政策。当时作为主要反对党的劳工党和人民党以及后来组成的社阵，明确地提出了要以民族团结政策还击种族主义政策。

“308”、“505”在野三党组成民联，与国阵一对一对；青年特别是马来青年的觉醒，形成强大的社会改革力量，两次大选结果，打破国阵独霸的局面。让执政当局感受到，种族课题的效应已日渐式微。而人民也在运动中意识到各族人民团结的力量，也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独立前，英国殖民主义者利用种族和宗教课题维持其殖民统治：独立后，历届政府继承其英帝国主义主子的衣钵，实行反动的民族政策，竭力渲染土著和非土著，它大肆叫嚷所谓“马来族特权”，制造民族分裂，挑起民族冲突，转移斗争矛头。

无数事实证明，只有做好各民族的团结工作，才能挫败巫统所推行的种族主义政策。我们高兴地看到，近年来，不少各族专家学者、大专生、社运分子、公民社会组织等，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交流会、座谈会，探讨民族团结问题，有些人还去泰国南部的和平村，倾听老前辈有关如何搞好民族团结的实践经验。

要如何做好各民族的团结工作，首先要确认马来西亚是个多元民族、多元文化、多元宗教、世界上各文明汇聚的国家。各民族都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权益。其次，除了通过各种形式的交流会、讲座会以及参加有各民族出席的民间活动和传统节庆，促进各族的沟通融合外，更重要的是要深耕基层，做扎实的群众工作，宣传组织群众，引导各族人民从自发的参与运动提升到有理念、有方向的自觉斗争。

马来西亚凤凰友好联谊会、各州老友联谊会和马来西亚21世纪联谊会的绝大多数会员，在我国的民族民主解放运动中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年华。今天我们还聚在一起，笑谈风云，关心国家大事，有所作为，与时并进。

贺第七届全国老友大聚会在槟城成功举办

砂拉越中区友谊协会主席
赖子铨

献词

欣悉第七次全国老友会在槟城举行。在此我谨代表砂拉越中区友谊协会全体理事、妇女组、青少团向你们致以亲切的问候和敬意。

全国老友会，肩负凝聚和团结全国各地老友的重大责任。在推动社会改革发展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你们牢记历史赋予的使命和责任，胸怀远大理想并为之不屈不饶的奋斗，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七年来，在不同地区都成功圆满举办了全国老友大聚会。各地老友云集一堂，增进了解，促进情谊。彼此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每次聚会都让我们向前跨了一大步，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历史发展到今天，一切事物都在变。我们要用清醒的头脑，集体的智慧，看清时势，认清方向，再接再厉，继续努力。祝愿全国老友会更加团结，稳健发展与成长，共创辉煌。

各位老友，梦在前方，路在脚下，让我们大踏步前进吧！

森州老友联谊会主席

赵华护

献诗

谨以这首诗与老友们共勉

如果生命的春天重到，
古旧的凝冰都哗哗地解冻，
那时我会再看见灿烂的微笑，
再听见明朗的呼唤——这些迢遥的梦。
这些好东西都决不会消失，
因为一切好东西都永远存在，
它们只是像冰一样凝结，
而有一天会像花一样重开。

～戴望舒《偶成》

马六甲老友联谊会

献词

传承改革传统，终结腐朽霸权

全国老友大聚会已进入第七届了，每届大聚会在各州成功举办，圆满结束，体现全国老友精诚团结的精神。

回顾历史，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马六甲与槟州以劳工党为主的左翼政党，曾在市议会选举中先后夺得乔治市及马六甲市的执政权，槟州更传承先辈辉煌的改革传统，民联在308、505先后夺得槟州的执政权。

马六甲与槟州具有很多共同点，不仅含特有的娘惹文化和多元化的历史古迹。如今，民间团体积极地举办各种文化活动如华乐、书法、武术等，大大地丰富青年学子的精神素养，为培养高品质的新生代创造有利的环境。

时代的进步，人民的觉醒，反对贪腐霸权，要求公平施政的社会运动正蓬勃发展。我们这批老爸老妈们将迎来我国新时代的社会改革运动，为祖国人民终结腐朽的霸权。

盼望老友相聚的盛会，能越办越好！

献词

雪隆老友联谊会会长 黄隆洲

共同携手 向前邁進

非常欣慰今年由槟州老友联谊会圆满轮值承办的第七届全国大聚会，获得全国的老友参与其盛。

犹记七州老友会在期待中相继成立，为延续我们的理想、目标，融入社会与民情接轨、与民间脉搏同跳动，能结合集体的力量，风雨同路地努力奋斗，为社会做出贡献，有所作为。也在本会会友中增强团结、友谊。在互动中发扬三互精神。

因为有一段历史渊源，我们为了共同目标、理想，患难与共，建立了真挚情谊，我们都要珍惜它，发扬光大，让它永葆青春。

历史发展巨轮滚滚向前，我们经历了308的政治海啸、505的改朝换代的全国大选，看到国家的转变，给了我们鼓舞与启示。当民心掀起时，要阻挡是阻挡不了的。可惜还差一步，未能改朝换代。但，我们相信人民起来了，必定是朝向美好的一方进步。

前方要走的路还长，我们要克服弱点，取长补短。“团结就是力量”是我们的座右铭，我们老、中、青要各司其职，各尽所能，为国家、社会人民，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献出我们的力量，愿共勉之。

一个新的时代已降临

柔佛州老友联谊会

献词

花开花谢，流水无情。日出日落，秋去春来……

全国老友大聚会，由南到北，今年落在槟州是第七届了！

预祝大聚会成功举办！

老友曾在我国抗日反殖的人民运动中，征南走北，上山下海，献出了青春和生命！我们打败了日本鬼子，赶走了英殖民侵略者……

我们唤醒了大地，驱散了乌云，一轮鲜红的太阳正在黑夜的尽头升起！

今天，一个新的时代已降临！年青人走出来了，他们从城里来，从乡镇里来，从甘榜里来……

他们就像一阵狂风巨浪，一浪推一浪，后浪冲前浪，前浪也被冲到大街上……

一场又一场轰轰烈烈的人民运动，终于，收复了半壁江山！

我们又进入一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

愿与老友们共勉！

多元族群、语群、教群国的建国之道

孙和声

据知，目前世界上的约70 亿人口，是由好几千种文化群体构成的大千世界，可联合国却只有193个成员国。伸言之，除了极少数个案如日本、韩国、蒙古、冰岛外，绝大部份的国家，均具不同程度的多元族群、语群或教群国。 这是个既存事实。

当一个国家并不是由单一民族或族群、语群构成的，这个国家本应称为多元民族或多元国族国家multinational state；只是，由于受到19世纪以来欧洲国族国家Nation-state概念的影响，这些多元族群或民族国家，依然习惯地被称为国族国家，以至产生许多误会与误导，甚至是悲剧。

不少新兴国家，如大马，还深受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语文、一种文化的国与族合一的观念的制约，而执著于打造族国合一的国家。这不仅不合时宜，在大马，还具有虚伪的成份。说不合时宜，是因为国族国家具有误导性；因为事实上，只有极少数的国家，才是名符其实的族国合一的单一国族国，即如日本、韩国、蒙古、冰岛等，其他绝大部份的国家，皆是多元种族或多元族群国。种族是个人种的生物学概念，族群是个文化性的文化群体概念，至于民族或国族，学术界多认为，是个政治性概念，它常与特定的国土与政治组织结合成国家，如国族国家。

一般来说，一个现代国家总是要进行国族或民族建构Nation-Building的工程；只是，应如何建构国族，则方式与理念不一。大而化之地说，基本上有三种进路，一是着重政治价值与制度的自由主义与个体主义的进路，它突出公民身份Citizenship，也以公民权或公民资格作为国民联系的纽带。而公民资格这种成员资格Membership则是较开放的，也具有较多的自愿性与选择性。这种思路要塑造的是公民型国（民）族主义Civic Nationalism.

另一进路则为强调血统、文化或宗教的族裔性进路，它要打造的是族裔性民族或族群主义Ethnonationalism。这类族裔的国族建构，较具排他性，也富有集体主义与威权主义的成份。历史地看英美加等国，较偏向人人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的个体本位的公民型国族主义。而俄罗斯与二战前的德国，则较偏向族裔性族群主义路向。

至于法国则介于二者之间。大多数国家，也是中间型，即公民与族裔原则的混合运用；只是有些国家较偏向公民原则，而一些则较偏向族裔原则。约言之，是个程度差别的事宜。

不幸的是，在多元族群、语群、教群的大马，则较偏向族裔原则，而非公民原则，且要建立一个以马来回教徒为主体的族国合一的国族国家Nation-State。也就是以马来回教徒及马来语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语文、一种文化的国族建构；吊诡的是，他方面又要限制马来人的信教自由，且又要着重土著对非土著、回教徒对非回教徒的二分法。显见，这是个具有两面性或者说是虚伪的国族建构观。不但自相矛盾也不伦不类。如一方面强调，要用马来语来团结全民，可又不准市面上公开出售非回教的马来文圣经；要把所有的学生放在同一学校中学习，可又要搞回教化，且是单行道的，只有非回教徒迁就回教化或是非回教徒易进回教，可要退出则很难的单向回教化，而非平等的双向交流。在多元族群、教群与语群的大马，这种单边主义，显然有违当代的基本人权与基本公正观。它的实践，只会引起不团结的反效果。较合理、合情的进路，理应是以公民国家Civic State 为理想类型。

也就是，首先要把政治认同与非政治认同区别对待。毕竟，当代自由民主国家

的基本特征，便是多元性。它只要求公民在政治上认同与效忠本国，而不干预公民个体的形形色色的多元与多层次的认同，如不同语文、宗教、文化、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等的多样认同。实则，这也是成熟民主国家的政党政治的基础，如有中、左、右政党或生态环保政党等。

其次，当代文明的国家，均是建立于主权在民的公民资格上的基础上的。国家存在的目的，在于护卫公民个体的基本人权，而非反之。据此，所有公民在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上一律平等，是基本原则。这个无岐视原则，是必须严守的基本。易言之，宪政民主是第一义的认同对象。

其三，只要受到公平与平等的待遇，公民个体基本上，均会以他出生与成长的国土为认同与效忠的对象，实无须节外生枝地搞什么强制认同，特别是单边主义的强制措施，如以国民学校为首选的教育政策。它只会致成岐视性政策，进而引发不必要的不平不满。

其四，与其强调形式上的同在一间学校、用同一种语言上课，倒不如重视学习内容，而非形式主义的同一语言。如马来人皆用马来语（工具或形式）学习回教（内容），可并未因此而削弱了马来回教徒对世界性回教（并非马来人所专有）的认识与认同。同理，华裔、印度裔或泰裔或其他族裔的大马人，各用其母语学习本国全民内容的东西，自也不会损及他们对国家的认同。这种浅显的道理是显而易见的。

实则，公平的母语与教育政策，反而会促进人民对这个国家的认同与效忠。因为，公平待遇有助于强化正面感情；而岐视政策，反而会产生负面情绪。

其五，教育特别是公民教育，应着重教导普世价值与基本人权理念，以便塑造人民的基本的或最低限度的共同价值观，进而以这共同价值观作为国家治理与族际交往的基本守则。如和而不同的宽容价值，非暴力的对话协商，尊重个人，尊重他人或他族的尊严，把彼此视为公民同胞，重视生态环保，维护法制等。

在大马，由于各族新生代均懂得一定程度的马来语，在尊重马来语、巩固母语的基础上，彼此沟通也是不成问题的。实无必要过于强调单一语言的团结作用。

其六，应进行不断的对话，以便塑造一个各族大体上能够接受的分配公正观。毕竟，资源分配或争夺，是族际不和的主因。任何人类集团均免不了会面对这个老大难问题。大体上言，当代社会较着重机会的平等Equality of Opportunity，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等。至于扶弱政策，则较重视授之以渔（技能），而非单纯的授之以鱼（实物，吃了就没了）。只有技能，才是可持续的靠山。

其七，多元族群、语群与教群国，会面对许多挑战；然而，只要人民普遍具有基本的普世性价值观，如把人当人的人权观，便可据此把多元性视为一种提升国民素质的挑战。也就是，人民应具有共同的愿望，致力于使这多元国家，成为一个卓越的国家，如瑞士。只要能实现这个共同愿望，那么，这个成就，这个共业，就能成为国民的共同自豪感之源，这个共同自豪本身，就是巩固国民团结的最佳保障。

其八，实则，从世界潮流的角度看，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 已成为日趋普遍的思潮，愈来愈多国家已把护卫少数群体Minority的权利视为一种基本权利与基本公正，而非单纯的应急措施或务实的妥协。易言之，多元文化主义已非权宜expedience，而是原则，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文明或道德进步的指标度，如欧盟便把能否公平对待国内少数族群，作为加入欧盟的文明条件，若否，就拒绝其加盟。

马来西亚：文化多元共存的困境和路向

陈雪文

文化问题一向来是困扰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难解心事。这是由于在文化方面，他们所面对的并非一般马来西亚人的问题，而实际上是族群问题、政治问题。

马来西亚是一个较为特殊也较为复杂的多元民族国家，马、华、印等主要族群不论在语言、文化、宗教、风俗以及经济与政治地位上都存在着差异，彼此间存有一定的隔阂。建国五十多年来，文化政治化成为马来西亚族群之间交流的最大挑战。族群之间带根本性的文化讨论最终往往都变成了政治讨论，有关问题往往都需要经过政治的途径才得以解决。而每当碰到种族问题，特别是有着不同信仰背景的文化差异时，多元文化的整合问题就变得更难决。

归根到底，政府所推行的以单一族群为中心的单元语言文教政策，与本国社会的多元性本质之间的矛盾，是马来西亚文化问题的症结所在，也是华社与政府关系出现诸多矛盾的主要原因。

1970年代以来，随着“新经济政策”的推行，马来西亚政治社会开始向着封闭性的单元种族方向倾斜，威权政治观念的影子导致国家机制与社会问题的难分难解。在这种有限多元体制下，多元文化的整合被迫向单方向移动。没有足够的政治力量予以制衡，文化力量也就无法展现。再加上这个威权体制掺杂了种族与宗教的因素，问题就变得更为复杂。

除了争取政经权益，华社不断要求政府检讨和采取更开明的态度对待多元文化的需求，和公平对待各族母语教育的发展，但在涉及马来人地位或马来人特权等重大问题上，政府却始终没有让步。

在尝试以瑞士为参照对马来西亚的族群关系与文化共存问题进行远距离观察时，我们注意到，在瑞士这个也是多元种族的国家里，讲德、法、意语的主要族群都以公民身份作为他们超越种族、语文和宗教的认同单位，都能和衷共济地以国家前途为重，优先搞好族群关系和全体国民的生活水平，结果长期来都始终保持相对和一贯的社会安定与族群和谐。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个国家实行所有公民一律平等的民主制度，不把公共政策与种族结合，不搞建立在种族基础上的差别待遇政策。

瑞士各族群虽使用各自不同的语文，但彼此间依然存在着一种国民一体感。这显示出，多语言和多元性的文化认同，并不一定绝对地有碍于国民团结。相反地，在世界各地，无数事实说明，同种族、同语言、同文化，也并非现代社会和谐整合的绝对条件。

对比之下，在马来西亚，建立在单元种族基础上的倾斜政策，经已成为各族文化融和的主要障碍。因此，除了必须摆脱单元思维的桎梏和改变狭隘的文化心态之外，马来西亚在其民族集体身份的建构过程中，能否突出国民身份认同的价值趋向，并提供一种具有较大包容性的空间，以确保各族公民都能进行有效的文化参与与政治参与，便成为我们的最大关注。

1990年代以来，马来西亚进入了殖民性经济结构基本解体、现代性社会结构开始全面形成的现代化发展时期。单元化封闭性政策已经不合时宜。如果继续推行，现代化发展就会出现新的障碍，也难以面对全球化时代的挑战。为了谋求突破和发展，国家政策开始从种族问题转而以“发展”作为其主旋律。“2020年宏愿”的远景概念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被提了出来。其目标是要在一代人的时间内，把马来西亚发展

成一个充分发达的工业化社会，追求国家全面的更平衡的发展，不仅包括经济现代化，还涵盖政治上、社会上、精神上、心理上和文化上的发展，以铸造一个现代的一体化的“马来西亚民族”。这一目标观念的提出，为马来西亚多元族群文化的共存与发展拓展了新的空间。

今天，世界经济科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高速发展，并未使人类文化趋向“合一”，反而朝着多元的方向发展。现代国际社会基本上已不存在单一的文化形态。任何文化单元化的努力，在全球化时代已越来越难以取得成功。

历史告诉我们，正是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与差异性构成了一个文化宝库。没有文化的差异及其多元发展，就不会有今天多姿多彩的人类文化。欧洲文化和中华文化到今天之所以还有强大的生命力，就是因为它们能不断地引进和吸纳各种不同文化的因素，从而使自己不断得到丰富和更新。所谓高山不辞寸土，故能成其大；河海不辞细涓，故能成其深广。

能够承认和尊重差异是构筑人类和谐宽容的生活和发展多元文化的必要条件。不同文化的并存和相遇，必有冲撞，也有交融；既有差异，又有兼容。但不同国家、民族和地域之间的文化发展，又总是以相互吸收与融汇为主导，彼此间的冲突往往并非主要由于文化的原因所引起。

不同文化在交汇碰撞中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它们之间并不是一个同化或吞并的过程，而是通过竞争与相互容纳，形成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的和谐融洽局面。因此，文化融合并不意味着文化合一，而只能是部分接受和相互结合。种族之间、文化之间与宗教之间能否和谐共处，关键在于如何正确看待和处理彼此间的差异。它考验着领导者的智慧、视野、远见、勇气和决心。

“和而不同”的哲理，为人类多元文化的兼容与共存提供了不尽的思想源泉。它所蕴含的那种“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彼此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的包容智慧，不仅有益于各族人民善待彼此的文化，而且也有利于化解族群之间的矛盾。以此观点观察和处理问题，将有助马来西亚加速摆脱文化困境，解决好一系列文化问题。

古往今来，不同的语言、文化、宗教都是各族人民所赖以生存的精神家园。学会处理好各族文化之间的差异，不但是一种社会的政治需要，也是时代发展的需要。

族群关系的改善和文化多元共存问题的解决，深切关系到每一个马来西亚人民，关系到各族群的共同利益和国家的未来。因此，研究这方面的问题不仅必要，而且深具现实意义。

（本文转载自作者发表于2004年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的摘要部分，其中相关年份作了修定。英文版本承蒙老友蔡耀成律师负责翻译。）

马来主权与扶弱政策

马来亚已独立50多年，但是种族主义在马来西亚仍然猖獗，冲击著本就脆弱的族群关系。在政治圈子里，政客不间断的各自诠释种族特权。但总的来说，大马的种族问题，不外是围绕著种族特权（Racial special rights）。

在马来族群里，多数马来人把特权与马来主权（Ketuanan Melayu）等同，声称马来人之所以能享有别族没有的特别待遇，缘由他们是马来西亚最早的统治者，这可从马来文Tanah Melayu（马来亚在独立之前的称呼）中看出一二。因此，这是马来族特有的权益（Rights），为了凸显出本身与其他外来族群地位上的差别，拥有一些特权是天公地道、无可厚非的。

然而，其他所谓的「外来族群」（以华裔和印度裔居多）对马来特权却有著另一番天差地远的了解。普遍上，华裔与印度裔族群的认知里，马来族之能享有较好的福利是後者在经济上相对落後。由於马来族在经济上被抛在後头，需要政府的帮助。当族群之间经济的差距没那麼显著时，特权就应取消。

这套想法与国际间多元种族国家的扶弱政策概念（Affirmative action）同出一辙。印度政府为了解决阶级制下所造成的社会不平等现象，特别制定一些优惠政策（preference）给予弱势族群，类似的优惠政策也出现在美国，以帮助在社会与经济层面都处於弱势的非裔美国人。

为何在「一个马来西亚」的口号下，还会出现各别族群对种族特权有著迥异理解的吊诡现象？而我国的种族特权究竟是属於马来主权还是纯粹只是个扶弱政策？这一切，还得从马来特权的由来开始。

基本上，我国的种族特权的演变大致上可划分为三个主要阶段：1874~1957：被赋予的马来特权；1957~1971：宪法下的马来特权；1971以後—新经济政策下的马来特权。这三个阶段也各分别代表了马来特权的诞生、确认与强化。

1874~1957：被赋予的马来特权

大英帝国於1874年於马来亚半岛成立了殖民政府，为了要降低当地居民（马来人）反抗，赋予马来族群一些特别的权利与享有较优厚的社会福利。马来人成为了英殖民政府录取低级政府官员的首选，但其任务也只是协助传达上级官员（英国人）的决策，毫无决策权。

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英殖民政府引入一批又一批的中国与印度劳工到马来半岛。这也引起了马来族群的恐慌，担心海外族群人口总数将会超越他们以致其政治与社会地位受到挑战。为了缓解马来社群排外的情绪，英殖民政府采用了「分而治之」（Divide and rule）的政策，确保马来特权不会因此而有所改变（请参考1948年马来亚联邦条约）。

总的来说，马来特权是英殖民政府下的产物，也在其约一世纪的统治期间不断的深化。随著时间的流逝，族群之间种种的不平等也变成理所当然了。

1957~1971：宪法下的马来特权

我们不时在报章上或者从政客之间的口水战中听到的「社会契约」，其实是指1957年联盟成员党之间的谈判所达成的协议。在我国独立前夕，许多重要的课题还是悬而未决，如：华族与印族公民权的问题，马来特权的问题等等。

江伟俊

我国的政治运作是采用协商式民主（Consociationalism），因此，联盟三成员党：巫统、马华及国大党，理所当然成为了各自族群的代言人，针对那些关於族群权益的问题展开了一系列谈判。谈判的结果是以承认马来特权，换来华、印裔的取公民权。在三党领导点了点头之後，相关的条文也纳入联邦宪法里。

但令人纳闷的却是，这所谓的「社会契约」的诠释竟出现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版本。原因是出於我国种族政党在政治考量下，各说各话，向各自的族群传达最符合本身政治利益的版本。为了讨好马来社群，巫统领袖延续著马来主权的论述，强调马来特权是马来族天生的权利（Natural rights），不容许其他族群的质疑与挑战。马华及国大党领袖则向各自的社群强调，马来特权只是暂时性的政策。

承认马来人特权只不过是政治上利益的交换，而宪法也仅仅是个政治产物。政治人物不负责任的「交易」，导致了今日各族对马来特权持有不同的看法。

特别地位衍生出的各式优惠，到底是永远的「天赋特权」或临时的「扶弱政策」，当权者为何总是各自表述？

1971之後：新经济政策下的马来特权

政治上的动荡，加上社会长期积累的民怨，引发了1969年5月13日的种族暴乱。在动乱平息之後，紧接著来的是打著「不分种族解决国内贫穷问题」与「重塑我国社会，打破以种族区分职业」为目标的新经济政策。在新经济政策下，国民分割成「土著」与「非土著」两大块，而非土著也被排除在新政策下的优惠措施之外。

为了不使其他族群对此政策太感冒，政府也强调新经济政实施年限为20年。但新经济政策的精神至今未灭！百分之三十的土著股权还是动弹不得。

从以上的种种，不难发觉到马来特权已是马来人原住民身份的象徵。在一个民主国家里，统治权应在全体国民的手里！所谓的马来主权，充其量也只是英殖民政府遗留下的产物，是「赋予的权利」（Given rights），而非所谓「天生的权利」，而其背後浓浓的政治目的也是不言而喻的。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近来政府想要「正视」建国历史，目的不外是想要在历史科目上加入更多马来主权的论述，以让新生代不再质疑其正当性。但是，华裔与印裔族群已迈入第三代或第四代，已经是道道地地、土生土长、彻彻底底的马来西亚人，他们难以认同政策上的不平等。

纵观而言，各族群对於马来特权认知上不同，得归咎於种族政党之间的政治博弈所造成的结果。因此，应是时候停止这扭曲实施的政治论调及操弄，才能摆脱种族主义遗毒。无论马来特权是扶弱政策还是天生的权利，是暂时的还是永久的，当各族没理解马来人与非马来人对种族特权的看法不同时，再多的沟通与对话也将只是鸡同鸭讲，毫无建树。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种族的国家，族群间必须互相依赖、合作，国家才能发展，并与周边的国家竞争。如果政客肆无忌惮的玩弄种族情绪，高呼著马来人的特权，各族群又强调族群自身的团结，无论有多好的惜才留才计划，经济再如何转型，专才的流失（尤其是被歧视的一群）及高收入国梦想的幻灭，势所难免。

（编按：本文于2010年1月7日《东方日报》名家版刊出，随获得撰者授权转载。）

「人民主权」，不是「马来人主权」

赛胡先阿里博士作
李蕙卉译

按语：赛胡先阿里的《马来人：他们的问题与前途》一书引起了我们的关注。我们支持作者在推介礼上所提出的，“马来人主权”需被“人民主权”所取代。

让我从我被囚禁，从而促成我撰写这本书的经历谈起。就如你们当中一些人所知道的，我在1974年12月，因华玲事件的2万5000人饥荒游行而与安华一起在《内安法令》下被捕。当时，超过一千名大学生与职员因为在吉隆坡示威，支持华玲农民而被捕。

在这些被捕的人当中，约有十数名学生，前学生和教授，包括我和安华，被送到甘文丁扣留营。

书写在脑海中

在扣留营度过20个月后，我获承诺将被释放，被送往吉隆坡。不久后，安华也被带到该处，在未满两年的刑期前被释放。但是我却被关进不知名的拘留中心，受到一群政治部队伍的观察和解析长达六个月之久。结果是，在之后的四年里，我继续担任“最高元首的嘉宾”。当然，若与安华的囚禁时间加上他遭革职后的袋鼠审判（英文独有名词，用以形容不公平、存有偏见或草率的审判，并带来严重刑法的裁决），与我遭囚的六年时间相比，安华略胜一筹。

在该不知名的拘留中心，我在数小时内被连环式拷问，有时甚至不能睡觉，有些扮演白脸的角色，有些则不，但真够狠的。我曾被吐痰、侮辱、掌掴或殴打侍之。很多时候，他们把我丢进8x8英尺的暗房。我相信大多数被扣留在甘文丁扣留营达六年之久的人士都曾遭受相同对待。

后来不知怎么的，在他们对付我的时候，我通过以笑脸回应或以一边脸被掌掴时，奉上我的另一边脸颊的方式，使施虐者不再向我吐痰或掌掴。我也学会了只听，而不受他们的威胁语言。我承认，我觉得最困难的是克服被抛入暗房的孤寂感。关于这，我无需再多说，这些我都已在我的《Two Faces》书中尽述。

请耐心地听我继续叙述有关我在孤身一人的暗房中的折腾经历。其中一位高资历的盘问官员骄傲地说他可以摧毁我仅有的东西，我的思想。这是在我不受胁迫，指控拉惹古玛医生之后发生。是的，他们要我指控拉惹古玛为共产主义支持者，并承认我是时任副首相马哈迪医生以及地下共产党员的中间人。

在这我承认，或许当时的内政部长加沙里沙菲依有意确保他能够取代马哈迪成为副揆，然后当上首相。这样的话我们国家就会面对另一种问题了。

有些人问我“你为什么不承认呢？那么你就可以把我们从马哈迪，直至现在的阿都拉手上拯救出来。”我当然不会承认这个这么赤裸裸的谎言。况且，如果我这么做的话，那可能成为当局延长扣留我的藉口。无论如何，加沙里还是延长扣留我两年，因为政治部官员发现我还没有“康复”。

每次我被抛入暗房时，我一定会做三件事，确保我的身心保持强壮。第一，运动，主要是做掌上压以及跳跃；第二，祈祷以及朗诵任何我记得的可兰经经句。第三，唱一些我熟悉的英文和国文歌曲。但是这些都是不足够的。我还要做更多来确保我的思维活跃。

这时我想起了我的朋友拉惹古玛在我被关押早期，通过我太太向我提出的建

议。那就是撰写一本有关马来人价值的书本。但是这个题目太过具有特定性并且需要更多的研究。

所以我选择比较简单的。当我被关进暗房时，我思考并规划这本书。几个月之后，书本中的所有章节的每一页几乎都已写在我的脑海中。

当我被送回甘文丁，从其他被拘留者身边隔离开来时，我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所有时间，因此而疯狂地在三个星期内把所有脑海中的字打出来。你可以看到，这是我这本书的起源。这就是为什么我挑选了我两名敬爱和有声望的朋友，拉惹和安华前来，一名受邀谈论我的书，另一名则推介我的书。

情况在恶化

直至近期的大选，我决定就书本进行更新和修订。我可以说，如今马来人的问题与三十年前，我被丢进暗房时我所看到的几乎无异。只是，在某些方面，马来人的环境已经获得了改善，但是在另一些领域方面他们却恶化了。

的确，马来人当中的赤贫人数确实已经降低；但是相对贫穷，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差异却提高了。的确，更多的新晋马来富人通过政府的发展计划致富；但是财富的集中化以及贪污却尤在高层的马来社会中更甚。许多城镇建起了美丽的道路和不实际，仅为装饰用途的桥梁；反观一些马来村庄的状况却自独立以后维持不变。

的确，如今有更多接受高等教育，并成为成功专业人士的马来人；但是却有越来越多的马来人的道德和伦理价值观下滑至一个让人忧心的水平，这包括那些身揽重要公职的人。在同一时间里，各种罪案，包括反社会活动上升。的确，有很多马来人通过掠夺国家财富，为自己建了华丽的皇宫；但是在乡村地区，许多人还是住在残旧的屋子，在装备不良的学校上课，没有电源和自来水供应。许多住在城市贫民区的人民在担心被驱逐的情况下，提心吊胆地生活。

我不是指这些只是马来人的问题。这些问题也在其他社群：华人、印度人、伊班人、卡达山杜顺人身上发生。但是，就如我在书上的数据所点出的，与华人和印度人相比，有更多的马来人在收入、教育、房屋和其他方面处于更落后状态。在宪法保障马来人的特殊地位，新经济政策以及“马来人主权”（马来人至高）如此盛行的情况下，这无疑是讽刺的。

无可否认的，我国的发展尤其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更上一层楼。不幸的是，他们更强调经济多于社会与人文发展。他们也更注重于物理上或物质上的发展多于道德或伦理上的发展。更多的钱注入在浪费公帑的大型计划上，为裙带提供大型计划和佣金，而不是为老百姓和弱势群体的利益和福利着想，提供公共设施。

我这里指的弱势群体是谁呢？当然，他们主要是贫穷或底下阶层。但是我想说的是，弱势群体也包括那些中等收入人士，那些因为庞大的家庭以及水涨船高的物价而难以维持优良生活素质的人士。事实上，我也不把专业人士、行政人员、业者和其他因为他们的种族背景或政治结社而经常受到歧视的人，排除在弱势群体的归类之外。

这些弱势群体由不同的种族所组成，不仅限于马来人。但是这些贫穷和低收入群体大多为马来人。在很大程度的认知上以及事实上，来自特权阶级的马来人是发展过程中最大的受益者。即使是那些贫穷和弱势的马来人也不能分一杯羹。

需要惠及更多人

这里有几个需要强调的事项。第一，虽然很多马来人都处于贫穷及低收入的状况，但这并不仅限于马来人而已，也包括其他族群。许多大马半岛及东马原住民的情况其实比许多马来贫穷人士的状况更糟糕。还有一些园丘及居住在贫民区的印度人及华人也是贫穷人士。虽然他们的人数

不多，但这并不代表可以忽略他们，把他们排除在发展之外。

尽管如此，需要强调的是，马来人占了国内贫穷及被剥削人士的大多数。因此，他们必须获得首要关注。然而，这并不代表那些同样贫穷，甚至情况更糟糕的非巫裔人士就有理由被忽略。

第二，有一小群马来人套着巫裔的名义使自己处于有利位置，滥用了新经济政策及宪法维护马来人特权的条文，来使自己获益。很多时候他们成功这么做，尽管很多人靠的不是“知道怎样”，而是“认识谁”来取得短暂成功。他们享有的特权常常被误解为代表着整体马来人的利益。讽刺的是，在这些美丽修辞的背后，政府的巫裔领袖却缺乏敏感及承担来照顾以马来人为多数的贫穷人士。

与此同时，很多非巫裔资本家在享有特别支持及赞助下，比许多领头的马来企业获得更多的财富。

虽然他们并非土著，却能透过“认识谁”勾结及买通有权势的政治人物，而在新经济政策发展计划下获得庞大拨款。他们往往比一般的马来人获得更多特权。

第三，赤贫及相对贫穷的恶化将影响贫穷人士获得良好教育、医疗服务及房屋等权利。由於大多数马来人都属于贫穷阶级，因此受到的冲击最大。同样地，这种情况并不仅限于马来人，也有很多其他族群的穷人也生活在很糟糕的状态。这种情况发生的原因可追溯至现有的社经制度及政府的政策，一个强烈根植于自由企业（自由放任）主导的社会。

现有的系统及政策继承了一些并不利于贫穷及弱势群体利益的元素。在全球化（一种新的殖民主义形式），现有的政治权力结构及自由企业主导的哲学影响下，这个仅仅有利于少部分富人的系统将持续一段时期。看来有必要来在这个系统上注入人道及平等主义价值观的项目。虽然还是需要针对不同对象群进行正面的区分，但不应根据种族，而是以需要来区分。

我认为，在将近40年后，我们有必要重新评估新经济政策，并以由安华提出，获人民公正党通过为该党政策的《大马经济议程》(MEA)取而代之。这个议程囊括了以下重要元素：

* 它专注于贫穷及弱势群体，提供更多社会设施来提高他们的福利并将他们从现有的状态解放出来。
* 它将为乡村巫裔贫穷人士提供除贫及发展计划，同时也会跨越种族，提供类似的机会与待遇予其他族群。
* 它限制有权势的政治领袖及朋党透过肮脏的手段，累积见不得光的财富。
* 它将有效对抗贪污、浪费以及管理不当。
* 它赋权予民，特别是那些贫穷及弱势的巫裔，好让他们能摆脱奴性心态，有勇气推广及捍卫他们的基本经济及社会权利。

用《大马经济议程》来取代《新经济政策》的用意是创造一个平衡的发展，透过公平及平等分配国家经济及社会资源方式来达到社会公义。由于《大马经济议程》的政策及方向是以人民为优先，例如关注人民，特别是穷人的困境，它无可否认地将为巫裔占多数的穷人带来最大的利益。同时，它也能保障族群之间的稳定性，因为其他的非巫裔也一起受惠。我们需要的是人民主权。这就是前进的方向。

新马来西亚：人民独立与公正

赛胡先阿里博士作
朱进佳译

（尽管本文写于7年前，但是对当前发展仍然适时宜。）

我国已独立44年，但是各个领域，如经济和政治，还有大部分人民仍未解放。即使是在关于独立历史的思想方面，仍有很多人民继续受困，尤其是通过学校教科书及当权者宣传机器所延续的种种“神话”。

我国历史抗争历史中有两个壁垒分明的传统或源流，就象很多曾经也被殖民的亚非拉国家一样。第一个传统是彻底地反抗殖民统治，以争取完全的独立。第二个传统是跟殖民者妥协，甚至愿意接受继承自殖民统治的经济、政治、司法及教育体制。

这两个传统在马来西亚存在着。可是，第一个传统被英殖民当局击败，英殖民当局扶持并支持第二个传统取得胜利。第二个传统的领袖来自社会上层，本来就轻易跟殖民者合作。这些属于第二个传统的势力，在取胜后宣传各种各样关于我国独立的“神话”。现在让我们看看部分的“神话”。

第一个神话是，独立斗争只有到了二战之后才开始，也就是英国意欲强行推动马来亚联邦成立而引起的反抗。事实上，捍卫国家独立及人民主权的斗争比这更早开始，也就是1511年时马六甲王朝的大臣与人民在宰相的领导下抵抗葡萄牙人的侵略。

过后，在19世纪，当英殖民者在跟部分苏丹及大臣合作成功入侵马来半岛时，很多其他大臣领导平民百姓奋起反抗。他们当中包括马哈拉惹里拉（霹雳州）、督江谷（吉兰丹）、拿督巴哈曼和末基劳、拿督南宁（马六甲）等人。他们的斗争由阿都拉曼林梦（登嘉楼）所延续。

第二个神话是，巫统（及后来马华公会和印度国大党加入后的联盟）是唯一促成独立的运动。这是不正确的。尽管英国人将独立交给（巫统领导的）联盟，但是在这之前已经有其他政党和运动为争取独立而开路。

二战前，我国就已经出现青年马来人协会，还有在数个州属的马来人协会，这些组织埋下独立的种子。我们不能否定马来亚共产党（马共）也在这个斗争中扮演着角色。二战后不久，马来亚马来国民党还有其属下的醒觉青年团和妇女醒觉团成立，而穆斯林阵线也在那时侯成立。

在争取独立斗争中，代表民族主义者的马来国民党、代表宗教人士的穆斯林阵线，还有马共成员，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他们在称为“人民力量中心—全马联合运动理事会”的大雨伞下扩张，以争取彻底的独立。其中著名的领导人是阿末•波斯达曼、布哈诺丁•希尔米、依萨•莫哈末、阿布巴卡巴基尔、阿都拉西迪、约翰伊伯及（还未领导马华的）陈桢禄。

曾经担任副首相的敦伊斯迈阿都拉曼，于1973年获得荣誉学位后在马来西亚理科大学的毕业礼上表示，左翼在独立斗争中贡献应该受到承认。可惜的是，很多左翼团体被禁，很多左翼领袖被英殖民者囚禁。英国当局鼓励发展巫统（及联盟），去填补左翼被镇压后所留下的空缺。我们再次看到上述的两个争取独立传统。

第三个神话是，这个国家争取独立的抗争，只是马来人的抗争，因此所出现的民族主义是马来人的民族主义。马来人的确在反对马来亚联邦及进一步争取独立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是反马来西亚联邦的斗争最初是为了拯救作为马来人主权象征的马来王室地位。

这就是为何巫统已开始的斗争口号是“马来人万岁”，其政治视野狭隘，也可被认为具有种族元素。1946年，马来人大会及巫统拒绝接受马来国民党使用“默迪卡”口号的建议，巫统只在数年后才接纳这个口号，但这也是在英国人颁布紧急状态、禁止多个左翼政党和工运、拘捕数以千计来自马来国民党、醒觉青年团、妇女醒觉团、穆斯林阵线和马共的真正独立斗士、迫使很多马共及民族主义者走入森林延续斗争之后。

在颁布紧急状态之前，相当多非马来人及非接受马来文教育的人士参加争取独立抗争。马来国民党中的马来人抗争，得到来自不同政党或团体的非马来人支持。英国当局不信任他们，因为他们具有强烈的反英斗志，要争取在所有领域上的完全的独立。英国人也担心他们，因为他们代表可以团结起来的多元族群运动，并且拒绝跟殖民者勾结。这就是为何英国人极力打击进步的却多元族群的运动，并扶持可以更容易控制的巫统（及联盟）。在得到巫统、马华及国大党领袖的协助下，英殖民者成功将人民对英国及其暴政的敌意，转移到进入森林的独立斗士（包括民族主义者及共产党人）。英国人成功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

第四个神话是，若没有巫统、马华及国大党内的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上层社会的领导（后来在通过组建联盟合作），我国不会成功独立。马来人上层社会（包括贵族和官员）、华人资本家（包括跟英国公司合作的商家）及印裔上层人士（包括商人及专业人士）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是若没有来自低下阶层及中产阶级平民百姓的支持，他们是不会成功的。

事实上，在颁布紧急状态之前，当时存在的政党拥有来自中产阶级的领导，如教师、记者等。由多元族群组成的工人组织积极活动争取改善工人的生活水平。这些运动都跟争取独立的抗争结合在一起，因为他们看到英殖民统治的剥削，造成底层人民的生活困苦。但是，这些工人阶级的抗争被标签为受到共产党影响。他们被禁，很多领袖被囚禁。我们不可能忘记各族群人士争取真正独立的贡献，尤其是来自工人阶级。

第五个神话是，我国的独立式通过和平且没有流血的方式而争取到，不象其它国家那样。这其实是错误的认知。当马六甲人民紧紧用匕首、长矛和弓箭作为武器英勇对抗船坚炮利的葡萄牙殖民者时，牺牲了不少性命，为的是维护他们的主权。同样的，当马来贵族和他们的追随者尝试对抗英殖民当

局于19世纪用枪炮侵占马来王国时，很多人民阵亡牺牲或受伤，很多家庭和村庄被摧毁。

也同样的，在二战后的独立斗争中，数以千计的人牺牲及受难，英殖民者指控他们是共产党叛徒而镇压他们。可是，就如很多人所承认的那样，包括敦伊斯迈阿都拉曼于1973年领取学位时所发表的演说中所提及的，他们当中很多人事实上都参与了争取独立的抗争。我国人民帮英殖民者对抗共产党的战争，不应该被赞美到甚至超越我们为争取独立而对抗英殖民统治的斗争。

最后，独立44年后，我们仍然没有了解、承认并尊重所有曾经参与在独立抗争的人士。尽管今天我国领袖尝试改变独立初期的亲英（或亲西方）政治倾向至较为反西方，但是这尝试没有效果。殖民统治在经济、政治、立法及军事上的残余愈来愈明显。尽管全球化过程经常被批判，但是国家领袖却不曾成功减缓其攻势，更遑论应对这种新殖民形式所带来的恶果。

来自底层社群的平民百姓希望通过独立让他们在经济上得到保障。但是，目前国家财富的分配愈来愈不公平。财富和特权成为少数跟统治集团关系密切人士所垄断的事物。尽管人均收入已经上升，但是贫富之间的差距却日益扩大。徇私舞弊及贪污腐败的行径日益猖獗。普罗大众的生活愈来愈困苦。国阵领导层愈来愈专横霸道。

真正独立抗争的精神现在已经愈来愈淡化。我们必须记住我们的前人为了独立而牺牲了他们性命、精力和钱财，他们要恢复我们作为一个民族的自由、尊严及荣誉。秉承着他们这种英勇的精神，我们应该延续独立的抗争，争取摆脱遭任何势力重新殖民的独立；摆脱残酷且不公统治的独立；摆脱一小撮特权人士贪婪搜刮财富的独立；摆脱贫困与剥削的独立；摆脱位高权重者贪污及朋党主义的独立；摆脱族群之间惧怕与猜忌的独立；摆脱一切恶法及钳制的独立；摆脱统治集团中少数人控制司法体制、警察和媒体的独立；还有很多很多。

自我国庆祝独立40周年以来，我国人民见证了各种事情。经济危机的冲击，以及对安华的暴行，带来了很多改变。有位同伴表示："当安华被打到半死且一只眼睛瘀伤之时，人民的双眼变得雪亮。"现在他因很多国内外人士视为虚假指控及纯粹诽谤的控状而被判监15年，更多人愈来愈看清事实。安华已经成为当权者残暴且不公对待人民的见证。人民的觉醒已经超越对安华一人施暴的觉醒，这是对认清统治集团的暴政、残酷、谎言、扭曲事实、贪婪、腐败之真面目的觉醒。因此，很多人民现在的诉求是涵盖一切方面的公正与民主。这就是为何人民争取改变，并高呼"烈火莫熄！"

统治集团为了修补自己所造成的祸害，继续玩弄种族政治火焰。他们延续先前殖民者所奉行的分而治之政策。如果从前"共产党"和"左翼"被用来加罪于人，现在"烈火莫熄"、"伊斯兰"及"公正"则被用来吓唬人民。

30/8/2001

创办华校、承传文化、维护尊严

莫泰熙

一．拒绝被同化

据统计，海外华人约有四千万人，其中80%在东南亚。马来西亚是小国寡民，人口只有约3000万人，其中华人约占23%（即600多万）。马来西亚的华人与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华人一样，有了温饱（工作求生存、平安（建庙拜神），便兴校办学，让子孙受教、有知识、有文化，做一个像华人的华人，然后谋求发展。

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有近200年的发展历史。东南亚有些国家的华文教育有更长的历史。除了马来西亚，其他东南亚各国的华文教育都因政治等因素而在不同的年代被迫中断或被连根拔掉。当地的华人彻底被同化。

为何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与华人可以例外？

二．华教运动

马来西亚（之前为“马来亚”）在1957年从英国殖民地政府手中获得国家的独立。国家独立前的五十年代，马来西亚的华人已经拥有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创办了1300多所华文小学、近百所华文中学及一所大学（南洋大学）。国家独立五十多年后的今天，华文小学只有1280多所（虽然学生人数从当年的不到20万人发展至今天约60万人）。华文中学在六十年代被排除在国家教育体系之外，华社民众坚持以自力更生的方法复办华文中学，被称为“独立中学”（即独中）。

在马来西亚，凡是为维护与发展华文学校的教育事业的工作，向来被称为“华文教育运动”，简称“华教运动”。华教运动建立在两个基础上，一是基本人权，一是母语教育。通过母语接受教育、承传文化是人的基本权利，不能通过多数人的立法而被剥夺的。坚持以母语教学乃因为母语经被世界公认为最有效率的教学媒介。此外。对健全人格的养成、信心与尊严的建立，民族语言、民族文化更是不可或缺的关键要素。

三．多元与单元的抗争

在立国之初，马来西亚政府（马来民族为主导）的教育政策就定了一个“国家教育的最后目标”，即“最后”这个国家只有一种教育源流，即马来文教育。

华教运动的奋斗目标就是对统治阶级单元化或同化教育政策的抗争，以及为多元文化的发展争取生长条件和空间。可以这么说，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史就是一部华人社会与单元文化教育政策的斗争史。

四． 民主诉求

独尊单一语言文化，否定另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化在国家的地位、限制它的运用与发展，以及通过垄断“主流教育”的定义权，拒绝承认非马来文教育，是阻碍社会民主化进程、违反民主精神的做法。

通过实践民主，各民族文化获得平等的尊重、重视与保护，各族享有平等使用母语、接受和发展母语教育的权利，这是马来西亚华人及印度人等少数民族的民主诉求之一。

五．奋斗成果

马来西亚华人每年大约要捐献近马币二亿元，以维持及发展华文教育体系，即1280多所华文小学、60所华文独立中学及3所华社民办学院。自从南洋大学在1980年被关闭后，创办另一所华文大学是华社的教育梦想与奋斗目标。

因为有了这个华文教育体系，马来西亚的华人近100%看懂华文、会写华文、能讲华语、可传承中华文化。创办了近五十年的华文独立中学，凭着“独中统一考试证书”（至今仍然没有获得马来西亚政府的承认），其毕业生可直接到全世界任何大学念书。中国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香港各大学、新加坡各大学等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更是提供奖助学金，欢迎马来西亚独中毕业生报读。华文独中高中毕业生每年的升学率近80%，比政府体系的中学生的升学率高出一倍多。

上述奋斗成果，可以说是马来西亚华人所创造的“发展母语教育、承传民族文化、维护民族尊严”的一个文教奇迹。

（本文乃作者于2008年9月间，以吉兰丹中华独中校长身份，受邀赴北京参加“海外华文教育研讨会”，提呈论文的发言提纲，文中的数据于2014年修定。）

华教风雨路——兼谈原则与权宜

李万千

（一）联盟/国阵继承英帝单元教育政策

从所周知，我国单元主义国家教育政策，实际上是英殖民地主义教育政策的延续。在英殖民地时代，英文是官方语文，英校是享有特权地位的学校，而我国各族人民的语文是非官方语文，各母语学校则是被歧视与排斥的方言学校。

1957年国家独立后，经过10年的过渡期，马来文取代了英文的地位，成为我国的国语和唯一的官方语文。但作为精英语文，英文仍然享有特殊的地位；而其他民族的语文和母语教育,则只能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语文”的同化政策下挣扎求存。

（二）华、印小学一直面临着被消灭的危机

其实，我国的华文及淡米尔文教育，在超过半个世纪以来，就一直面临着英殖民主义者及它所扶持的联盟/国阵政权，通过多份教育报告书及教育法令，伺机加以消灭的重重危机。

早在1951年，《巴恩报告书》就已经建议要废除华文与淡米尔文的所谓方言学校。1956年《拉萨报告书》第12条文则毫不违言我国教育政策的“最终目标”是要“把各族儿童集合在一个以马来文为主要教学媒介的国家教育制度之下”，即准备逐一消灭英、华、淡等教育源流。

恶名昭彰的1961年教育法令第21条（2）则授权教育部长在他认为“适当的时候”把华、淡国民型小学改制为国民（马来）小学；及通过威迫利诱，把78间华文中学改制为国民型中学（先后以英语及马来语作为教学媒介），积极为落实“最终目标”进行部署。

（三）1996年教育法令已基本落实“最终目标”

时至今日，许多人都还不知道，我国国家教育政策的“最终目标”,实际上已通过《1996年教育法令》第17（1）条款基本上实现了，即：“国语必须是国家教育制度内所有教育机构的主要教学媒介，除了在第28条款下设立的国民型学校，或者由部长豁免不受本条款约束的任何其它教育机构。”

关于国民与国民型学校的设立与维持的第28条款虽然规定：“在本法令条文的约束下，部长可以设立国民与国民型学校，并且必须维持这些学校。”但由于上述条文只规定部长“可以”，但不是“必须”设立国民与国民型学校，结果部长当然可以只设立国民学校，而不设立国民型学校，以限制后者的发展。

必须指出，在《1996年教育法令》下，78间国民型中学实际上已经被静悄悄地改为国民学校；而华、淡国民型小学，华文独立中学等，都是在部长的“豁免”下暂时保存，它们有如获得缓刑的死囚一样，若得不到宽赦，最终还是难逃死亡的命运！

因此，认为当局已经废除《1961年教育法令》第21条（2）是不对的，因为它就

藏在《1996年教育法令》第17条（1）之中。所不同的只是，前者赋权教育部长在他认为“适当的时候”把华、淡小学改为马来小学；而后者则赋权部长随时可以取消“豁免”华、淡小学以国语作为教学媒介。

（四）华小、独中与统考皆无法律保障

董教总在1997年6月28日发表了评述《1996年教育法令》的重要文告，综合了法律顾问的意见达至在该法令下，华小、独中与统考皆无法律保障的结论。

根据17条（1），除非获得豁免“国语必须是国家教育制度内所有教育机构的主要教学媒介”，而部长的豁免权是由143条所赋予的，它同时也规定部长可随时取消这项豁免。

文告认为：“到目前为止，独中并没有正式获得这项豁免”，而且进一步指出：“其实，大家记忆犹新，新法令通过前后，华社极力争取独中受正式豁免，但至今仍无下文。”

与独中统考有关的条文则是第69条（1）（关于禁止举办考试的条文）。在这条文下，没有人（或学校等教育机构）可以擅自为学生（不论是政府或私立学校的学生）举办任何考试，除非事先获得考试总监的书面批准。

董教总文告认为：“‘统考被认为是学校本身的考试’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虽然第69条4（C）规定：第69条（1）（关于禁止举办考试的条文）‘不得施用于一所只为了评估本身学生的表现而举行内部考试的教育机构。

文告接着说，董教总为60所独中举办内部考试，和一所学校为它的学生举办内部考试，是有所不同的。文告因此认为“69条4（C）肯定不能当作是举办统考的法律根据，统考要在法律下继续办下去，看来也是要靠部长的豁免了。”

（五）原则与权宜

《互动百科》把“原则”定义为“说话或行事所依据的法则或标准”，而“权宜”则定义为“暂时适宜，变通”，如“权宜之计”就是暂时性的变通办法。

由于我国实施单元教育政策，因此第一，当局原则上不准增建华小，但为了缓解华小学生爆满或在大选争取华裔选民的支持，权宜上可以允许个别学校迁校或建分校。

第二，原则上60间独中是不准增加的，但2008年为了大选的需要，权宜之计就是在口头上允许宽中办分校，但在批文上则写明准建“附加课室”（Bangunan Tambahan）；这次大选前，同样为了政治的需要，答应关丹可以办一间独中分校，结果批文仍旧出了问题。

第三，原则上不准以华语作为学院的教学和行政用语，因此，在新纪元学院当年的批文上，只准以国语和英语作为教学和行政用语，但在权宜上，由于院方的坚持，华语毕竟根据教学和行政的需要被派上用场。

上面提到的各有关批文，实际上都是体现我国现行教育法令——1996年教育法令的条文与精神，即国阵的单元主义的教育政策的原则，如果不理解当局教育政策与政治权宜之间的矛盾，不敢在当局的“默许”下，突破有关批文的限制，而是采取董总现在所主张的把各有

关批文交回去，或者批文不改，一切免谈；那么，新纪元学院和宽中古来分校或许早已胎死腹中！而关中董事部决心把关中办成独中也就如同董总所认定的是绝对不可能的自欺欺人！

如果真的要讲“原则”对“原则”，那么反对的对象应该是落实国阵单元主义教育政策的1996年教育法令的有关条文；否则，只好以权宜对权宜——内阁既然已经批准关丹可办独中分校、首相与副首相已经承诺关中可以办独中课程和参加统考、部长在国会内的答复和教育部的回函都表示知悉关中将办独中课程等，为什么就不能姑且信之，先办了再说呢！

如果宽中的“附加课室”可以办成古来分校（而且得到董总以“宽中模式”加以认可）；如果新纪元学院可以突破批文的限制，在国语与英语之外，增加华语作为该院的教学与行政语言之一；为什么关中就非得交回批文，或先改了批文后，才可能办成一间华文独中呢？

（六）各族语言和母语教育是基本人权

语言、教育人权已成为国际公认的普世价值：国阵政权至今仍然在实施着，继承自英殖民主义者的、过时的单元同化政策，压制与剥夺少数民族的语言与母语教育权利。它这么做明显地是在开历史的倒车，因为在环球化时代，多元文化主义与语言、教育人权，已逐渐成为世界各国所认同的普世价值。

国际文献保障少数民族的语文、教育人权：其实，许多国际文献，如《世界人权宣言》、《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反对教育歧视公约》、《联合国关于少数民族、族群、宗教和语言权利宣言》、《欧洲区域性或少数民族语言宪章》、《巴赛罗纳语言权利世界宣言》等对区域性或少数族群的语文权利都反对消极地加以歧视和压制，主张采取尊重、鼓励和促进的积极态度，主张在立法等方面确保对它的学习与使用——包括作为教学媒介至最高教育阶段及官方用途等。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母语教育运动应该以国际文献的普世价值作为根据，堂堂正正地争取我国各少数民族享有保存及发展本族语文与母语教育的基本人权，使它具体地体现在教育政策和教育法令内，摆脱在权宜性的“豁免”下苟延残喘，及毫无自尊地随时被指责破坏国家团结，被威胁必须加以关闭等等的悲惨命运，

（七）要求制定《教育平等法》

职是之故，林连玉基金和各有关团体在开展为林连玉导师平反的运动中，才要求当局制定《教育平等法》，从政策的层面上，确保我国各民族人民也能够享有国际文献上所确认的各项区域性或少数民族的语言与教育权利。当然这是一项长期与艰巨的目标，不是可以毕其功于一役的。不过，更明确地把要求制定《教育平等法》视为各族母语教育运动的奋斗目标，应该也是适时和必要的。

（本文整理自6/7/2013，在马来西亚南洋大学校友会周末茶叙会上的发言摘要，原题为：《华教风雨路》）

为何团结？如何求同？——论民联三党的结盟

王国璋

本届大会主题一一“多元团结为正义、存异求同捍民权”可谓一针见血，点出了马来西亚多族群社会的困局，正是难于“求同”以团结，共同追求社会正义。然而正义（justice）作为道德理想，其内涵为何，国民其实尚无共识；而存异求同说的究竟是“存何异求何同”，更不无争议。

改革者面对国阵霸权，当前最重要的抗衡论述与策略，莫若两线制概念下的反对党大结盟。而政党结盟强调的，正是如何为应付共同敌人团结一致、存异求同。不过眼下棘手之处，是巫统自2013年全国大选落幕后，为收复失地，已选择回归固守其保守马来人 穆斯林的基本盘，为此不惜纵容外围组织一再高调地挑动族群、宗教及皇室议题。晚近雪州的马来文版圣经被扣事件及大臣易人风暴中衍生的种种惹火争议，就是显例。影响所及，民联三党正深陷多事之秋，结盟关系备受考验。

论者每吁三党以大局为重，不轻言拆伙，免遭巫统算计得逞。这当中的重要预设，就是两线制乃国内族群政治局限下瓦解国阵霸权的最有效手段，舍此则民主进程必将大受延误。但两线制显然不该只是手段，“为何团结”及“如何求同”这类本质性探问，其实涉及结盟各方的核心价值。结盟如果纯是政治上的权宜组合，而没共享的核心价值，那它究竟能走多远，又是否有助摆脱国内族群政治的枷锁，我甚怀疑。这方面的重新检视，或许该由吾人对正义的不同理解谈起。

正义观的内在矛盾

有关正义的哲学讨论极多，但总括来说，不外两项最核心的道德观念，一是“公平对待”，二则“济弱扶倾”。前者强调平等、公正的价值，但说的不是齐头式的绝对平等。具体作为，即政治上讲究绩效（meritocracy）的“能者当之”，或经济上确保众人能各凭本事，赚取相应的收入与财富。不过公平对待虽是人类社会最基础的正义观，另一方面，人类的道德直觉，却往往也将济弱扶倾视为正义之举。换句话说，某些刻意扶助弱势者的“不平等”安排，如美国在1960年代启动的扶弱政策（affirmative action），在不少人心目中也是崇高的正义表现。

“公平对待”与“济弱扶倾”明显存在本质上的冲突，因“济弱”对强者来说并不公平，弱者会因此享受到多于强者的社会资源。支持公平对待原则者，未必也同意济弱扶倾，反之亦然。譬如在希腊哲人柏拉图的理想国度里，才智出众者治国，才智低劣者则要永远受治于人，这是由公平对待原则推衍出来的极致型态。反观马克思的理想社会，却是希望人人各取所需，不问能力及付出之多寡，而那就是济弱扶倾原则下演绎出的极致型态。两套正义观确有矛盾，但都是普世正义观的一环，该如何兼顾？

如以族群而非个人角度来看，正义既可以体现在“各族群获公平对待”之上，也可反映于“优势族群扶助弱势族群”的具体实践当中。只是微妙之处在

于：究竟谁优势？谁弱势？马来人因人口优势及选制扭曲而在政治上占有绝对优势，非马来人则远为弱势；但在经济领域，撇开族群内部的阶级分化不论，总体而言马来人却又屈居下风。所以当马来族群试图以政治上的优势，制定政策（如新经济政策）来扭转其经济劣势时，经济上的优势族群顿生严重的被剥夺感，深感公平对待原则遭到侵害，也就难有慨助弱势者的豪情。而当非马来人碰触特权议题，马来人则诉诸于济弱扶倾之正义，忽视人人平等的基本要求。

其次，在马来西亚，还有“这是谁的国家”的未解难题。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强调“一民族一国家”的理想，认为民族国家就该有个主体民族及文化，自然缺乏对多元的容忍和想象。土著特权对不少马来人来说，就是源于其历史地位的既有权利，是民族国家概念下的主　客问题，当然也就可以是与生俱来的万年特权，不容客居者挑战。马来西亚宪法更早就将这“特殊地位”建制化。惟究其实，独立前夕联盟诸党在和英殖民者谈判独立宪制时，对此颇有争论，遂曾有只限15年特权的倡议，即国家独立15年后，就该将这特殊地位条款移除，以兼顾平等和扶弱的冲突诉求。惜巫统强烈反对设限，最终守住了这项万年特权。但这明显已经逾越了济弱扶倾的合理界线，而构成对他者的不公义了。

民联三党的核心价值

民联三党都自诩追求正义，但对正义的理解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可不可以存异求同？如果可以求同，那这是不是彼此共享的核心价值？如果非关核心价值，那结盟干嘛？结盟若沦为纯粹只是取国阵而代之的政治手段，我们与向来瞧不起的国阵政治人物又有何异？

行动党是暧昧的社会主义政党，强调公平对待多于济弱扶倾，但至少一贯坚定地追求宪法上的平等公民权。公正党基本上仍是“安华党”，以热盼变革的城镇中产阶级为根柢，尝试往跨族群方向拐却未脱巫统遗绪，但无论如何已开始在论述上以阶级取代族群。伊斯兰党自1980年代以降，屡经变革，其跨族群宗教情怀带左派色彩，关注基层，尤让不少改革者对它怀有浪漫憧憬，遂有1990年大选迄今不辍的政党结盟尝试，分分合合，犹带期盼。伊党没错乐见华教的生存发展，并在其执政州属资助华校；伊党反贪腐；伊党更一再强调不分族群济弱扶倾。然而另一方面，也是这同一家政党，无法接受非穆斯林出任首相、对女性参政始终很有保留，更坚持伊斯兰国的终极理想，老盘算着一俟时机成熟就落实伊刑法。

伊刑法议题早在1990年代在野党共组反阵之时，就已令反阵盟党间扰攘不断，我们或可据此检视民联三党——尤其是行动党与伊党之间——在核心价值上的歧异。伊党这回随巫统起舞，看似无奈被动，实则暴露它对伊斯兰的重大议题根本无法闪躲，因那正是其核心价值。不少论者寄望伊党内部的开明派能够解围，事实却证明只要事涉核心价值，差异难以调和。例一即卡立沙末（Khalid Samad）在年初雪州宗教局没收马来文版圣经一案中的护教立场；例二则是党内另一开明派祖基菲里阿末（Dzukifli Ahmad）坦承伊刑法既是“阿拉的谕示”，穆斯林除了奉行，别无选择。

民联三党的价值观确有交集——民主、人权、廉政等都是，但却难敌核心价值歧异所带来的撕裂。政治诚然讲究妥协，不过政党政治争的，本就是不同的意识形态、价值观与政策。一党核心价值如果可以轻率摇摆，就谈不上是个可靠有格调的政党。民联内部的核心价值歧异，与其说是世俗与宗教之争，不如“政教分离”与“政教合体”之争来得贴切。西方社会历数百年宗教战争归结而成的政教分离原则，并不排斥宗教，只是将宗教信仰明确界定为公民个人之事，世俗、虔诚各随己意，却不该涉入公共事务，遑论由国家插手代管。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政体，从来就是伊党“阳谋”，就这点来说其坚定立场可敬。不过行动党和公正党如果不能苟同，却故作天真地以为执政后凭借政治运作就可以摆平或妥协，是自欺欺人。

伊刑法争议闹开后，论者每多回溯马哈迪时代，巫统和伊党竞相标榜伊斯兰化所埋下的政策伏笔，尤其是他1988年修宪确立两套并行的民事法（普通法制下的世俗民法与伊斯兰民法）的恶例。惟在那个关键年头，巫统的国阵盟党无一挺身捍卫马来西亚世俗法制的完整。2001年，马哈迪更索性昭告天下，马来西亚已经是“伊斯兰国”，马华、民政及东马诸党依然噤声。如是数十年下来，中央的伊斯兰发展局（JAKIM）坐大，各州宗教局也逐渐侵蚀世俗马来人的生活空间，甚至动辄镇压什叶派等伊斯兰不同教派的信仰。点滴自弃政教分离原则，国阵大小政治人物难辞其咎，等待执政的民联政治菁英，更务必引以为鉴。面对伊刑法，行动党和公正党固然可以选择拖拉下去，或以“别怕别怕，伊党无法凭一己之力修宪”、“认同伊刑法，但实施时机未至”的说词安抚、敷衍支持者，也可以明确作个了断。

两线制的结构性局限

民联政治菁英近年来一再自我催眠，盼三党的互动由浅入深、从无到有，先开个头，再渐入佳境。这一来是实践已见成效（2013年大选差点就入主布城），二则是认定跨族群政治乃未来方向。跨族群路线显然没错，但众人尚“速成”，汲汲于凑合各党先营造一个跨族群风貌。讽刺的是，国阵模式在此竟隐然是个参照对象。

两线制的结构性局限，是让我在核心价值之外也质疑民联三党结盟意义的理由。1990年大选时两线制已见雏型（国阵对反阵），改革者之所以不谈两党制而倡两线制，显然是意识到国内族群政治运作仍牢不可破，而国阵政权又过于强大，实难奢望马来西亚出现类似英、美的两党民主竞争体制。于是务实的转型之道，就是组建一个与国阵不相伯仲且具跨族群色彩的政治大联盟，与之抗衡。

不过两线制既是在野者抄袭国阵组织框架的产物，就难以真正摆脱国阵的族群分治逻辑：各党分工，负责某特定族群的政治诉求，而这反过来又成了彼此的政治地盘。如果论跨族群色彩，民联三党无疑要比国阵诸党鲜明，不过行动党代表非马来人非穆斯林权益，而公正党和伊党以经略马来穆斯林为主的基本界线仍在。例一即2013年选后民联再度执政的槟州内阁，华裔首长以下，巫裔第一副首长及印裔第二副首长的族群分治惯例不变；而在行政议员的摊派上，各党配额虽也未变，公正党三

位行政议员这回都改由巫裔出任，隐然有让公正党取代巫统在州政府内马来人权益捍卫者角色的意味。例二则是上届大选过程中，行动党和公正党在霹雳、森美兰等州的城郊选区竞选时，面对马来群众，总要不断地强调马来人支持民联并无丧权之虞，并出示数据说明民联执政的州属，马来人在州内阁的代表性不减反增，以 疑虑。换句话说，马来人的政治利益，还是要由马来政治人物来代表，而他们来自民联里的公正党和伊党。

其次，即便只就选举实利而言，政党结盟的积极动机在达成选票和议席上的互补，消极动机则至少避免在“赢者全拿”的单选区选制下分薄彼此选票，以提高胜算。2013年大选时民联的选举操作就颇为细腻，既避免同室操戈，也将各党尽量摆到合适的选区上发挥最大优势。此所以行动党包办了东、西马华裔为主的城市选区，公正党主攻城郊的混合选区，而伊党则基本留守于乡间选区。城市选民（尤其华裔选民）的跨族群投票倾向，上届大选的确表现突出，不过不少城市世俗选民之所以接纳伊党，主要恐怕还是受他们希望变天的强大动力驱使，或某种程度上惑于“福利国”的成功包装，而非认同伊党的政教合一理想。伊刑法争议再现后，三党结盟的选举实利如何，证诸1990年以降的反对党结盟史，不少人应该心中有数。

两线制以外的想象

民联三党既无法在核心价值上“求同”，又难以跳脱两线制的结构性局限，若为改朝换代而勉力维系结盟，一旦执政中央，政争几乎可以预见。坚守政教分离还是改走政教合体的治国方略，三党终要抉择。分手会让变天看来不再触手可及，安华很急，不少中生代改革者也很急，显然不会同意。所谓务实论述，往往会将扳倒国阵政权视为第一要务，国阵不倒，则任何有实质意义的政治改革都会沦为空谈。这点不假，不过伊刑法争议这回竟能惊悚地在某个无预警的时段里窜出，且攸关国体变更，民联菁英实有责任深思自己追求的，究竟是个怎样的中央联合政权？

两线制以外，还有没有其他想象？没错，路的阻力可能更大，譬如我们往往不敢想象，今时今日，就由政党结盟跳跃至建构一个真正跨族群、以政教分离为原则的政党。马来社会的现状，不该构成我们不敢妄想的理由。此外，民联三党即便将来不住同一屋檐下，也不必翻脸当陌路人。三党在许多共识议题上的合作空间依然宽广，选制改革及恢复地方选举就是。

马来西亚的民主转型虽因族群、宗教因素备受干扰，却似乎没有逾越现代化理论（modernization theory）的基本框架，即随着经济发展，城镇中产阶级和知识菁英渐成推动民主转型的主力。不过民主进程的深化，说到底仍要回到民间，而四、五年一度的国、州议会同步选举，作为民主积淀的过程，明显不足。恢复地方选举虽是民联三党一贯突出的政治议题，观其实践，显然并未真正受到重视，而这也说明了部份民联菁英的算计与短视。地方选举不仅可以激活乡区的基层民主，更因触及地方上实实在在的日常俗务，而有助选民超脱族群政治的狭隘视界。三党合作，或可以从这里重新开始。

重建左翼力量

朱进佳

完成社会改革

柏林围墙倒下四分之一世纪后，历史未因此终结。全球资本主义在二十一世纪初继续深陷重重危机，世界各地社会抗争此起彼伏。而在我国马来西亚，巫统—国阵的统治霸权依靠殖民政府遗留下来的恶法体制及种族政治横行多年，但是近年在反抗暴政的人民力量日益壮大下显得摇摇欲坠。2008年308政治海啸让马来西亚人民看到了通过议会选举实现政权轮替的希望，但是不公的选区划分及国阵舞弊操弄的手段让2013年的505变天功败垂成。

505后，我国人民争取民主与社会正义的抗争远未结束，但是民间社运似乎陷入低靡的状态，而被认为能够取代国阵执政的民联内部也浮现出种种问题。巫统—国阵为了保住政权，一边厢尝试通过表面改革及民粹政策去收买人心，另一边厢则纵容其麾下极端组织四处点燃种族宗教政治分化人民的火头，以为政府继续祭出恶法打压异议及收窄民主空间铺路。

505之前的重大民间社运，如波澜壮阔的净选盟、反公害绿色浪潮等，释放出人民力量的巨大潜能。可惜后续保温及深化不足下，很多时候仅变成为民联入主布城做嫁衣。民间社运需要更明确且长远的政治方向及社会组织动员策略，才能突破议会民主糖衣下的困局。

我国民主与社运之路并不平坦，且挑战重重。我们在未来仍必须面对的重大议题，包括：

1. 种族宗教政治阴魂不散

种族政治一直是巫统—国阵用来分化人民、保住政权的“杀手锏”，在513之后至308之前，可谓万试万灵。308之后，巫统尝试玩弄种族课题去削弱民联掌权的州政府，但成效不大。不过，当权者仍未乐此不疲地挑起种族与宗教课题，意图制造族群之间的紧张，以便合理化其用高压手段去维持统治霸权。巫统国阵也意图用种族宗教课题去挑拨民联内部的矛盾，让这个308大选时“意外”成形的替代联盟陷入分崩离析的险境。

2. 国家机器与恶法打压

由于民间社运多年的抗争，巫统—国阵为了保住其政权，在第13届大选前的两年期间作出了一些表面上的小开放，包括废除《内安法令》、《紧急法令》等恶法，但是却让这些恶法的精神在新制定的《安全罪行法》及《刑事法典》修正案中借尸还魂。而纳吉原本宣布要废除的《煽动法令》，则在极端右翼团体不断挑衅的配合下，最后为了抚顺“党员的意愿”而煞车，完成了一场政治筋斗的表演把戏，也让人看清披着“政治转型”外衣的国阵政权本质从未改变。当初的“小开放”只是保住政权的权宜之计，维持国家机器对民间言论的钳制与打压，一直都是巫统国阵巩固霸权的“王道”。

3. 繁衍社会不公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

政府削减津贴、实行消费税、私营化公共服务等，都是马哈迪时代开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之延续。这种以资本财团利益挂帅的经济政策，旨在为朋党及跨国财

团带来丰厚利润，

代价是原本属于人民的基本权益，被典当成为财团牟利的工具。财团盈利导向的经济发展，只会让社会财富不断向上集中，社会底层人民继续活在入不敷出、生活拮据的困境之中。

4. 环境公害继续为祸人间

为了满足资本财团的贪得无厌，打着“亲商”旗号的政府不断助长制造公害的工业在我国落地生根，无论是莱纳斯稀土厂，还是大型水坝，甚至是蠢蠢欲动的核能计划，全是罔顾人民生命安危、健康及环境生态的官商勾结计划。环境公害延祸我们的下一代，如果我们今天不制止并逆转这些破坏，我们留给后人的是一个不适合居住的环境。

强化民间力量 打造左翼替代选择

在面对着重重威胁下，我国人民不能坐以待毙。要终结巫统霸权，以及其所维护的社会政治体制，我们需要强大的人民力量。

我们不能奢望将议会选举、入主布城视为其最终政治目标的主流政党，去挑起由下而上建设人民力量的重任。打造人民力量，需要的是具有明确进步思想方向的组织，以及锲而不舍从事基层教育、组织及动员的有志之士。

要人民力量发挥影响并走得更远，我们需要进一步建设并壮大进步的民间社运，可以做的包括：

1）深入社区—在社区将基层人民组织起来。

2）政治教育—通过媒体、新媒体及深入社区，将重大的议题及分析传达给更广泛的民众，并让更多人参与在运动之中。

3）社运串联—把关注不同议题的民间组织串联起来，定期进行交流、分享资源并拟定共同的方向。

在巫统霸权及全球资本主义的夹攻下，我国人民需要的是重新打造主张阶级分析、批判资本主义建制、由下而上组织起来进行社会改革的左翼政治，作为取代巫统种族主义以及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另类选择。左翼政治曾经在我国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中扮演着重大角色，当初殖民政府及后来的联盟政权都将左翼力量视为洪水猛兽而残酷镇压。正因为镇压所造成的左翼政治真空，而让种族政治找到了滋生的沃土。

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以来，全球资本主义更因苏联的解体而高唱“历史的终结”，但是左翼政治并未因此终结，而资本主义造成的种种危机：经济危机、气候危机、粮食危机等，更让重建挑战资本霸权的左翼力量成为世界各地人民的迫切任务。当前世界各地青年的反抗，就是要寻找一个摆脱资本建制的替代选择。我们有必要重新发掘左翼政治的历史资源，同时也要摆脱教条化的政治路线，以更包容且民主的政治组织，去将热衷于求变的人们联合起来。

我们所追求的社会改革，并不能只是着眼在取代巫统国阵的政权轮替，或对抗贪污腐败，而是从现在开始就必须同时挑战衍生社会不公的资本主义体制，提出强调由下而上民主参与、社会财富重新分配并捍卫环境生态的左翼替代选择。

冷战亚洲枢轴
PERANG DINGIN PASAK ASIA

～希沙姆丁·莱益斯 Hishamuddin Rais 作/ NK HO译
Mei 28 2014

上海，新华社5月18日--中国和俄罗斯双方的海军导演们都参加了星期天的联合演习，目的是为了改善应对海上安全威胁的能力--摘自新华社。

研究发现，英国的化石燃料全部用光，石油只够5.2年，煤4.5年，天然气3年，设在安格利亚鲁斯金大学的一个研究所的研究员这么说--摘自《今日俄罗斯》。

上个星期，蔓延越南的反华骚乱，造成了超过20个人被杀害。中国人的工厂被烧，中国工人，工厂工人被袭击。

当中国海军到南海的南沙群岛开始寻找开采石油，引发了反华情绪。已经发生了中国海军舰船同越南海军舰船互相撞击。

对南沙群岛的争夺使南沙群岛区域成了东南亚的热点。不仅是越南想要这个地区--菲律宾和马来西亚也正式提出同样的要求。这一群岛的周围地区，据说蕴藏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燃料。

为了了解发生在我们后院的事情，我们必须阅读和看看在阿富汗、利比亚、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一地区爆发的战争，是美帝国主义势力包围和夺取这些国家油井的大战略的一部分。

美国1977-1981年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描述过这一大战略。这个坏蛋写过几本书，成了维护美英帝国霸权制度军事战略和思想的基础。

明显的，在中东和南中国海，石油和天然气燃料是这次争夺的根源。必须提醒的是，这种石油燃料正是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根源和背景。我必须再次告知所有读者，我们今天的文明是石油燃料文明。没有了这种燃料，我们今天存在的文明将毁灭。

今天，美英帝国势力正在重新布局和描绘世界地图。这一切是在冷战结束20年后所做的。对于年轻的读者，冷战可能没有什么含义。而在我们的理解中，冷战是美国的资本主义和苏联的社会主义的搏斗。这个冷战的背景，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要求独立的民族主义运动。

经济战争

中国和苏联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援助了反抗美英霸权的民族解放运动。正是因此，中国和苏联被全世界的资本主义者视为敌人。全世界的资本主义者得到美英势力的保护伞和援助。国际资本主义的理想是征服和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攫取财富。如今，被迫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施加殖民统治和掠夺将受到第三世界人民的武装反抗。而武器是来自苏联和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时代被称为冷战时代。这一时代在1989年柏林墙倒塌后结束了。苏联分裂和形成俄罗斯联邦。

中国和苏联开始接受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一些形式和特征。但是这两个核力量国家继续拒绝美英霸权势力。在这些国家里，资本家不能随心所欲地进行贸易和掠夺。实际上，美国无法使苏联和中国屈服。

当冷战结束时，世界公民本应庆祝和平与安宁时代的到来。但是在资本主义法律书籍里，和平与繁荣是不可能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存在一天，战争和战争危险将一直威胁着世界的居民。这是事实，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强烈依赖战争，以便获取利益的最大化。没有了战争，资本家的资本将灭绝。

读者们试想想，美国在1975年越南战争失败后，在阿富汗失败，在伊拉克失败，在叙利亚正在失败。按照逻辑，美英帝国主义势力将会停止战争。数以万计的年轻美国士兵丧失了性命。数以百万计的世界人民因为战争死亡。几百万人因为战争成了难民。美英帝国主义势力会停止战争吗？回答是不会。

美英资本主义经济是战争经济。除了出售好莱坞影片和出售叫做美元的绿钞之外，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武器售卖者。这三种东西，是美国经济的主轴。

今天，军火工业主已经控制了白宫。对于军火工业势力渗透和控制美国政治的危险的警告，在艾森豪威尔总统（1953-1961年掌政）告别美国的演讲中公开表达了。

这个演讲，给了非常清楚的警告。前第二次世界大战将军，五星上将艾森豪威尔预测，如果美国人民不注意，有朝一日，军火工业主将控制全部美国政治。将军的这一预言，真的发生了。

有潜能区域的爆发

今天，佣人奥巴马承认自己当上总统实际上是由军火工业主推进白宫的。美国政治与金钱政治密切关联。美国的民主是金钱民主。要成为总统候选

人，他必须拥有几亿零吉的竞选费用。要有竞选基金打广告，游说媒体支持，建立遍及全国的支持网络。竞选机器也需要有美元。

奥巴马的第二轮竞选运动从2011年初到2012年6月，已经花费了4亿美元。这是美国竞选委员会正式报告中说的。而非正式的我们就不得而知了。这个佣人从哪里搞到这么多钱呢？答案是从军火工业游说团，从国际大公司游说团，从银行主和财政基金公司游说团那里。这就是，奥巴马成了资本家阶级的跑腿。这是事实。

军火工业主在奥巴马的竞选运动中投下了百万计零吉，当奥巴马胜利就任总统，他们就要索取武器合同了。他们要白宫通过国防预算给美国国防部，给五角大厦，给中央情报局，等等。这样的事情反复发生。正是由于这个制度，使到美国不会停止战争。

现在，我们看到美国在乌克兰怎样安装针刺戳俄国。我们看到在美国对伊朗和俄国的包围中叙利亚怎样成为牺牲品。我们也正在看到上星期发生在南中国海的危机，这只是开始。

日本、南韩和菲律宾都是臣服美国的殖民地。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不准拥有军队。而南韩和菲律宾则是美国在亚洲最忠实的跑腿。美国计划在2025年将它四分之三的军队驻扎在亚洲。美国的海军、陆军和空军都将转移到亚洲。在北约的美军将减少。东欧不再被视为威胁。转移武器到亚洲，被称为亚洲枢轴(Pivot Asia)。

这个亚洲枢轴战略将把中国定义为敌人。这个亚洲枢轴也把在亚洲的俄国视为将会帮助中国的同盟者。必须在东南亚搞紧张。这种紧张是需要的，以便成为美英帝国势力被邀请重回亚洲的原因。

除了南沙群岛，还有几个有潜能“爆发”和邀请美国进入。在菲律宾，菲律宾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人民军正在广泛发展。如果马尼拉政权受威胁，美军将伸入进来。

同样的战略也将发生在泰南四府。北大年人民解放斗争正在发展。这个局面也可能爆发。如果北大年独立运动威胁到泰国和曼谷，那么这样的气氛将邀请美英帝国势力。

马尼拉、首尔和曼谷将准备好成为美国的跑腿。CIA（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代理人以及伪装成伊斯兰斗士的CIA网络，将在需要时搞乱这一地区。反恐战争，自从9·11开始就实行的美国防务政策将成为亚洲枢轴的立足点。问题是，在这个亚洲枢轴中马来西亚扮演什么角色？

奥巴马，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战争
Obama, ISIS, Perang

14 Oct 2014

希沙慕丁莱斯 Hishamuddin Rais / 杨健燕译

'对于这种邪恶品种，你无法讲理，也无从谈判。唯一能让此类凶手明白的语言，是武力的语言，因此，美国将和一个广大的联盟合作，摧毁这个死亡网络。'——奥巴马的联合国演讲

大马人都知道叙利亚、利比亚、巴基斯坦、伊拉克和阿富汗正面临战争。我们都知道战争会带来伤亡、毁灭与痛苦。然而，这些战争没有停下的迹象，反而越演越烈。

多年来，巴基斯坦北部和阿富汗皆被无人驾驶飞机轰炸。巴基斯坦人民也面对着无情的战火，只不过不像伊朗、叙利亚和利比亚般被称作战争。

在战争的肆虐中，我们不难看见人类最先进的科技被利用来行使最恶劣的事。

1914年至1918年的世界第一次大战夺走了将近2000万欧洲人口。而1941年至19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夺走了6,000万至8,000万人命。这相等于当时世界总人口的2.6%。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单单俄罗斯就丧失了2000万人口。若大马也损失同等数量的人口，那意味着今天的大马人口将所剩无几。

世界第二次大战时，马来亚拥有439万人口。约10万人在日军袭击下丧生，这相等于当时 2.28% 的马来亚人口。

为何战争会发生？到底背后有什么原因导致战争被合理化？

美国是个帝国

战争，是权力争夺——战争，是领土的争夺——战争，是经济利益的争夺——战争，是市场的争夺——战争，是一个压迫者阶级和受压迫阶级之间的对立争斗。自古以来，战争都建立在财富争夺的基础之上。

在一个以盈利最大化为目标，而非以社会和谐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底下，战争将会一直存在。在这样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下，战争即是信条。只要资本主义一日还在，以争夺经济利益为主的战争就会不断发生。

今日的美国依然持有经济和军事霸权，美国拥有多达700个海陆空军事基地，散布在世界各地，美国就像旧时代的罗马，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

这些军队的目的在于确保各国资本家的经济盈利最大化受到保障。这是为了确保那1%政治与经济精英继续享有荣华富贵，而世界99%人民却继续成为他们的奴隶。

最近的9月中旬，美国在哥打　鲁和瓜拉登加楼登陆，这是英美犹太帝国主义势力成功把大马纳入网罗的最好例子。大马如今被划分为美国军队的自由区域。

此时此刻，国际社会也日渐意识到，美国才是在这片土地发动战争的罪魁祸首。而且还受到英国和以色列的支持。这股英美与犹太复国主义联合势力就是人类社会的破坏者。也是全世界各族的共同敌人。

美国和英国的人民难道未察觉这个现象吗？让我们来探讨美国国内所发生的事情，以了解美国帝国主义。

在1961年至1975年的越南战争里，超过56000名美国士兵牺牲。在伊拉克战争里共有36710人伤亡。在阿富汗战争中，则共有20904人伤亡。至今为止，一共57614名美国士兵在所谓的反恐战争中倒下。

为战争负债

战争不便宜。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考究显示，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事中，花费了超过6兆美金。

这6兆美元形同一个笑话，正当23,052,388个美国人生活在贫穷线上，甚至需要用粮票来换取政府的食物援助。这意味着，20%的美国居民，或5分之1的美国人正被贫穷包围。这是美国农业部于2013年的官方统计。

问题来了，难道奥巴马不明白这一点？难道白宫不知道贫穷正在所谓富饶的美国蔓延，为何6兆美元就这样白白挥霍在战争上，这样下去，美国岂非步向灭亡？

奥巴马不可能对此无所知觉，因为每个政府部门的资料，都会呈交到白宫的总统桌上。既然如此，为何战争依然延续？为何战事不就此停止，而把战事基金用于改善美国人民日益拮据的生活？

答案是，奥巴马与任何一位白宫总统一样，都没有能力终止战争，拯救颓败的经济。

美国政府欠下17.9兆美元国债——国债即是人民的债务。美国因为战争而负债累累。

富有的美国欠谁债？答案是：美国向中国、日本、韩国及其它国家发售债券。债券等如同意书。

即花未来钱，但用10-20年的时间来偿还债务及利息。马来西亚也有发行债券，但为了蒙蔽众人耳目，而称之为伊斯兰债券。

美国向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出售最多债券。联邦储备银行是家私人银行，成立于1903年，这家银行被允许印刷美钞。印刷出来的美钞，就被美国政府借去打仗和作为行政开销。

白宫剧场

听起来，笔者所写的东西，像是胡说八道。政府为什么要让一家私人银行印钱，然后再向这银行借钱。

听来奇怪，但这就是事实。联邦储备银行透过美国国会的允准而成立。它成功地营造了一份说辞。

今天的情况是，联邦储备银行控制着美国的经济，如同吉隆坡国家银行所扮演的角色一样。

差别是，国家银行是由政府拥有，然而，联邦储备银行隶属于姓名与股份皆被保密的银行主人。

除了印刷美钞，联邦储备银行也有权力调整其它银行的利息。它所拥有的权力非常大。实际上，联邦储备银行决定着谁将上任成为总统，或谁应该被支持进入白宫。

今天的局面，早已被艾森豪威尔总统言中。1961年1月17日，在他向美国人民的“告别”演说中，艾森豪威尔已经提醒，有一个“军事工业复合体”正在渗透美国的政治体系。艾森豪威尔总统说明若不铲除这个利益集团，将会给美国带来莫大的灾役。

艾森豪威尔总统被肯尼迪取代。有趣的是，在1961年4月27日，艾森豪威尔发表演说的3个月后，肯尼迪也在纽约瓦特罗夫酒店发表了内容一致的演说。

在世界第二次大战过去的这些年里，这个机密连线存在着，但他们的势力才刚尝试扩张进入美国的政治体系。中情局在1948年成立。今日，中情局已经开枝散叶，这个机构只是众多个筑墙捍卫美帝权力的机构之一，

今天，我们清楚看见，白宫只不过是一出舞台剧的道具，而它需要一个黑皮肤的演员来担任总统。在奥巴马或任何白宫住户的背后，总存在着艾森豪威尔总统所说的军工复合体。

有鉴于此，奥巴马总统上个月在联合国的演说，不过是代表着那些想要延续战争的军火工业主子。

跨峽雙橋迎戰友
成城眾志邁征途

Himpunan Nasional Kawan Karib Tahunan ke-7
Anjuran Persatuan Kawan Karib Pulau Pinang

Tema:

Bergabung Dalam Kepelbagaian untuk Keadilan Sosial

Pengenalan

Persatuan Kawan Karib Pulau Pinang yang menyandang pengerusi bergilir Persekutuan Persatuan Kawan Karib Kebangsaan untuk tahun 2014, telah diamanahkan untuk menganjurkan Himpunan Nasional Kawan Karib Tahunan ke-7.

Program Himpunan Nasional Kawan Karib merupakan aktiviti tahunan yang diadakan sejak tahun 2008, dan dianjurkan secara bergilir-gilir antara 7 buah Persatuan Kawan Karib peringkat negeri. Kini, program kini telah sampai ke tahun ke-7.

Ramai anggota Persatuan Kawan Karib dan juga organisasi persahabatan yang lain turut serta dalam himpunan ini pada tahun-tahun yang lepas, termasuklah mereka yang datang dari KL, Selangor, Perak, Pahang, Negeri Sembilan, Melaka, Johor, begitu juga mereka yang datang jauh dari Malaysia Timur, Singapura dan Indonesia.

Walaupun organisasi Persatuan Kawan Karib Pulau Pinang kecil dan sumber tenaga serta kewangan juga terhad, namun telah diberi kepercayaan untuk mengadakan Himpunan Nasional Kawan Karib tahun ini. Tujuan program ini selain daripada menghimpun semua rakan-rakan seperjuangan yang pernah berjuang bersama, juga mempunyai visi untuk memperkukuhkan usaha mengeratkan hubungan antara kumpulan masyarakat sivil berbilang kaum.

Himpunan ini akan diadakan pada 21 Disember 2014 (Ahad), bertempat di Dewan Besar Sekolah Menengah Han Chiang Pulau Pinang. Program kali ini selain mewujudkan platform untuk kawan-kawan lama mengenang memori perjuangan dan bertukar pandangan, akan adanya (1) satu forum yang julung kali diadakan dalam pelbagai Bahasa, dengan mengundang veteran dan anak muda dalam gerakan masyarakat pelbagai etnik, untuk membincangkan isu-isu semasa rakyat seluruh negara secara bersama; (2) penerbitan buku khas sebagai peringatan yang mengandungi tulisan yang padat dengan isi dan pelbagai Bahasa; (3) jamuan makan malam dengan persembahan kesenian berbilang kaum; (4) Pameran gambar dan video khas yang memaparkan sejarah perjuangan rakyat negara kita.

Satu jawatankuasa penganjur telah ditubuhkan untuk mengadakan Himpunan ini, dipengerusi oleh Dr. Toh Kin Woon. Kami berharap program ini dapat mengeratkan hubungan antara rakan-rakan seperjuangan lama dan bersama-sama berusaha untuk mewujudkan perpaduan kaum dalam perjuangan rakyat yang membawa masyarakat kita ke hadapan.

Jawatankuasa Penganjur Himpunan Nasional Kawan Karib Tahunan Ke-7
15 Jun 2014

跨峽雙橋迎戰友
成城衆志邁征途

Asal Usul Forum Perdana Sempena Perhimpunan Nasional Kawan Karib Tahunan Ke-7:

Ke Arah Menggabungkan kuasa Rakyat Di Bawah Hegemoni Korupsi

Kuasa progresif telah menjadi lemah pada hujung 60an dan pertengahan 70an akibat penindasan oleh rejim zalim. Kuasa progresif seperti gerakan pekerja, gerakan anak muda dan pelajar, kekuatan parti kiri juga menjadi lemah termasuk Pendaftaran Parti Buruh telah digantung. Kemudian suasana politik diganti oleh kebangkitan agama iaitu agama Islam, dan Kristian, serta Buddhisme.

Selepas peristiwa 13 Mei pada tahun 1969, UMNO melalui Dasar Ekonomi Baru sejak tahun 1971 dan siri polisi islamisasi untuk memperkasakan kawalan dan homogenisasi masyarakat Malayu, perkembangan parti progresif seperti Parti Rakyat juga disekat. Maka, ketidakadillan sosial, kemiskinan dalam masyarakat india pada 80an juga menwujudkan kumpulan progresif iaitu Alaiga dan CDC, kuasa utama dalam pembentukan Parti Sosialisme Malaysia (PSM). UMNO telah melaksanakan polisi satu aliran dan penindasan etnik, masyarakat Cina seperti Dong Jiao Zong dan Dewan Perhimpunan KL & Selangor juga memain peranan yang aktif, Gagasan Gabungan Tiga pada tahun 1982, tuntutan Huatuan pada tahun 1985, Gagasan Sistem Dua Parti pada tahun 1990, tuntutan (Suqiu) pada tahun 1999 dan sebagainya. Operasi Lalang yang berlaku pada tahun 1987 juga mempergaruhi persatuan mahasiswa Cina seperti Persatuan Bahasa Tionghua USM. Gerakan berdasarkan iss seperti gerakan femenis, gerkan orang asli, anti bukit merah dan sebagainya.

Krisis kewangan tahun 1997 dan gerakan REFORMASI tahun 1998, sekali lagi gerakan massa wujud sejak tahun 1974. REFORMASI pada tahun 1998 juga mewujudkan Barisan Alternatif yang menggabungkan hampir semua parti pembangkang dalam melawan Barisan National termasuk Parti Sosialis Malaysia yang masih tidak berjaya berdaftar. Selain daripada parti-parti politik, organisasi berdasarkan isu seperti Agenda Wanita untuk Perubahan, anti penswastaan kesihatan seperti Citizens Health Initiative, 17 suqiu (walaupun tidak mampu monbilisasi masyarakat Cina seperti 80an), mahasiswa dan anak muda, pemerhatian pilihanraya, kempen tandatangan 50000 orang pekerja perladangan menuntut kondisi yang lebih baik, Gabungan anti Empangang Bakun, Empangang Selangor yang menjejas orang asal dan sebagainya.

Pada tahun 2008, parti-parti pembangkang berusaha untuk menggelakan tiga penjuru telah menang lebih daripada 1/3 kerusi parlimen, dan juga memerintah di beberapa negeri. Selepas tahun 2008, sekali lagi mencetus gerakan massa yang lebih besar dan ramai anak muda terlibat seperti 9 Julai 2011 dan 28 April 2012 iaitu generasi Bersih. Di samping itu, pelbagai gabungan yang berdasarkan isu seperti ANAK, ROYALTY, SAMM, SMM, Gerakan Perubahan Ibu Bapa, BERSIH MAMA, SEED, Johor Yellow Flame dan sebagainya.

Selepas 5 Mei, UMNO teruskan memain isu-isu kerabat diraja, agama dan perkauman. Ke arah mana untuk teruskan perjuangan bagi rakyat yang ditindas, rakyat yang cinta tanah air dan mengejar keadilan sosial, anak muda dan mahasiswa, parti-parti politik, NGO yang berdasarkan isu?

Jawatankuasa Penganjur Himpunan Nasional Kawan Karib Tahunan Ke-7
Tarikh: 15 Jun 2014

Democracy And Social Justice – What Has Gone Wrong?

By Toh Kin Woon, Chairman, Organising Committee

Introduction

Over the last few years, millions in many cities throughout the world have taken to the streets in mass protests against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conditions in oppressive and/or socially unjust societies. There was the Occupy Wall Street Movement in New York, the uprisings in Egypt, Libya, Tunisia and Bahrain in the Middle East, the street demonstrations in Bangkok, the Bersih-organised street demonstrations in Kuala Lumpur and the Occupy Central in Hong Kong. What was the cause of all these massive outpourings of dissatisfaction and frustration across the globe? The answer may be found in this brief statement – **of the 1% by the 1% for the 1%**. Inequality in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income and life chances between the top and bottom rungs, leading to gaps that continue to yawn ever wider, is certainly one of the main reasons that have led to loss of hope towards their respective society among those who protested. Thomas Piketty in his much celebrated book,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has confirmed such trends in inequality in all capitalist societies. The rich data that he accumulated in his study confirm that the top 10% own 50%, and in some societies, as much as 90%, of all **wealth** (shares, properties, land and capital).

What is worrying is the fact that such trends are likely to continue, with little hope of the gap between rich and poor closing. The rich are likely to remain rich because of the passing down of wealth and opportunities from one generation to the next. In many societies, they often wield immense political influence, if not even hold power directly. They thus control many of the state organs, which in turn design policies that favour the rich and powerful. Social injustice in many countries has been exacerbated by the lack of space for dissent and freedom.

An autocratic oligarchic state in Malaysia

This is particularly true in the case of our own country Malaysia, which has long been described as an autocratic state that practises an oligarchic democracy. Like wealth distribution, political power here is concentrated in the hands of the few (the oligarchs) largely from, though not exclusively, UMNO. I say not exclusively, as heads of many organs of state power such as the Attorney-General's Chambers, the police, the bureaucracy, the judiciary and the Malaysian Anti-Corruption Commission, share in the exercise of such state power. Likewise, some Malay and Islamic-based non-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s (NGOs) such as Perkasa and Isma, and the media such as Utusan Malaysia, wield considerable influence on the direction of policy. Such influence, largely race and Islamic-based of the extreme and radical type, can be wielded only because UMNO and those in charge of the various organs of power have allowed them the space to do so; a space denied to

others that oppose UMNO.

The UMNO oligarchs have uninterruptedly held on to power since independence through an electoral system that is fraught with fraud, abuses, corruption, mal-apportionment and gerrymandering and sustained through resort to authoritarianism. Not only do these oligarchs hold and exercise political power, they abuse such power to sponsor and nurture capitalists. Together, they extract considerable rents through obtaining contracts to build massive infrastructural projects, public procurements, approved permits and concessions to extract timber.

A class divided society

Like other capitalist societies, Malaysia is very much a class divided society, with glaring social injustice marked by gross inequality in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and income. In 2007, the country's Gini coefficient was a high 0.46. In the same year, the top 20% of Malaysian households own 51% of national income while the bottom 40% own a mere 14.5%. The bottom 40% and even the middle 40% are likely to be increasingly burdened by higher costs of living. This comes with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fiscal system that encompasses reducing or even doing away with subsidies for the poor, introducing taxes that all have to pay (like the proposed GST) and rising costs of social services like housing and health care. These have been accompanied by tax reductions for the rich, leading to widening gaps between haves and have-nots. Meanwhile, the debt to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ratio of households is at a high 87% currently, showing many Malaysian households have to borrow to finance purchases of essential household items like houses, cars and electronic consumer goods.

These economic problems, from rising inequality to high household debts, together with the fiscal crisis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are the result of mismanagement, corruption, wastage and spending on non-essential items by state elites.

Contestations against oligarchic rule

Given such a poor governance record, Malaysians are not idle, however. Popular challenges by civil society and the opposition parties at the Federal level against misrule, abuses of state power, social injustice, the shrinking space for dissent, authoritarianism, racism, religious extremism and the pro-rich economic policies of the UMNO elites have emerged, launched and continued for a while. This is inevitable. For so long as there is oppression, there will be resistance against it. For so long as there is injustice and inequality, there will be struggles for both justice and equality.

But for these movements for justice and equality to succeed, a broad front of people from across all ethnic groups, religions, regions and gender that share the common ideals of equality, co-operation, harmony and mutual tolerance must successfully be forged. I have every confidence that it will be forged, as I believe Malaysians all want justice, equality, peace and harmony.

~ By Soon Hoh Sing
Translated By : Chai Yow San

DIVERSITY IN ETHNICITY, CULTURE AND LANGUAGE IN EDUCATION SYSTEM IN THE CONTEXT OF NATION BUILDING

The total world population is about 7 billion in number. The world is made up of thousands of diverse cultural groupings but there are only 193 members in the United Nation. It is a fact that other than the rare exceptions of Japan, Korea, Mongolia and Iceland, most nations exhibit different degree of diversity in ethnicity, linguistic groupings and education systems.

When a nation is not made up of a single cultural or ethnic grouping, such a nation should be termed as multi-cultural or multinational state. However as a result of the influence of the concept of European nation states since the 19th century, these diverse ethnic groupings or nation-states are still customarily referred to as nation states. The misnomer has led to much confusion and misunderstanding, even tragedies.

Deeply restricted by the concept of unity in nation state, many developing countries such as Malaysia cling on the attempt to build a nation state with one ethnicity, one language and one culture. The approach is not only outdated it even demonstrates elements of hypocrisy in the case of Malaysia,. It is said to be outdated because the concept of nation state is misleading. Except for only a handful of countries such as Japan, Korea , Mongolia and Iceland which are properly termed as monolithic nation states, the vast majority of other countries are all multi-ethnic or multi-ethnic groupings in composition. Race is a biological concept of individual species whereas ethnicity is a concept rooted in cultural groupings. On the other hand, most academicians would treat ethnicity or nationality as a political concept. İt is often used in the context of combining a specific territory and political organizations to form a country in the characteristic of a nation state.

A modern nation would inevitably continue to undertake the task of nation building. But there are always differences in approaches in such an undertaking. Generally speaking, there are three ways of achieving the goal. The first approach focuses on political values and systems in the form of liberalism and individualism. It highlights the concept of citizenship. It uses citizenship or the right to citizenship as a linkage for national unity. The right of citizenship, which is a form of membership, is more open and it consists a greater element of voluntarism and selectivity. The idea is to cultivate civic nationalism.

Another approach is to emphasize blood ties, culture or religion. It strives to cultivate ethnonationalism. This form of nation building consists of more elements of exclusivity, collectivism

and authoritarianism. Looking at the matter historically, countries such as Great Britain, America and Canada seem to be more oriented towards equality-before-the law type of individualism and citizenship nationalism. Russia and German before the second world war would favour the ethnonationalism approach. France took the middle path. Likewise most other countries would, to different degree, combine the principles of citizenship right and ethnonationalism.

Unfortunately, Malaysia favours ethnic principles rather than citizenship approach. It strives to build a nation state centred around the Malay Muslims. It uses Islam and the Malay language as the main structure in nation building. Ironically it also restricts religious freedom of the Malay and at the same time continues to use the indigenous versus non-indigenous and Muslims versus non- Muslim dichotomy. Obviously, it is a double sided and/or hypocritical approach in nation building. It is contradictory and at the same time nondescript. While attempting to build national unity centred around the Malay language it prohibits the sale of Bible printed in the Malay language to the non-Muslim public. On the one hand it attempts to place all students of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under one roof yet it promotes Islamization in schools. The process is one way traffic and unfair in that it makes easy for a non-Muslim to convert to a Muslim but extremely difficult for him to leave it. This unilateralism is clearly contrary to the contemporary concept of basic human rights and sense of justice. In practice, it tends to bring about the opposite effect of unity. A more reasonable and sensible thing to do would be to adopt the ideals of Civic State approach.

The approach entails that we treat political identity and non-political identity differently. After all,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 of contemporary liberal democracies is diversity. It only requires allegiance in their citizenry to the political system and home country without interfering in the varied and diverse individual and private life styles in the use or practice or adoption of different languages, religions, cultures, lifestyles and ideological beliefs. In reality, this is the basis of party politics in mature democratic countries where we have the left and right leaning political parties or environmental parties and so on.

Second, the existence of the contemporary civilised nations is rested upon the foundation of citizenship right which gives the power to the people. The purpose of the national's existence is to protect the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of individual citizens and not vice versa. Accordingly, all citizens enjoy equal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This is a basic principle which must be strictly guarded. In another word,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is the first and foremost recognized objective in civic nationalism.

Third, as long as fair and equal treatment is accorded to individual citizen, he is expected to swear allegiance to the homeland in which he was born and grew up. There is no need to engage in compulsory assimilation or the adoption of unilateral coercive measures such as the policy of the establishing national schools in education. It will only result in the imposition of discriminatory policy which leads to unnecessary uneasiness and dissatisfaction.

Fourth, instead of placing emphasize in form such as the requirement that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to attend the same school using the same language in classes, it would be more useful to focus on the contents of their learning. All Malays use the Malay language (the form) to study Islam (the contents). That does not reduce their knowledge of and identification with Islam. Likewise the study of learning

materials with local contents using their own mother tongue will not prejudice or reduce their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homeland. This is a very simple fact to be understood.

As a matter of fact, fair mother tongue education policy will promote identification with and allegiance for the home country. Fair treatment produces positive sentiments whereas discriminatory policies produce the opposite result.

Fifth, education, especially civic education should focus on teaching the concept of universal values and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in order to create a basic or minimum common values for the people which in turn form the basic code of governance and inter-ethnic communication. Such values include being tolerance, the acceptance of diversity, non-violence, practicing dialogue and consultation, respect for the individual and others, respect for the dignity of other ethnic groups or their family, treating each other as fellow citizens, embraci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the uphold of the rule of law and so on.

In Malaysia , the new generation of all ethnic groups understand the Malay language to certain degree. On the basis of respect for the Malay language and consolidating the mother language, communicating with each other never pose a serious problem. So it would be unnecessary to place too much emphasis on the role of a single language in creating national unity.

Sixth, dialogues should be on going in order to create a generally acceptable value of fair distribution of resources acceptable to all ethnic groups. After all, allocation or competition for resources is the main cause of inter-ethnic discord. Any human grouping is inevitably faced with this perennial problem. Generally speaking, contemporary civilised nations place more emphasis on the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and the guaranteeing of the basic livelihood of the people. As for affirmative action, it should be more concerned with teaching the weak the fishing skills, rather than simply giving away the fish. Only skills are sustainable in the long run.

Seventh, nations with diversity in ethnicity, language and education system will always be faced with a host of challenges. However, as long as the people in general have common universal values such as treating each other fairly, such challenges posed by diversity can provide a good opportunity to enhance the quality of the citizenry. In other words, it enable the citizenry to possess a common aspiration to make country an outstanding one such as the case of Switzerland. The achievement of this common aspiration will become the source of national pride for all which in turn serves as the best guarantee for national unity.

Eighth, in fact looking at the trend of the world today, multiculturalism has become an increasingly popular trend of thought. An ever increasing number of countries have adopted a policy of protecting the rights of the minorities and treating such policy as a protection of basic and fundamental rights, rather than simply threating it as a temporary measures or pragmatic compromise. In another word, multiculturalism is no longer an expedience but a basic principle. It is being used as a yardstick to measure the degree of civilization or moral progress of a country such as in the case of EU where fair treatment of the minorities has become a condition precedent of joining the EU membership.

~ By S. V. Chen
Translated By : **Chai Yow San**

A Study into the Dilemma and the Future of Multi-Cultural Co-existence in the Malaysian Context

Cultural issue is a troubling problem for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Malaysia. This is because it is not a simplistic cultural issue but in fact a combination of ethnic and political issue.

Malaysia is a unique and rather complicated plural society. The three major ethnic groups in Malaysia namely the Malays, the Chine3se and the Indians are somewhat segregated and have marked differences in terms of languages, culture, religion, custom,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tatus. Since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country more than fifty years ago, the politicalization of cultural issues has remained the biggest challenge i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ethnic groups in Malaysia. Any essential debate on cultural issue will often eventually turn into a political debate. Not surprisingly such cultural problem will find its final solution through political means. Therefore cultural integration is more difficult to achieve where ethnic problems and differences in religious beliefs and cultures are also involved.

In the final analysis, the implementation of ethnic-centralism based linguistic-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policy in a plural-ethnic society has become the root cause of the cultural problems in Malaysia and the difficul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inese community and the government.

Since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New Economic Policy in 1970, Malaysia has been moving towards an ethno-centralism and closed society. The rise of authoritarian politics makes it difficult to separate national mechanism from social problems. Under such constraint of limited pluralism, cultural integration is forced to drift towards cultural assimilation. Without sufficient political checks and balance, cultural strength cannot be manifested. The problem is made more acute with the mix of communal and religious elements.

Beside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ights, the Chinese community has continuously appealed to the government to review and adopt a more liberal approach whereby the multicultural needs and the use of mother languages of the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could be treated more fairly. However, the effort is always hindered and the government will never budge whenever the Malay status or special privileges are perceived to be involved.

It is interesting to compare Malaysia with Switzerland which is also a pluric-ethnic society. In Switzerland, the main German, French and Italian speaking populace look at their identity as a citizen of a nation first and foremost. They also place national interests before ethnic, religious and cultural identity. Improving ethnic relations and lifting the living standards of its citizens remain the main objective of the country. This enables stability and harmonious ethnic relationship and a strong sense of nationhood to be maintained. The fundamental difference lies in the equal treatment of its citizen regardless of ethnic background and never to link its public policies to ethnic identity. This goes to show that multi-cultural and linguistic society by itself does not impede national solidarity. On the other hand, mono-ethnic society is no guarantee to social harmony as we can see from the many examples of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In contrast, in Malaysia, the tendency of formulating its policies based on ethnic identity has become the main impediment to cultural acceptance amongst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Therefore, in the process of nationhood building, the ability to place more value on national identity and to provide a tolerant sphere to enable more effective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al and cultural affairs amongst its populace becomes our biggest concern.

Since the 1990s, the colonial economic structure of Malaysia has basically been disintegrated and a new social structure of modern development begins to emerge. The closed policy based on ethno-centralism has become a new impediment of this progress and it makes it difficult for Malaysia to take on the challenge of globalization. In order to overcome the impasse of modern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the government has begun to adopt a more "development orientated" instead of ethnic based economic policy.

The concept of "Vision 2020" was thus born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Its main aim is to make Malaysia a developed and industrialized society in the space of one generation, and to achieve a more balanced and wholesome development covering not only economic modernization but also includes political, social, spiritual, psychological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with the ultimate aim of creating a modern homogeneous "Malaysian". The new concept has no doubt created new space for ethno-cultural co-existence and it's development.

The impact of globalization and the homogenization of world economy together with the fast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ve not resulted in homogenization but instead diversification of world cultures. As a matter of fact, a mono-ethnic cultural society no longer exists today. Any attempt to create one is impracticable and thus unlikely to success.

History has shown us that cultural diversity is an important and precious world heritage. Without cultural diversification, human civilization would be a lot less interesting today. The European and Chinese cultures are able to survive and continue to thrive mainly because they are receptive of and are able to absorb the various cultural elements from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To be able to recognize and respect for differences is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survival of a tolerant and harmonious socie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diversification. The co-existence and interaction of different cultures is bound to bring about conflicts and harmonization. There are differences but also at the same time there is acceptance. Generally speaking, acceptance and harmonization of cultures plays a dominant role in cultural development in human history. Most of the conflicts are attributable to other causes rather than cultural differences.

The mutual receptivity and reciprocity in exchanges of different cultures is not a process of assimilation or colonization. It is a process of harmonization through natural competition. Cultural integration does not equal assimilation forcibly imposed by one culture over another. Ultimately, whether different ethnic, cultural and religious groups could live harmonious together or not, depend on how receptive we are and how well we deal with such differences in a positive manner. It is a test of our leader's wisdom, perspective, vision, courage and determination.

"Seeking harmony not sameness" is the value we are thriving for. If the value is commonly shared, we would be able to resolve a host of cultural conflicts in Malaysia. Improving ethnic relationship and solving the problem of cultural co-existence is in the heart of every Malaysian. It involves the common interests of the ethnic groups and the future of our nation. Hence the study of the problem is not only meaningful but also of practical importance.

(This is an Abstract of the M.A. Thesis written in Chinese by the author at the Nanjing University, China, in year 2004 . The English version was translated by lawyer Chai Yow San.)

PROMOTING ETHNIC HARMONY

~By Law Heng Neng 侯亨能

Unfortunately, in the last few months, many ethnic and religious conflicts frequently erupted in our country.

For example, the President of Ikatan Muslim Malaysia(ISMA) openly declared that Chinese were "invaders" of the nation.

Jabatan Agama Islam Selangor (JAIS) stopped an Indian lady, a supposedly Muslim-convert, from undergoing Hindu wedding ceremony, purportedly in support of Islamic authenticity.

JAIS also confiscated copies of the Malay-version and Iban-version of the Bible from a Christian church.

ADUN of Pulau Pinang, Raiya, an ethnic Indian, cursed UMNO as "Celaka" in the State Assembly meeting, and the door of his house was thrown a bloody cow head, which was obviously meant as a blasphemy to Hindu religion.

All these events greatly stirred the Chinese and Indian community. Except for being inconspicuous on faces, few are not in grudge and anger. Facial restraint is silence, silence oh silence, it's feared that things would turn out like what the famous Chinese writer Lu Xun said, "If you don't die in silence, you will blast in silence!"

A widely known "contra" of Malaysia, RPK, wrote in his blog, "Ethnic and religious polarisation has reached a point of no return. Malaysia is on the onslaught of the second version of May 13."

Even the DPM of Malaysia, Tan Sri Muhyiddin, lamented that, "If our ethnic conflicts continue this way, then no one can say that event (I don't want to say what month what day) won't happen again!" Who wouldn't know what month what day? None but May 13! No surprise that even a courtier as Utusan Malaysia would put it in parentheses "hinting May13！" (1)

It's the norm for the oppositionists to discredit the ruling party by saying that May 13 may happen again, in order to prove that since May 13, 1969, the ruling regime has been ineffective. However, this time round, even the ruling party chiefs themselves say it that way. It shows that the situation of our ethnic harmony must be on the precipice.

After May 13, 1969, the government implemented NEP and RUKUN TETANGGA. These two plans were drafted by a Dr Agoes Salim. Recently he said intriguing these words on the internet, "Ethnic polarisation now is worse than it was then!" (2)

Unfortunately, people like use fear, crisis and the end of the world, etc horror stories to gather attention. In my mind, the Law of Attraction tells us that this can only invite more negativities. When people are sunk in the doldrum of May 13, watch it, May 13 might indeed happen!

Therefore, we should change our minds to the positive mindset, think of the beautiful future, the scenario we want, our aspirations and our hopes and fancies. The American black human rights activist, Martin Luther King, Jr, did not yelled out "I have a bad dream". Instead, he cried out "I have a dream". A dream is an expectation, a desire. As a Malaysian, what are our dreams?

My dream is that one day we will see a harmonious Malaysia. The world is marching towards globalisation and multiculturalism. Malaysia is multi-ethnic, multi-linguistic, multi-cultural and multi-religious. Only with ethnic harmony will we be united to build the nation into one full of happiness, health, love and wealth. Hence promoting ethnic harmony is a measure in pursuit of worldly trends. It is more macro and holistic in comparison to many of our earlier pursuits. In the past, we would pursu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ducation, the promotion of Chinese culture. These are more within the confines of nationalism. But ethnic harmony would encompass a wider perspective, it involves multiculturalism, holism and macro-politics.

As a Malaysian Chinese, I have the opinion that we can do a couple of things to improve our nation's ethnic harmony, as described below:

1. Inclusivity

   Chinese always brag that they have a culture which is entrenched for five thousand years, and they easily look down upon others. We should discard this habit, and instead, should be inclusive of other ethnic groups. From the fact that the first emperor of Tang Dynasty, the greatest dynasty of China, Li Yuan, and the second emperor, Li Shi Min, were both descendents of the nomadic tribe of Xian Bei, Northern China, we can encourage Malays to not look down upon themselves, but to open their hearts and minds to be inclusive of others, learning from the best. In this way, I'm sure Malays can also emerge as a super race.

2. Make friends

   The top-notch speaker of China, Yu Shi Wei, spoke at Southern University College in 2012. He said, "Please do not forget that you live in a multi-ethnic country. The first question you should ask yourself is: how many Malay friends do I have?" I counted myself. I have only four Malay friends. I perspired in shame. If we Chinese do not start with asking ourselves how many Malay friends we have, and try our best to make more Malay friends, then whatever we say about promoting ethnic harmony are but lip service, useless.

3. Give first get later

   At this moment in time, Chinese are in possession of more material wealth and mental concepts than our brother ethnic groups. If we are good at giving and contributing, this will touch the hearts of brother ethnic groups. They will gradually develop more favourable impression of Chinese generosity and holistic mindedness. It is akin to one proverb which says, It's valuable to be generous and give away, for giving away first you will get back later.

Reference

(1) 5-7-2014/www.themalaysiantimes.com.my/may-13-might-repeat-says-Muhyddin/
(2) 12-5-2009/jpt.mohe.gov.my/ARKIB%20dan%20PENERBITAN/keratin%20akhabr/Mei09/1205/New%20Straits%20Times/Mei-12-3.pdf/

~ Bock Tai Hee
Terjemah Oleh Choo Chon Kai

Mendirikan Sekolah Cina, mewarisi budaya, mempertahankan maruah

1. Tolak Asimilasi secara paksa

Mengikut perangkaan, terdapat seramai lebih kurang 40 juta orang berketurunan cina bertaburan di seluruh dunia, antaranya 80% di Asia Tenggara. Penduduk di Malaysia tidak ramai, dengan jumlah penduduk lebih kurang 30 juta, antaranya lebih kurang 23% adalah orang cina (lebih kurang 6 juta). Orang cina di Malaysia sama dengan orang cina di negara lain di Asia Tenggara, selepas adanya rezeki (kerja untuk hidup), keselamatan (bina kuil), mereka membina sekolah supaya anak cucu mendapat pendidikan, berpelajaran, dan berbudaya, menjadi seorang cina yang mirip dengan orang cina, kemudian terus berkembang.

Pendidikan cina di Malaysia mempunyai sejarah perkembangannya yang hampir 200 tahun. Pendidikan cina di sesetengah negara Asia Tenggara mempunyai sejarah yang lebih panjang. Selain Malaysia, pendidikan cina di negara Asia Tenggara yang lain telah tergendala secara paksa atau dihapuskan saa sekali atas sebab-sebab politik. Orang cina di tempat-tempat itu diasimilasikan dengan sepenuhnya.

Mengapdakah pendidikan cina dan orang cina di Malaysia berkecuali daripada itu?

2. Gerakan Pendidikan Cina

Malaysia (yang dikenali sebagai Malaya sebelum ini) mencapai kemerdekaan daripada penjajah British pada tahun 1957. Pada zaman 1950an sebelum merdeka, orang cina di disi sudah memiliki sistem pendidikan cina yang lengkap: mewujudkan lebih 1300 buah sekolah rendah cina, hampir 100 buah sekolah menengah cina dan sebuah universiti (Universiti Nanyang). Selepas lebih 50 tahun negara kita merdeka, sekolah rendah cina hanya tinggal lebih kurang 1280 buah (walaupun bilangan pelajar bertambah daripada 200,000 ke 60,000 hari ini). Sekolah menengah cina diasingkan daripada sistem pendidikan negara, masyarakat cina menubuhkan semula sekolah menengah cina dengan cara berdikari, yang bergelar "sekolah persendirian".

Di Malaysia, kerja-kerja mempertahankan dan memperkembangkan usaha pendidikan sekolah cina biasanya dikenali sebagai "Gerakan Pendidikan Cina". Gerakan Pendidikan Cina diwujudkan atas dua asas, yang pertama adalah hak asasi manusia, yang satu lagi adalah pendidikan Bahasa ibunda. Mendapat pendidikan dan mewarisi kebudayaan melalui bahasa ibunda adalah hak asasi manusia. Hak ini tidaka boleh dicabul dengan perundangan yang dibuat oleh kaum majoriti. Mempertahankan proses pembelajaran dengan bahasa ibunda adalah disebabkan seluruh dunia sudah mengiktiraf bahawa ini Bahasa ibunda merupakan medium pengajaran yang paling efisien. Selain itu, bahasa ibunda

dan budaya asal sesuatu kaum adalah unsur penting yang diperlukan untuk pembangunan personaliti yang sempurna, berkeyakinan diri dan bermaruah.

3. Perlawanan antara pluralisme dengan doktrin satu bahasa

Pada awal kemerdekaan, dasar pendidikan kerajaan telah menetapkan "matlamat terakhir pendidikan kebangsaan", iaitu hanya ada satu aliran pendidikan, iaitu pendidikan Bahasa melayu.

Matlamat perjuangan Gerakan Pendidikan Cina adalah menentang dasar pendidikan yang monism ataupun bersifat asimilasi, dan menuntut ruang untuk perkembangan pelbagai budaya. Boleh dikatakan begini, sejarah pendidikan cina di Malaysia merupakan sejarah perjuangan masyarakat cina dengan dasar pendidikan yang berdoktrinkan satu Bahasa.

4. Tuntutan Demokratik

Menghormati satu-satu bahasa dan budaya tetapi menafikan budaya dan bahasa kaum yang lain dalam kedudukan sebuah negara, menghadkan penggunaan dan perkembangannya, malah memonopoli kuasa tafsiran "pendidikan aliran utama", menolak pendidikan bukan melayu, merupakan perbuatan yang menghalang proses perkembangan demokrasi dan melanggar semangat demokrasi.

Dengan mempraktikkan demokrasi, budaya pelbagai kaum mendapat penghormatan, perhatian dan perlindungan yang samarata. Setiap kaum menikmati hak untuk menggunakan Bahasa ibunda, menerima dan memperkembangkan pendidikan ibunda. Ini merupakan antara tuntutan kaum minoriti seperti orang cina dan orang india di Malaysia.

5. Hasil perjuangan

Orang cina di Malaysia menderma lebih kurang RM 200 juta setahun untuk mengekalkan dan memperkembangkan sistem pendidikan cina, iaitu di lebih 1280 buah sekolah rendah cina, 60 buah sekolah menengan persendirian cina dan 3 buah kolej yang ditubuhkan oleh masyarakat cina. Selepas Universiti Nanyang ditutup pada tahun 1980, menwujudkan sebuah university Bahasa cina merupakan impian dan matlamat perjuangan masyarakat cina.

Dengan adanya sistem pendidikan cina, hampir 100% orang cina di Malaysia faham Bahasa cina, boleh tulis dalam Bahasa cina, dapat bertutur dalam Bahasa cina dan boleh menyambung budaya cina. Sekolah menengan cina persendirian yang ditubuhkan hampir 50 tahun, dengan sijil Unified Examination Certificate (walaupun masih belum mendapat pengiktirafan daripada kerajaan Malaysia), graduan sekolah-sekolah ini boleh belajar di mana-mana universiti seluruh dunia. Universiti-universiti bertaraf dunia seperti Universiti Tsinghua, Universiti Peking, universiti-universiti di Hong Kong, Singapura dan lain-lain telah memberikan biasiswa kepada lepasan sekolah menengah cina persendirian dari Malaysia untuk melanjutkan pelajaran. Kadar melanjutkan pelajaran untuk graduan

sekolah menengah cina persendirian mencapai hampir 80%, lebih dua kali ganda daripada pelajar sekolah menengah kerajaan.

Dengan hasil perjuangan di atas, masyarakat orang cina telah mencapai satu keajaiban budaya dan pendidikan yang "memperkembangkan pendidikan Bahasa ibunda, mewarisi budaya bangsa dan mempertahankan maruah bangsa".

(Tulisan ini merupakan garis ucapan untuk kertas kerja yang dibentangkan oleh penulis pada bulan September 2008, semasa diundang menyertai "Seminar Pendidikan Cina" di Beijing sebagai pengetua Sekolah Menengah Persendirian Chung Hwa Kelantan. Data dalam tulisan dikemaskini pada 2014.)

'Ketuanan rakyat' not *'ketuanan Melayu'*

~ BY DR. SYED HUSIN ALI 4 SEPTEMBER 2008

[One book that grabs our attention is Syed Husin Ali's"The Malays: their problems and future". We carry the author's remarks at the launch in which he proposes that "ketuanan rakyat" should replace "*ketuanan Melayu*".]

Allow me to begin by narrating a little experience as a prisoner of conscience which has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 writing of my book. As some of you might already know, I was arrested under the ISA in December 1974 together with Anwar Ibrahim, following the hunger march of about 25,000 peasants in Baling. More than a thousand students and staff of the universities were arrested for demonstrating in KL to support the march.

About a dozen students, ex-students and lecturers, including both of us, were subsequently sent to Kamunting.

Written in the mind

After 20 months in that detention camp, I was taken to KL with the promise of release. Later Anwar was also taken there and indeed released before his two years was up. But I was put under solitary confinement in an unknown holding centre to be observed and dissected by a team of Special Branch operatives for more than six months. The outcome was that I had to continue being guest of the Agong for an additional four years. Of course, combined with his period of incarceration following a kangaroo court trial that took place after his sacking, Anwar managed to break my six year record.

In that unknown centre I was under intense interrogation for hours on end, sometimes without sleep, by a regular shift of officers, some playing kind and some not acting but really cruel. I experienced being spat on, insulted, slapped, beaten or left on many occasions in my cell of eight by eight feet in total darkness. I am sure the same experiences have to be borne by the majority of detainees in Kamunting now, who have been there nearly six years.

Somehow or other, I managed to stop my tormentors continuing to spit or slap merely by smiling or offering the other cheek. I also learnt to hear the sound of but not listen to their threatening tirades. Admittedly, what I found most difficult was to surmount the psychological feeling of loneliness and abandonment in the dark cell. I need not elaborate on these because they have been narrated in my "Two Faces".

Please bear with me a little bit more about the excruciating experiences in my lonely cell. One of

my senior interrogators proudly said he could destroy the only thing I have, my mind. This was after I refused to be coerced into implicating Dr Rajakumar, yes, this Rajakumar as a pro- communist and admitting that I was the intermediary between the then DPM Dr Mahathir Mohamad and the communist underground.

Had I admitted, perhaps the Minister of Home Affairs then, Ghazali Shafie would have made sure that he would replace Mahathir as DPM and then proceeded to become PM. Then we would have had a different type of problems for the country.

Some people asked: "Why didn't you admit? You could have saved us from Mahathir's and now Abdullah's rule." Of course I would not admit to such a blatant lie. Further any admission would certainly be used as a new ground to extend my detention. Anyhow, Ghazali still signed my two-year extension because the SB officers found I had not been rehabilitated.

Every time I was abandoned in the cell, I would inevitably do three things, to make sure my body and mind remained strong. First, exercise, mostly by pumping and jumping up and down. Second, pray and recite whatever verses of the Qur'an I remembered. Third, sing some old English and Malay tunes that I was familiar with. But these were not sufficient. I wanted to do something more to keep my mind more active.

It was at this time that I remembered a suggestion from my friend Rajakumar, conveyed through my wife during my early days in Kamunting, to write a book on Malay values. But this topic was too specific and needed deep research.

So I chose something easier. Whenever I was left in the cell, I thought about and planned this book. After a few months I had practically every page of all chapters clearly written in my mind.

When I was taken back to Kamunting and separated from the other detainees, I had all the time to myself to furiously type out the whole thing within three weeks. So you see, that is the genesis of my book. That is why I have chosen my two long standing and respected friends – Raja and Anwar – one to speak on the book and the other to launch it.

A deterioration

It was before the recent general elections that I decided to update and revise it. I dare say that the Malay problems as I saw them from the dark cell I was dumped into three decades ago have not changed very much. Granted there have been improvements in certain aspects of the conditions of the Malays, but in some others they have indeed deteriorated.

It is true that the incidence of absolute poverty among Malays has decreased, but relative poverty has increased as the gap between the rich minority and the poor majority has widened. It is true there are more Malay new rich produced through the government development programmes, but concentration of wealth and corruption are becoming more chronic especially at the highest level in Malay society. Many new towns have been built with beautiful roads and unnecessary decorative bridges, but the condition of some Malay villages appear to have remained the same since Merdeka.

It is true that there are more Malays who are highly educated and have become successful professionals, but there is alarming deterioration in moral and ethical values among a growing number of Malays, including those holding important public offices. At the same time, there is also an increase in all kinds of criminal as well as anti-social activities. It is true that there are many Malays who have

built ostentatious palaces for themselves from the country's wealth they have robbed. But many in the rural areas still live in run-down huts and study in ill-equipped schools, sans electricity and tap water, while a large number in urban slum areas are living in constant fear of forcible eviction.

I am not suggesting that these are exclusively Malay problems. They are also shared by other communities – the Chinese, Indian, Iban, Kadazandusun and many others. But, as I have statistically shown in the book, comparatively a larger proportion of Malays are still lagging behind the Chinese especially and even the Indians too, in income, education, housing and so forth. This, ironically, prevails despite the so-called "ketuanan Melayu" (Malay supremacy), constitutional guarantees on the Malay special position and the New Economic Policy (NEP).

Admittedly, this country has witnessed a lot of development especially after the NEP. But unfortunately, they emphasise more on economic rather than social and human development. At the same time, they stress more on physical or material rather than moral or ethical development. There is more allocation on wasteful mega projects to provide big contracts and commissions to cronies rather than providing social facilities for the greater benefit and welfare of the ordinary people, especially the disadvantaged groups.

Who do I mean by the disadvantaged groups? Of course, basically they are the poor in the lower class. But I must say, they also include the middle income groups who can hardly afford decent living because of their big families to support and the ever-rising prices of daily essentials. In fact, I would not exclude also the professionals, executives, businessmen and others in the upper- middle class who often face discrimination because of their ethnic background or political association, for example.

These disadvantaged groups are from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and not confined only to the Malays. But those who form the majority are the poor and low income groups, the bulk of whom are Malays.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the perception and the reality toa large extent is that the Malays from the privileged groups are the greatest beneficiaries. Even the poor and disadvantaged Malays are not given their due share.

Broader approach needed

Several observations need to be emphasised here. First, poverty and low income, although largely are not exclusively Malay problems. There are Orang Asli in the Peninsula and Orang Asal in Sabah and Sarawak who are in more oppressive conditions than a large number of the Malay poor. There are Indians and Chinese in the estates and slum areas who are poor too. But just because their number is small it does not mean we can afford to neglect and exclude them from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Be that as it may, the fact to be stressed is that the Malays constitute the big majority of the poor and deprived in the country. So, primary attention must justifiably be focused on them; but there is no justification for neglecting the non-Malays in a similar or sometimes worse plight.

Second, in the name of the Malays as a whole, a small coterie of those in advantageous positions have managed to use or abuse the NEP and the constitutional provisions on Malay special position to enrich themselves. In most cases they succeed, though many of them only temporarily, on the basis of "know who" and not "know how". The privileges they enjoy are often misinterpreted as those of the whole Malay community. Ironically, beyond beautiful rhetoric, there has been insufficient sensitivity and commitment among many Malay government leaders towards the poor who are the majority

Malays.

At the same time, many non- Malay capitalists have become wealthier than the leading Malay corporate figures enjoying special support and sponsorship.

Although far from being Bumiputera, they are able to enjoy the benefits from the big allocations for development under NEP projects, primarily through their "know who" links with powerful politicians whom they can often easily buy off. They certainly have more privileges than the ordinary Malays.

Third, the persistence of absolute poverty and deterioration of relative poverty affect access to good education, health services, housing and so forth among the poor. Since the majority of Malays are poor, they are most adversely affected. Again this plight is not the monopoly of just the Malays for they are shared also by the poor from other ethnic groups. The cause of all these can be traced to the existing socio-economic system and government policies, which are strongly rooted in the dominating free enterprise (laissez faire) philosophy.

There is something inherent in this system and the policies that work against the interest of the poor and the weak. With the influence of globalisation (a new form of colonialism), the prevailing political power structure and the dominating free enterprise philosophy, the system favouring the rich few will persist for quite some time. There is a great need to temper this system with humanitarian and egalitarian values and programmes. There is still need for positive discrimination. But it should be based not on ethnicity, but on necessity that cuts across ethnic line.

I share the view that after nearly forty years, there is a need to reappraise the NEP and replace it with a new Malaysian Economic Agenda (MEA) as mooted by Anwar and accepted as PKR party policy. This agenda contains the following important ingredients:

- it focuses on the poor and disadvantaged, with social facilities provided more for their welfare and emancipation,
- it introduces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evelopment programmes for the Malay rural poor, but providing similar opportunities and treatment to the other ethnic groups, cutting across ethnic boundaries,
- it restricts powerful political leaders and their cronies accumulating wealth from filthy sources and by dirty means,
- it wages effective war against corruption, waste and mismanagement, and
- it empowers the people, particularly the poor and disadvantaged Malays, so that they can be liberated from slavish mentality and have the courage to promote and defend their basic economic and social rights.

The idea of replacing the NEP with the MEA is to generate balanced development to achieve social justice through fair and equitable distribution of the country's economic and social resources. Since the policy and orientation of MEA is based on the dictum of kepedulian rakyat i.e. concern for the plight of the people, the poor in particular, it will certainly be most advantageous to the Malays who form the majority poor. At the same time it can guarantee greater ethnic stability because the non-Malays are included in the equation. What is needed is ketuanan rakyat (people's supremacy). This is the way forward.

Oleh: **Dr Syed Husin Ali**

Malaysia Baru : Merdeka Rakyat Dan KEADILAN

Walaupun rencana ini diterbitkan 7 tahun dahulu, tetapi masih sangat releven dengan perkembangan semasa.

Negara sudah merdeka 44 tahun, akan tetapi dalam berbagai-bagai bidang, seperti ekonomi dan politik, sebahagian besar rakyat masih belum bebas. Bahkan dari segi fikiran mengenai sejarah kemerdekaan pun, sebahagian ramai rakyat terus terkongkong, terutama oleh pelbagai "dongeng" yang sengaja dilanjutkan melalui saluran buku sekolah dan propaganda pemerintah.

Ada dua tradisi atau aliran yang jelas dalam sejarah perjuangan kemerdekaan di negeri ini, seperti di banyak negara Asia-Afrika-Amerika Latin yang pernah mengalami penjajahan jua. Tradisi pertama ialah penentangan terhadap penjajahan secara habis-habisan untuk mendapatkan kemerdekaan yang penuh. Tradisi kedua ialah berkompromi dengan penjajah sehingga sanggup menerima saki-baki sistem ekonomi, politik, perundangan dan pendidikan yang diwarisi dari penjajahan.

Di Malaysia, kedua-dua tradisi ini wujud. Akan tetapi, tradisi pertama telah berjaya dikalahkan oleh pihak penjajah British, yang kemudiannya memberi dorongan serta sokongan untuk kemenangan tradisi kedua. Pimpinan daripada tradisi kedua ini terdiri dari golongan atasan masyarakat yang memang mudah bekerjasama dengan pihak penjajah. Golongan tradisi kedua ini, selepas menang, telah menyebarkan berbagai-bagai "dongeng" tentang perjuangan untuk kemerdekaan negara. Mari kita lihat sesetengah daripada "dongeng" tersebut.

Dongeng pertama, perjuangan kemerdekaan bermula hanya selepas Perang Dunia II berikutan penentangan terhadap percubaan Mahkota British hendak memaksakan pembentukan Malayan Union. Sebenarnya, perjuangan mempertahankan kemerdekaan negara dan kedaulatan rakyat telah bermula lebih awal dari itu, dengan penentangan pembesar dan rakyat Melaka, di bawah Bendahara Paduka Raja, terhadap serangan serta penaklukan oleh Portugis pada tahun 1511.

Selepas itu, dalam abad ke-19, apabila penjajah British, dengan kerjasama sesetengah Sultan serta pembesar, berjaya mencerobohi masuk untuk menakluki Semenanjung Melayu, ramai pembesar lain telah memimpin rakyat biasa untuk bangun menentang. Di antara mereka ialah Maharaja Lela (di Perak), Tok Janggut (di Kelantan), Orang Kaya Semantan serta Mat Kilau (di Pahang), Datuk Naning (di Melaka), dan ramai lagi. Perjuangan mereka disambung oleh Abdul Rahman Limbong (di Terengganu).

Dongeng kedua, UMNO (dan Perikatan, selepas penyertaan MCA dan MIC) adalah satu-satunya yang menjayakan pergerakan untuk kemerdekaan. Ini tidak tepat. Walaupun kemerdekaan telah diserahkan oleh British kepada Perikatan (yang dipimpin UMNO), namun sebelum itu sudah ada parti dan gerakan yang

merintis jalan ke puncak kemerdekaan.

Sebelum Perang Dunia Kedua telah wujud Kesatuan Melayu Muda (KMM) dan juga Persatuan Melayu di beberapa buah negeri yang telah mula menyemai benih kemerdekaan. Tidak boleh dinafikan bahawa Parti Komunis Malaya (PKM) juga memainkan peranan dalam perjuangan ini. Selepas perang itu telah tertubuh pula Parti Kebangsaan Melayu Malaya (PKMM) berserta Angkatan Pemuda Insaf (API) dan Angkatan Wanita Sedar (AWAS), dan juga Hizbul Muslimin (HM).

Dalam perjuangan untuk kemerdekaan PKMM (mewakili golongan nasionalis), HM (mewakili golongan agama) disertai oleh unsur dari PKM juga, telah merapatkan kerjasama. Mereka menjadi meluas di bawah payung lebih besar yang dikenali sebagai PUTERA-AMCJA (All-Malayan Council for Joint Action), untuk memperjuangkan kemerdekaan penuh. Di antara tokoh-tokoh yang terkenal ialah Ahmad Boestamam, Dr Burhanuddin Helmy, Ishak Hj Muhammad, Abu Bakar Bakir, Abdullah C.D., John Eber dan juga Tan Cheng Lock (sebelum memimpin MCA).

Tun Ismail Abdul Rahman, yang pernah menjadi Timbalan Perdana Menteri, sewaktu berucap di satu majlis Konvokesyen di Universiti Sains Malaysia (USM), selepas dianugerahkan ijazah kehormat pada tahun 1973, telah menyatakan bahawa sumbangan golongan kiri yang diwakili oleh pertubuhan serta pimpinan yang tersebut di atas perlu diiktiraf dalam perjuangan kemerdekaan. Malangnya banyak pertubuhan ini telah diharamkan dan ramai di antara pemimpin mereka dipenjarakan oleh penjajah Inggeris. Dalam kekosongan yang timbul berikutannya, British telah menggalakkan perkembangan UMNO (dan Perikatan). Sekali lagi dua tradisi perjuangan kemerdekaan yang disebutkan di atas telah kelihatan.

Dongeng ketiga, perjuangan kemerdekaan di negeri ini ialah perjuangan orang Melayu saja, dan oleh itu nasionalisme yang timbul ialah nasionalisme orang Melayu. Memang benar bahawa orang Melayu memainkan peranan yang penting dan utama dalam menentang Malayan Union dan menuntut kemerdekaan selanjutnya. Pada asas permulaannya perjuangan ini bertujuan untuk menyelamatkan kedudukan raja-raja Melayu yang menjadi lambang kedaulatan orang Melayu.

Itu sebabnya slogan perjuangan UMNO dari mula ialah "Hidup Melayu", yang sempit skopnya dan boleh dianggap sebagai mempunyai unsur perkauman. Dalam tahun 1946, Kongres Melayu dan UMNO tidak menerima cadangan PKMM supaya digunakan slogan "Merdeka". Hanya beberapa tahun kemudian baru UMNO menerima slogan ini. Itu pun lama selepas British mengisytiharkan Undang-undang Darurat, mengharamkan beberapa parti politik serta gerakan pekerja kiri, menahan beribu-ribu pejuang kemerdekaan tulen dari PKMM, API, AWAS, HM serta PKM, dan memaksa ramai pemimpin serta anggota komunis dan nasionalis meneruskan perjuangan dari hutan rimba.

Terutama sekali sebelum perisytiharan darurat itu, penyertaan orang bukan Melayu dan mereka yang berpendidikan lain daripada pendidikan Melayu boleh dikatakan besar juga. Perjuangan orang Melayu dalam PKMM mendapat sokongan sebahagian daripada orang bukan Melayu dalam berbagai-bagai parti atau pertubuhan. British mencurigai mereka kerana semangat anti-British mereka yang kuat untuk memperjuangkan kemerdekaan penuh dalam semua bidang.

British juga bimbang kerana mereka melambangkan gerakan pelbagai kaum yang boleh bersatu dan tidak

akan mahu bersubahat dengan penjajah. Itu sebabnya penjajah British mematahkan gerakan mereka yang progresitf dan pelbagai kaum itu dan menggalakkan perkembangan UMNO (serta Perikatan) yang lebih mudah dikawal. Dengan kerjasama pemimpin-pemimpin UMNO, MCA dan MIC, penjajah British telah Berjaya mengalihkan permusuhan rakyat daripada penjajahan British serta kezalimannya kepada pejuang-pejuang kemerdekaan (terdiri dari nasionalis dan komunis) yang masuk hutan serta kekejaman mereka. British berjaya melaksanakan dasar pecah-pecah dan perintah.

Dongeng keempat, kemerdekaan tidak akan berjaya dicapai seandainya tidak dengan pimpinan golongan atasan Melayu, Cina dan India dalam UMNO, MCA dan MIC, yang kemudiannya bergabung tenaga dalam Perikatan. Memang benar bahawa golongan atasan Melayu (terdiri daripada bangsawan dan pegawai), golongan kapitalis Cina (terdiri daripada peniaga yang bekerjasama dengan syarikat-syarikat besar Inggeris atau tidak) dan juga golongan atasan India (terdiri daripada ahli perniagaan dan juga profesional), memainkan peranan yang penting. Akan tetapi mereka tidak akan berjaya sekiranya tidak mendapat sokongan daripada rakyat biasa dari golongan bawahan dan juga pertengahan.

Sebenarnya, sebelum perisytiharan darurat, parti-parti yang wujud mempunyai pimpinan daripada golongan pertengahan, seperti guru, wartawan dan sebagainya. Begitu juga, pertubuhan pekerja yang terdiri dari semua kaum bergerak begitu cergas sekali untuk memperbaiki taraf hidup mereka. Pergerakan mereka ini dihubungkan dengan perjuangan untuk kemerdekaan, kerana mereka melihat bahawa penindasan yang dilkaukan oleh penjajahan Inggeris melalui agensi-agensi perdagangan dan juga ladang serta lombong, mengakibatkan taraf hidup mereka yang rendah. Akan tetapi perjuangan golongan buruh ini dicap sebagai dipengaruhi komunis. Mereka diharamkan dan ramai pemimpin mereka dipenjarakan. Sesungguhnya kita tidak boleh melupakan sumbangan rakyat jelata dari semua kaum, khususnya dari golongan pekerja, untuk perjuangan kemerdekaan tulen negara.

Dongeng kelima, kepercayaan meluas bahawa Merdeka di negeri ini telah dicapai secara aman dan tanpa tumpah darah, tidak seperti sesetengah negeri lain. Ini sebenarnya kepercayaan yang silap. Banyak nyawa telah melayang apabila rakyat Melaka berjuang dengan berani menentang penjajah Portugis, yang menggunakan kapal serta meriam, dengan bersenjatakan hanya keris, tombak dan panah saja, demi mempertahankan kedaulatan mereka. Begitu ramai rakyat yang maut atau cedera, dan banyak keluarga yang merana serta kampung binasa, apabila pembesar Melayu serta pengikut mereka cuba menangkis kakitangan penjajah Inggeris yang menyerang dengan meriam dan senapang untuk menakluki negeri-negeri Melayu dalam abad ke-19.

Begitu juga, dalam perjuangan selepas Perang Dunia II, beribu-ribu yang terkorban dan menderita apabila penjajah British bertindak ke atas apa yang mereka tuduh sebagai penderhaka komunis dan penyokong-penyokong mereka. Akan tetapi, seperti diakui oleh banyak pihak, termasuk Tun Dr Ismail dalam ucapan penerimaan doktor kehormat di USM pada tahun 1973, ramai jua di antara mereka yang sebenarnya turut berjuang untuk Merdeka. Perang kita bagi pihak penjajah British terhadap komunis, tidak harus diagung-agungkan lebih daripada perjuangan kita menentang penjajahan British untuk mencapai Merdeka.

Akhirnya, selepas 44 tahun merdeka, kita masih belum tahu lagi mengenal, mengiktiraf dan menghormati semua golongan yang telah turut serta memperjuangkan kemerdekaan kita. Sungguhpun pimpinan hari ini membuat percubaan untuk mengubah orientasi pro-British (atau pro-Barat) di awal kemerdekaan kepada yang

bersifat lebih anti-Barat, namun percubaan itu tidak begitu berkesan. Saki baki penjajahan dari segi ekonomi, politik, perundangan dan ketenteraan semakin jelas ketara. Walaupun proses globalisasi sering dikritik, namun pimpinan pemerintah tidak berjaya mengurangkan, apatah lagi menangkis akibat, penjajahan bentuk baru ini.

Rakyat jelata dari golongan bawahan mengharapkan pembelaan dari segi ekonomi daripada kemerdekaan. Akan tetapi, kini pembahagian kekayaan negara semakin tidak adil. Kekayaan dan keistimewaan menjadi monopoli sebilangan kecil saja yang rapat hubungan dengan pucuk pimpinan pemerintah. Walaupun pendapatan per-kapita meningkat, namun jurang di antara yang kaya dan miskin bertambah lebar. Amalan pilih kasih dan rasuah semakin meluas. Kehidupan rakyat jelata semakin sempit. Pucuk pimpinan BN semakin bersifat kuku besi.

Semangat perjuangan Merdeka yang tulen semakin malap sekarang ini. Kita perlu ingat bahawa apabila ibubapa kita dahulu mengorbankan nyawa, tenaga serta wang mereka untuk Merdeka, mereka hendak mengembalikan kebebasan, maruah serta martabat kita sebagai satu bangsa. Sesuai dengan semangat gagah perkasa mereka, kita harus meneruskan perjuangan untuk merdeka daripada penjajahan semula oleh mana-mana kuasa; merdeka daripada pemerintahan zalim serta tidak adil yang bertambah oleh seorang pemimpin; merdeka daripada pengumpulan kekayaan secara rakus oleh segelintir yang terpilih; merdeka daripada kemiskinan serta penindasan, merdeka daripada korupsi serta kronisme di kalangan mereka yang paling berkuasa; merdeka daripada ketakutan serta prejudis antara kaum, merdeka daripada segala undang-undang serta peraturan yang zalim dan menekan; merdeka daripada penguasaan segelintir orang dari pemerintah ke atas kehakiman, polis dan media, dan bermacam-macam lagi.

Sejak kita merayakan hari kemerdekaan ke-40, negara dan rakyat telah melihat berbagai-bagai peristiwa. Krisis ekonomi yang melanda dan kezaliman yang dilakukan ke atas Anwar Ibrahim telah membawa banyak perubahan. Ada seorang teman mengatakan, "Apabila Anwar dipukul setengah mati dan matanya lebam serta tertutup sebelah, pada masa yang sama dua-dua belah mata ramai rakyat menjadi celik". Sekarang setelah beliau dijatuhkan hukuman penjara selama 15 tahun atas apa yang dipercayai ramai dalam dan luar negeri sebagai tuduhan palsu serta fitnah semata-mata, lebih ramai lagi yang bertambah celik.

Anwar sudah menjadi lambing kepada apa yang boleh dilakukan oleh pemerintah dan pemimpin yang zalim serta tidak adil ke atas rakyatnya. Kesedaran rakyat sudah melampaui kesedaran tentang kezaliman ke atas Anwar seorang saja. Akan tetapi ia adalah kesedaran lebih luas tentang kezaliman, kekejaman, pembohongan, putar belit, ketamakan, kerakusan, korupsi pemerintah dan pemimpin itu. Itu sebabnya tuntutan rakyat ramai sekarang ini ialah untuk keadilan dan demokrasi dengan erti seluas-luasnya dalam segala bidang bagi rakyat semua. Itu sebabnya mereka menuntut perubahan dan melaungkan Reformasi!

Untuk menutup pekung mereka, para pemimpin pemerintah memainkan api perkauman. Mereka melanjutkan dasar pecah dan perintah yang diamalkan oleh penjajah dahulu. Jikalau dulu gerakan "Komunis" dan "Kiri" menjadi momokan, sekarang ini "Reformasi" dan "Islam" dan "Keadilan" pula digunakan untuk menakut-menakutkan rakyat ramai.

30hb Ogos 2001

~ Dr Poh Soo Kai

Singapore's 'Battle for Merger' revisited, 2014: the poverty of its histo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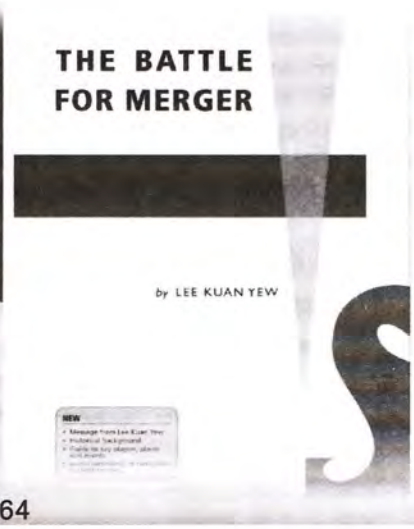
The merger issu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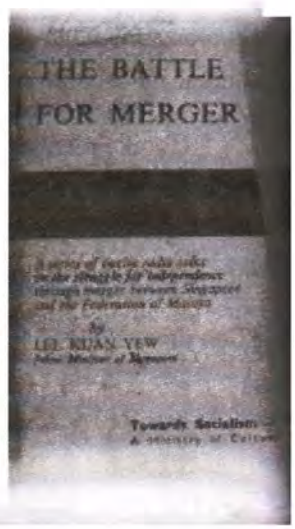
2015 is the fiftieth anniversary of Singapore's separation after almost two years of being part of the Federation of Malaysia (16 September 1963 - 9 August 1965). The event is marked as the day when the island gained independence. The British colonial rulers formally relinquished its residual power over Singapore's defence, foreign affairs and internal security to the newly-formed Federation of Malaysia when merger came into effect. Reunification was the aspiration of its people as the island was severed in 1946 by the British after being part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for 120 years, save for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1942-45).

However the merger scheme which Lee Kuan Yew's PAP government concluded with the Federation of Malaya government's Tunku Abdul Rahman was an outright failure. It is thus curious that for the official celebration of SG 50, the PAP government should choose to highlight the 12 radio broadcasts that Lee Kuan Yew as prime minister made between 13 September and 9 October 1961 which was published as The Battle for Merger (1962). The book was reprinted in 2014, with much official hype but no new insights. The deputy prime minister and concurrently coordinating minister for national security and minister for home affairs who launched the reprint, stress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PAP's push for the 1963 merger thus:

> It was a time when momentous decisions had to be made for Singapore. A wrong decision then would have been calamitous and Singapore might still be trying to shake off the dire effects today.

[Ministry of Home Affairs, Speech by Mr Teo Chee Hean, Deputy Prime Minister, Coordinating Minister for National Security and Minister for Home Affairs, at the launch of the reprint of "The Battle for Merger".]





The 1963 merger was a wrong decision. The disastrous outcome was foreseen by the opposition Barisan Sosialis. **We wanted reunification with Malaya, but NOT on the terms that Lee obtained. Those simply could not work.** They did not address the fundamental ethnic issue which was handled differently in Malaya and Singapore. The Alliance, the ruling party which dominated Malaysian politics, was an alliance of ethnic-based political parties. It had control of Singapore's internal security through the internal Security Act (ISA) which provided for detention without trial. The PAP had accepted that Singapore would have fewer seats than its population size warranted, weakening its representation in the Federal government.

Lee insisted that we 'opposed merger' fearing that we would be arrested and detained without trial by the Tunku as Malaysia's prime minister. We countered with the declaration that Barisan leaders were willing to be arrested and imprisoned before merger took place. **Contrary to the PAP's proposals, we insisted that the people of Singapore should have the same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as any other Malaysian citizen.** The 'autonomy' in labour and education for Singapore which the PAP obtained was meaningless if the ISA was not abolished.

After Malaysia was formed on these faulty terms, the PAP found itself in the margins of Federal politics when the Tunku rejected its attempts to replace the MCA as his Chinese coalition partner. The PAP then, in a volte-face, resorted to so-called championing of equal political rights for the Chinese. Ethnic tensions were stoked in response by UMNO extremists championing Malay rights. Riots broke out in Singapore in 1964, and Separation came to be seen as the only way to avoid further outbreaks of ethnic-based violence.

The merger of Singapore into the larger Federation of Malaya with an entrenched rightwing government was introduced by the British, and rushed through to save Lee Kuan Yew's political skin. The British were not prepared to give Singapore independence outside of merger with the Federation, fearing that its military bases on the island would be jeopardised if our genuine leftwing party won the 1963 election. Lee was keen on such a merger, expecting that the Tunku would act against the leftwing of his party. There was no vision of democracy or equality for the new society that was enunciated.

Lee had made clear to the British that should there be no role for him, he would not go into Malaysia. As prime minister since 1959, he threw everything he had to push for merger and to discredit his opposition as communists. Based on this charge, the PAP expelled its leftwing members, who then formed the Barisan Sosialis party led by Lim Chin Siong. The Internal Security Council, comprising of the Singapore, British and Federation of Malay governments, duly carried out Operation Coldstore on 2 February 1963 and subsequent weeks, with a total of 133 arrest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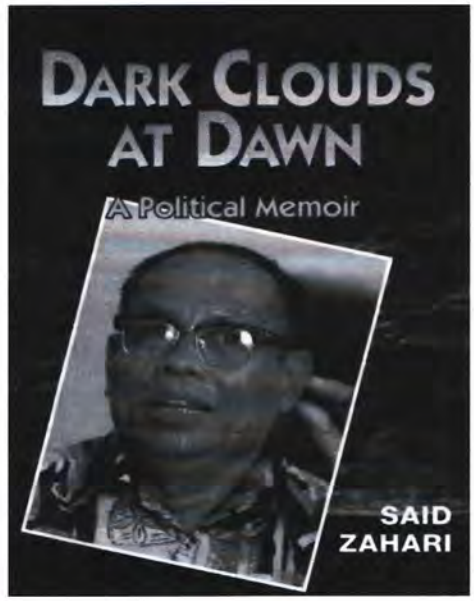
Building up a reading lis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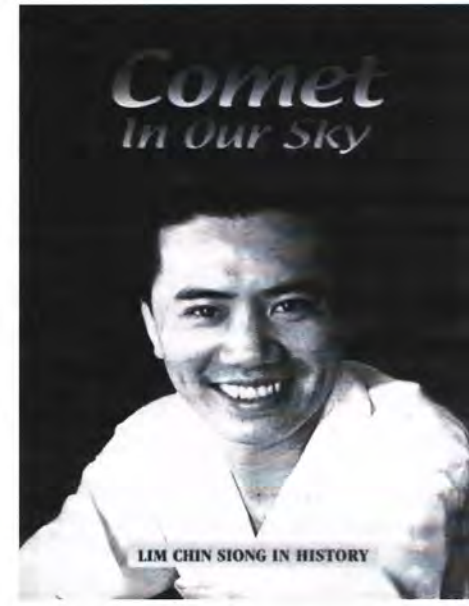
Among those imprisoned in 1963, were individuals who refused to sign statements 'renouncing' or condemning communism - the only way to gain release. Dr Lim Hock Siew, imprisoned for almost twenty years, refused to sign a statement renouncing violence in 1975. He retorted that it was like asking him to announce that he would stop beating his wife, giving the impression that he was imprisoned for wife-beating. He would never lift a finger to justify his detention.

For more than twenty years following the release in 1982 of the last of the political prisoners then (save

for Chia Thye Poh) we maintained silence about our wrongful imprisonment. The political climate was stifling; we were warned of re-arrest should we 'cause trouble', which included maintaining contact with one another. There was also the need to focus on making a living. Only gradually were attempts made among ex-political prisoners to meet up sociall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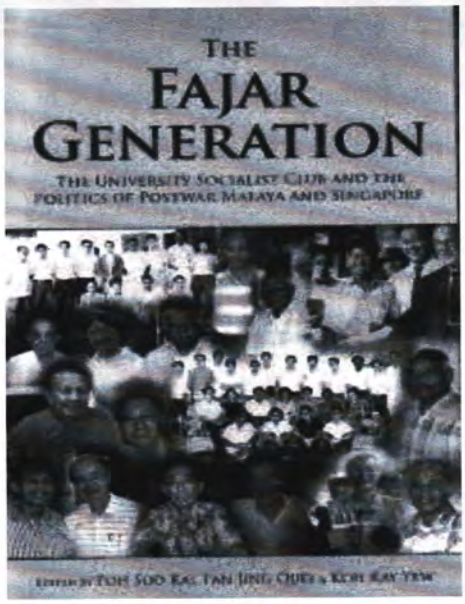
Following *The Singapore Story: Memoirs of Lee Kuan Yew (1998)* , Said Zahari, who certainly did not have any communist links but was imprisoned for 17 years, published his autobiographical account *Dark Clouds at Dawn: A Political Memoir*, and Tan Jing Quee co-edited (with Jomo KS) *Comet in our Sky: Lim Chin Siong in History;* both accounts came out in 2001. They were spurred on by Lee's narrative of his heroic deeds and flawless judgment, and demonising of his leftwing opponents as subversive communists at every tur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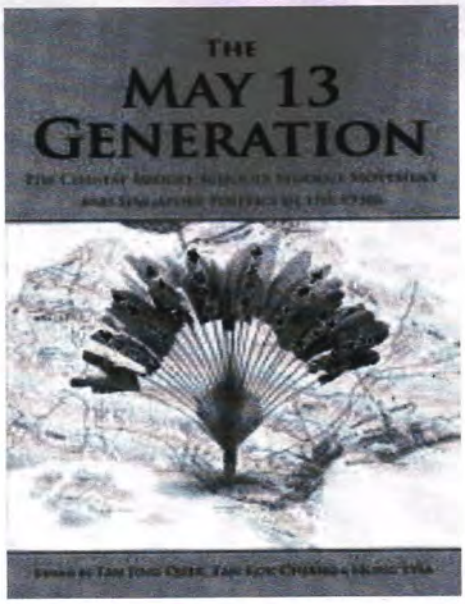




The momentum grew with Tan Jing Quee and Michael Fernandez speaking about their imprisonment at an arts forum on Detention-Healing- Writing in 2006. Tan then come up with *The Fajar Generation: The University Socialist Club and the Politics of Postwar Malaya and Singapore, (2010)* and *The May 13 Generation: The Chinese Middle Schools Student Movement and Singapore Politics in the 1950s*. The two books, available in both English and Chinese, challenge the state bifurcation of English-speaking students as apolitical and Chinese-speaking as manipulated by the Malayan Communist Party. The book launches drew a capacity audience. The latter in particular was attended by about 300 elderly Chinese-speaking former political activists who for decades had hidden their past, even from their children and grandchildren, who accompanied them to the event.

The detainees of the 1950s and 1960s were not the only ones who began to find a voice. A younger group of lawyers, dramatists, political activists, and social and church workers arrested in Operation Spectrum in 1987 as 'marxist conspirators' had also started to stir. They connected with the 1963 and 1970s detainees to produce *Our Thoughts Are Free: Poems and Prose on Imprisonment and Exile* (2009). The next year, Teo Soh Lung (imprisoned without trial 21 May 1987-26 Sept 1987;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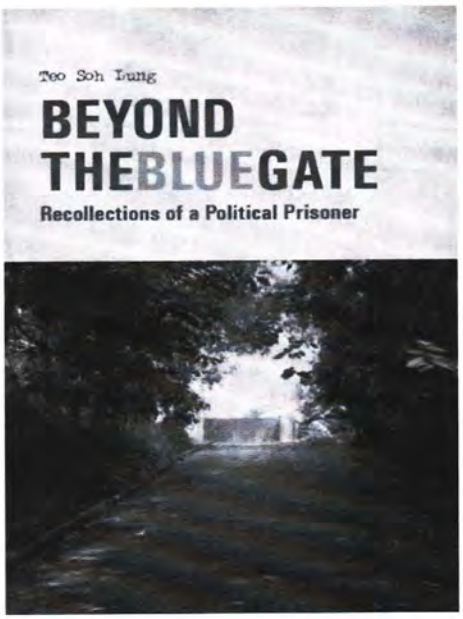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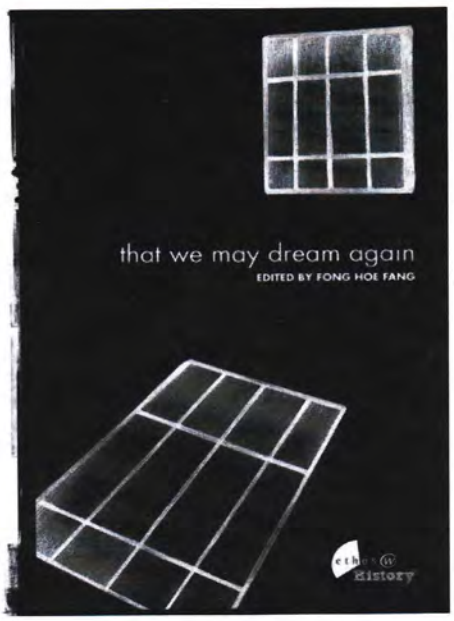


April 1988-1 June 1990) published *Beyond the Blue Gate: Recollections of a Political Prisoner*. At the book launch, Teo stated, 'I call for the ISA to be abolished. The ISA and its predecessors have destroyed many lives from the time of the British to today.'

Since then, her comrades have put out collections of essays by Catholic church workers who were Operation Spectrum survivors, and on Singapore's political exiles from the 1970s.

The growth of the social media, resulting in the proliferation of publishing outlets, made its impact during the campaign for the hotly-contested election of the president in August 2011. Citizen journalists, invited to the debates, asked the candidates to state their position on the ISA. Former cabinet minister Tony Tan justified the legislation on grounds that terrorism is a real threat, which led Dr Lim Hock Siew to challenge him to repeat his statement so that they could meet in a court of law, and to call for an





independent Commission of Inquiry to investigate the allegations against all ISA prisoners. His challenge is still on YouTube.

Operation Coldstore documents: Demanding accountability

Except for the 1990s, the ISA has been used in every decade in postwar Singapore. Operation Coldstore remains the most controversial, as it paved the way for the PAP's unbroken rule and constitutes its founding myth of 'riding the communist tiger'. What it did, in effect, was to eliminate Lim Chin Siong and the Barisan Sosialis from the 1963 general election. Lim had won the confidence not only of the Chinese-speaking labour unionists, but also the English-speaking left, mostly coming out from the University Socialist Club. I was one of them.

Documentary evidence from the colonial archives, analysed by historians such as TN Harper, Geoff Wade[3] and PJ Thum[4], has shown that the British and the Federation governments were not going to accept a leftwing government in Singapore; they came to Lee's rescue by abetting in Operation Coldstore. I too made a trip to the Kew Archives in the early 1990s. There is insufficient evidence that Lim Chin Siong, the key target to be destroyed politically, was a member of the MCP—which did not stop the demonising of him as such in the 2014 Battle for Merger. Choice quotations from the Colonial Office include:

> While we accept that Lim Chin Siong is a Communist, there is no evidence he is receiving orders from the CPM, Peking or Moscow. Our impression is that Lim is working very much on his own and that his primary objective is not the Communist millennium but to obtain control of the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of Singapore. It is far from certain that having obtained this objective Lim would necessarily prove a compliant tool of Peking or Moscow.

Also, Lee was

> quite clearly attracted by the prospect of wiping out his main political opposition before the next Singapore elections...advocating a policy of provocation of Lim Chin Siong and his associates with a view to forcing them into unconstitutional action justifying their arrest.

The specific reason given for our arrests was that the Barisan was supplying arms and logistical support for the popular uprising led by Azahari in Brunei on 8 December 1962. The British had minuted how this charge was formulated:

> Lee had in mind a statement calling for the crushing of the revolt pointing out that organisation, training and arms could not have been provided within the Borneo territories and drawing the conclusion that there must have been foreign intervention. As to arrests, Lee said that information about the recent contacts between Azahari and Lim Chin Siong coupled with Barisan Socialis' statement giving open support for the revolutionaries provided a heaven-sent opportunity of justifying action against them.

Lim Chin Siong as Barisan leader had a meal in a restaurant with Azahari, leader of the socialist Partai Rakyat Brunei, who was stopping by Singapore, in full view of the head of Special Branch. Our statement of moral support for the Brunei popular uprising was no different from those that the Barisan had issued for other anti-colonial uprisings. Strangely for the danger we were alleged to pose in our fraternal relations with Azahari, our arrests were postponed for two months after the Brunei uprising as the Tunku and Lee could not agree on the list of detainees!

The authorities had indicated that they would produce evidence of our clandestine involvement in the Brunei uprising, but never did. I am still waiting.

Operation Coldstore was a set-up against Lee's political opponents. On its fiftieth anniversary, I declared in the blurb of *The 1963 Operation Coldstore in Singapore: Commemorating 50 Years*:

> I maintain that I was imprisoned for being part of a slate of left-wing anti-colonialists who were going to pose a challenge to Lee Kuan Yew in the election of 1963. The charges of communism and subversion, used to frame people like me, have simply been chanted repeatedly to this day. Our rejection of the charge has been ignored outright, without any attempt to supply evidence or specific details which we could answer.

To date, we have received only a non-reply, in the form of the re-printing of the *Battle for Merger*, the Cold War diatribe of the day. The government has to content itself with targeting school children and blitzing the mainstream media, using the same language and materials from half a century ago, and resurrecting the failed 'merger', implicitly to justify Coldstore, though the event itself is not ever mentioned. The impression given is that with the radio talks the PAP won the hearts and minds of the people. If that had been the case, Coldstore would have been unnecessary.

Even more impossible to justify than our arrests is the length of the imprisonments. Detention orders were renewed every two years, without any limit at the minister's pleasure. Lim Hock Siew would have received at least 8 extensions of such orders under section 8A of the ISA, 1960, a printed form with the name of the detainee and date typed in. How many such orders would Chia Thye Poh, - imprisoned on 29 October 1996, restricted to Sentosa island from 17 May 1989, then to Singapore from 28 November 1992 and freed of restrictions on 27 November 1998, - have received?

The present PAP leaders have chosen to identify themselves with the gross injustices using the ISA inflicted by their party elders, and to cling to a narrative of history that has been seriously questioned.

GERAKAN PERUBAHAN IBU BAPA
—— Asal Usulnya

Setakat ini negara kita sudah mencapai kemerdekaan lebih setengah abad lamanya. Banyak negara-negara jiran yang pada suatu masa dahulu adalah kurang maju berbanding dengan neara kita, tetapi kini telah mendahului negara kita satu demi satu. Negara kita memang kaya dengan sumber-sumber alam semulajadi dan rakyatnya bekerja cukup keras. Namun begitu, kini negara kita makin ditinggalkan jauh di belakang. Nampaknya negara kita sudah jatuh sakit.

Bertahun-tahun lamanya sumber negara kita kian direbut oleh oleh sejumlah kecil sindiket kroni dengan bermacam-macam tipu helah dan kekerasan, sehingga rakyat jelata tidak dapat mencapai hasil pembangunan. Negara kita telah menjadi sebuah negara korupsi yang tipikal. Malahan mereka sanggup bersubahat dengan pelabur-pelabur asing, semata-mata untuk kepentingan minoriti. Perusahaan beracun yang boleh memcemarkan persekitaran serta mengancam kesihatan rakyat telah dibawa masuk ke negara kita.

Negara kita adalah negara berbagai kaum di mana terkumpulnya beraneka corak kebudayaan dan tamadun moden dari seluruh dunia. Hubungan antara pelbagai kaum adalah rapat dan mesra, akan tetapi hubungan begini telah diceroboh dengan teruk oleh ahli-ahli politik yang mengamalkan pemikiran unilateral dan dasar perkauman. Ini merupakan penghalang dalam usaha mencapai hasrat mewujudkan suasana hidup yang aman damai antara pelbagai kaum, layanan kepada rakyat yang sama rata, rakyat saling belajar dan sama-sama mengecapi hasil kemajuan.

Negara kita telah mengalami pilihan raya sebanyak 12 kali. Akan tetapi di bawah operasi tipu helah, timbullah berbagai-bagai gejala yang tidak adil, misalnya pembahagian kawasan pengundian yang tidak munasabah, pengundi-pengundi hantu bertaburan di merata tempat, undi-undi cara pos telah dimanipulasi, malahan kepentingan negara sanggup digaddddai dengan melayakkan pendatang asing dari luar negeri sebagai pengundi dan sebagainya, semata-mata untuk memenangi kerusi dalam pilihan raya. Akibatnya, kehendak dan hasrat rakyat jelata tidak dapat disuara dan dibentangkan.

Kekurangan sistem pengawasan dan penyekatan yang tempurna dan berkesan telah

menyebabkan sering berlakunya perbuatan rasuah di bahagian-bahagian pentadbiran dan penguatkuasaan undang-undang di negara kita. Di samping itu, juga timbul masalah-masalah seperti kurang kecekapan dalam menjalankan tugas, masyarakt dalam keadaan yang tidak selamat, kes-kes meragut dan rompakan berleluasa, nyawa dan harta benda rakyat tidak terjamin, keselamatan kaum wanita dan kanak-kanak sentiasa terancam.

Kami merupakan ibu bapa dari seluruh negara. Memandangkan kini masa depan negara kita sedang diselubungi oleh berbagai-bagai krisis dan kehidupan rakyat jelata bertambah susah dari semasa ke semasa, maka kami terpaksalah tampil ke hadapan untuk menganjurkan "Gerakan Perubahan Ibu Bapa" ini dengan tujuan mewujudkan kehidupan yang selamat dan bahagia untuk anak cucu kami. Kami mengemukakan 7 tuntutan utama seperti yang berikut :

1. Menuntut mengadakan pilihan raya adil dan transparensi. Cara pengendaliaan yang melanggar peraturan dan operasi tipu helah adalah dibantah sama sekali.

2. Membantah amalan rasuah dan penyalahgunaan kuasa. Kami menuntut mengadakan mekanisme pengawasan yang sempurna dan berkesan.

3. Membantah segala dasar unilateral dan asimilasi kaum. Kami menuntut perlaksanaan dasar multilateral yang sama rata dalam bidang-bidang politik, ekonomi, budaya dan pendidikan.

4. Menuntut melaksanakan dengan betul-betul dasar ekonomi masyarakat "Membasmikan kemiskinan tanpa mengira kaum" serta membantu golongan yang kurang bernasib baik untuk mengurangkan polarisasi antara yang miskin dan kaya.

5. Memberhentikan segala perusahaan dan infrastruktur yang beracun yang boleh mengancam kesihatan rakyat, mencemarkan persekitaran serta merosakkan keadaan ekologi.

6. Memperbaiki keadaan keselamatan dalam masyarakt yang kian teruk serta menguatkan sistem pengurusan tentang keselamatan di tempat-tempat awam dan komuniti.

7. Membatalkan sama sekali segala akta-akta dan undang-undang yang mencabuli hak asasi rakyat serta bertentangan dengan undang-undang demokratik. Kami menuntut agar pihak berkuasa meminta maaf dan membayar pampasan kepada mangsa-mangsa yang berkenaan.

~ Low Toh Nam

Saudara Hoo Tak Chow menerima Anugerah My Hero 2014

Seorang petani sayur Cina yang berpendapatan serdehana, yang sanggup menbantu 2 orang pelajar Melayu melanjutkan pelajaran universiti, dengan membiayai RM5000 setahun selama 4 tahun.

Beliaulah Sdr. Hoo Tak Chow, seorang yang mempunyai sanubari mulia, tak kira kaum dan agama, rela membantu golongan kurang berkemampuan untuk menuntut ilmu pengetahuan.

Sdr. Hoo Tak Chow (54tahun) adalah bekas tahanan politik yang merengkok di lokap dan Kem Tahanan Perlindungan Kamunting selama 7 tahun 9 bulan. Setelah dibebaskan, beliau bercucuk tanam di kawasan Seremban .

Beberapa tahun dulu , Sdr. Hoo mengewa tanah untuk menanam sayur dari seorang nenek Melayu yang menyara seorang cucu perempuan, Nor Pazni Abu Bakar. Oleh kerana ibu tunggalnya tak mampu menbiayai yuran universitinya yang berat, dia gagal melanjutkan pelajaran . Setelah mengetahui kesulitannya ini , Hoo menghulurkan tangan untuk menolong Nor Pazni dengan membantu belanjanya RM5000 tiap-tiap tahun sehingga tamatnya pelajaran di universiti.

Sama juga beliau membantu Nurul Harida Tasha Mohd Nor Azhar yang tinggal di Malim Nawar, Kampar, Perak。 Ibunya ibu tunggal, seorang penjaja buah-buahan yang kena mebabankan belanja hidup 4 orang anakyang masih dalam persekolahan. Sebaik saja beliau mendengar Cikgu Low Toh Nam membayangkan kesulitan Nurul Harida yang belajar di Sekolah Menengah Pei Yuan, Kampar (sekolah menegah persendirian Cina),beliau terharu kerana anak Melayu itu masuk SRJK(C) sejak sekolah rendah,dan fasih bertutur dalam Manderin, minat kepada kedudayaan Cina, dan ingin melanjutkan ke universiti di Taiwan untuk mengkaji lebih mendalam kebudayaan dan kesusasteraan Cina.

Dengan tidak teragu-ragu, beliau menbantu Nurul Harida juga sebanyak RM5000 setiap tahun selama 4 tahun dari 2013 ke 2016.

Kelulusan hati sdr Hoo menyebabkannya dipilih menerima Anugerah My Hero 2014, yang julung kali dianjurkan oleh badan-badan perpaduan dan muhibah swasta,dan ditajakan oleh Kementerian Perpaduan dan mihibah. Perbuatan sdr Hoo ini merupakan satu teladan perjuangan menciptakan sebuah masyarakat yang hidup harmoni berbilang kaum. Inilah cita-citanya juga perjuangan hayatnya selama ini .

刘道南

胡德周老友荣获跨族群的“英雄奖”

老友胡德周（左三）移交第一笔5千义款给哈丽达（右二）

德周一家与哈丽达和母亲美娜，在开斋节首日相见欢聚。

南洋商报2014年3月10日刊出专访报道“跨越种族，默默行善，胡德周助巫裔生圆升学梦”

“英雄奖”颁奖礼上，6位得奖者欢愉合照。

英雄奖My Hero的标志。

他是个沉默多过发言而略带腼腆的菜农。他主动资助两位马来族女生升大学。这件事被媒体探悉而报道出来。经两位被他每年资助5千令吉的女生提名推荐下，他被评选荣获“2014年英雄奖”

这个奖项是由南洋商报、隆雪中总联办；获我国国民团结与和谐局、大马中总支持；SUNSURIA机构赞助；媒体伙伴英文报《新海峡时报》及国文报《每日新闻》特别报道。此奖宗旨是：表扬一些社会小人物在民族和谐团结方面，作出令人激赏的行为表现。这次获奖的共6人，分别都是默默在行善，做了跨种族互助友好的义举。

德周老友是森美兰老友会秘书。在太平甘文丁政治扣留营度过7年9个月牢狱之苦。释放后从事种菜生活。该老友会主席赵华护说：德周是其得力助手，待人处事很低调，态度谦和，从不与人争执。他热心助人，每次为学校义卖筹款，他都会报效大批蔬菜。

德周资助马来女生诺巴斯妮（Nor Pazni Abu Bakar）入读高等学府（Yayasan Kolej Melaka）一事，原本是静悄悄进行的。一次我到他的菜园参观，聊起该菜园地段的事，他才提到说5年前开始资助这一位贫穷马来女生。

他说，自己是耕农，但苦无耕地，经常要租地耕种。后来他在森美兰林茂租得一位马来老妇女的土地种菜。一次闲聊，他获悉那位老人家抚养的孙女面对无钱升大学之事。女孩父母离异，单亲妈妈无能力让女儿读大学。

他表示他从来没有种族歧视，认为友族有很多善良无种族偏见的人。他说，自己仅是一个菜农，并不富有。但能力范围，还是可以协助贫困而有心读大学的外族学生。于是，他为女孩支付第一年的入学费、杂费、寄宿费及生活费。而后他每年再补贴那女孩约5千令吉，前后共2万5千余令吉，终于资助该女孩完成升大专的心愿。

我听了，就想起我母校金宝培元独中，也有一位家境不佳的马来年女生哈丽达（Nurul Harida Tasha binti Mohd. Nor Azahar）。她在2012年高三毕业后，很想到台湾读大学中文系。但是，单亲妈妈只是村里街边水果档的小贩，又有3个妹妹，实在无能力让她读大学。

我反映哈丽达的情况，告诉他：女生是金宝市郊双溪古月人，从小在应新华小念书。小学毕业后，就到培元独中去。在学校参与华文学艺活动，学华乐，拉二胡、演讲、作文。我是在指导学校华语辩论队时了解到她的心愿。

2013年她以外籍生身份申请，而获台湾台中教育大学录取进入中文系，但是苦无费用。她不忍心母亲那微薄的收入，都支付在他的大学费用上。因此他考虑放弃升大学。德周听了，表示可以考虑资助她。他说，前一位资助的马来女生已经毕业，他可以接下去资助另一位。于是，我就穿针引线，让他们之间联系。最后，德周答应资助哈丽达每年大学的生活费5千令吉。

哈丽达的台湾开学日子在9月。就在2013年8月中，趁着伊斯兰教徒欢度开斋节的第一天，德周带着妻女一行5人，特地从芙蓉驱车到双溪古月，给哈丽达一家送上5千令吉的开斋节礼物。母亲美娜感激德周雪中送炭的无条件赞助，让女儿安心的出国上大学。她招待客人品尝开斋节美食，并拍了合照。

随后，各华文报章皆以显著标题在全国版刊登新闻“菜农百里送钱，助巫裔生赴台”。报道见报后，获各方赞扬嘉许。此事也引起媒体的关注。TV1及TV8电视台特地派员去采访，在新闻节目时播映。《南洋商报》和《每日新闻》及《新海峡时报》也刊出专访。

当然，“2014英雄奖”的评审团也注意到这件事，特地联络两位受惠的马来年女生，收集资料后，建议推荐提名。终于获批荣获英雄奖，而于今年4月，连同获此民族团结和谐奖的另5位各族男女，在吉隆坡的一项颁奖礼上，从团结部长佐瑟古律手中接领这第一届英雄奖项。

在颁奖台上，德周说：“英雄”二字实言过其实，真不敢当。他只是一名菜农，没受过高深教育，没能力做什么大事。本着一个简单的理念——知识就是力量，看到有人要继续深造，而又没经济能力。于是在有限能力下，作出小小的付出，希望能改变一个人一生的命运。这是非常值得的。小小的付出，获得各界的认同，希望籍此抛砖引玉，让社会变得更美好。这只是一些小小的举动，却被媒体“放大”。帮助两名马来女生圆升学梦，只是一种巧合。其实，各族本来就应该像一家人般生活，和谐、友好、亲善、融洽、团结。

老友获得这项殊荣，让全国老友深感：民族的团结友爱，当年和现在都是我们奋斗理想，我们的努力方向。这些实实在在的点滴工作，老友会更需要身体力行。今日，我们老爸老妈改革运动，更应该做好族群团结的工作！

胡德周注：资助的第一位女生Nor Pazni实况：

她在YAYASAN KOLEJ MELAKA 修读3年diploma课程，结束后，隔年申请入读SHAH ALAM 某间大学(大约是MARA 工艺大学？)，我继续资助约2个semister 的费用，至到她申请到PTPTN 贷学金，才停止资助。过后，她半工读，并全面解决自身经济问题。她1年后会真正的大学毕业。我前后资助总计约RM28,000。

沙末赛益 A.Samad Said 诗选

北雁译

缝旗颂
Menjahit Bendera

催泪弹和水泡朝着街心乱射
我们遭到了否决仍沉着以对
为了赋予时代以洁净和芬芳
我们坚持斗争纵使历尽艰辛

为了恢复被摧残的民主
让历史在我们面前重现荣光
我们要将傲慢的权力扳回正轨
只为不愿再受那鹰爪制约

我们奋起迎向扑面的风暴
确保延续民主熊熊的火炬
我们高举一视同仁的旗帜
每遭强权撕毁就即刻将它缝补

黄潮啊随着清澈的旋律涌现
我们齐声高呼：干净，干净
——相爱，相亲！

（23/7/11作，21/12/13译）

圣洁之火
Unggun Bersih

即使在火热中煎熬
我们也要宣扬独立的信约：
民主的光辉啊似太阳
我们的憧憬如自尊般纯洁

每当民主受损，我们忧心忡忡
每当民主遇难，我们无比沉痛

我们冷嘲那傲慢的民主
呼唤自由是我们的渴望

两百年前山姆阿当曾发出呼吁：
（当时茶叶在波士顿被倒入蓝海）
不需要无力的喧嚣与呐喊
只需美好崇高的圣火

而今，燃起那神奇之火吧
而今，且让那光芒远播！

（27/6/11原诗发表，21/12/13译）

赛扎哈里Said Zahari诗选

所谓“反国家”

北雁译

“反国家”他们说
呐，这是证据。
真是这样吗？

如果
粉碎殖民主义
彻底反对帝国主义
铲除压迫
摧毁暴政
。。。这叫“反国家”
是的，我是反国家！

如果
消灭歧视制度
和所有不公不义所有奴役
埋葬封建主义
。。。这叫“反国家”
是的，我再次承认“是的”

确实
我是反国家！

（1963年作）

决心

曾荣盛译

如果要到山峰
就必须攀登
如果要到对岸
就必须游泳

为什么不呢？
纵使倾出一切代价
甚至在需要时
付出生命

为什么不呢？
只要是为了
寻找真理
要求公正
争取解放

（20.11.1975作）

赛扎哈里Said Zahari诗选

曾荣盛译

刺与火

没察觉到
旧伤又流血了

谁会料到一句话
重复过去的故事？
谁会想到一闪念
勾起往日的挫折？

啊！
而今突然感到
内心无比的伤痛复发

跟随牺牲的孩子们
如何在斗争的烈火中焚伤？
同在一起斗争的同志们
如何同样掉入陷阱之中？

在“刺与火”之间
他们当中
有多少人经已灰心失望
他们当中
谁还在坚守誓言

(9.1971)

辩证

集体在行动、在改变
快速的、缓慢的
从不拒绝
从不静止

故事还未结束
斗争仍未停息
连续不断
在不同的阶段
朝向真理
寻求正义

将来仍会有所改变
向着新的真理
向着新的正义
新的形势
从未间断……

故事还未结束
斗争还未停息

(5.1970)

蔡庆忠烈士诗选

铁窗情

离开了温暖的家
永别了一切亲人
在这最后的囚室
等待着一个最后的时辰
一去不复返

在囚房门前
能够遇面打个对照
或是稍一察言观色
甚至情不自禁的握手
它都灌流着相同的血液
跳动着同一的气息
贯穿着肺腑的话语

张张一如亲人的面孔
明知它会先后的消失
叙谈不完的嘘寒问暖
确知谈话的时间日渐缩短
即使是一瞬间的驻足
半句话没说的一瞥

没人过问什么肤色
无须交代出身摸底
铁窗为我们凝结了
珍贵的阶级情谊
我们诅咒着同一音符
控诉着同一个节拍

半夜里飞起了雄浑的歌
顿使热血沸腾暖心窝
隔日凌晨又要少去心一颗
通宵达旦齐声讨伐它

(22.4.1983)

清明

是阴霾的天
依样是细雨纷纷
偶而也骤然泼洒一阵
在每一年
这样的一天

没有踏青的人群
不见香烟缭绕
没有烛火点点
更看不到冥点祭品
那来墓碑好油髹膜拜
多少年了
这座殛人如麻的巨坟

用不着为它剐除荒草
更不必为它培上新土
它是血迹班斓的钢骨水泥
遮掩了磷火点点
鬼哭神嚎
多少无辜的生灵
无数志士的忠魂
目睹这一切
又怎能在这里瞑目长眠

除了永远是死寂与阴森
几只悲鸣哀叫的乌鸦
伴随着缕缕的英魂
盘旋在高墙的空间
(5.4.1983)

炼狱受难记

～杨小黑

（一）

不信鬼神不信邪，亮心安，
自爱、锐眼、矢志、即奉献，
奔赴义举崭露修来的祈缘；
——云海翻腾飞焰，
——大地激情舞剑，
星火燎原，轰然迷漫硝烟！

不期落入魔窟烈火炼，
饱　恐怖暴虐宴，
血腥魔掌突抡拳，
疲劳审讯日夜熬煎，
身心撕裂不知昼夜，
逼供昏倒睁不开双眼，
冷水淋泼推躺水泥板，
　绵身驱肆意遭摧残！

（二）

挟入暗房料理惩办，
吼声乍响耳际贯穿，
遽然惊醒心乱转！
说谗打手，分组轮替，
谗说不灵，悻然退场，
调来疯癫打手挨磨难！

重来说谗不玩武弹，
狰狞恶煞奸笑声喧，
“聪明的不吃亏眼前”
“好好交代，好处没完”
“肌肤不痛，保证万全”
“放你自由，不会图报复变脸”！
随之叛徒上场，怯生试探，
转身丢句“敬酒不吃等吃罚酒”！

（三）

囚室躺下，幻影频现，
挥不去“莱佛士”鬼押见，
密麻“飞机”烂炸，
针刺处处血斑点点，
周身红肿难忍剧痛，
血涂黑墙怒愤宣战！
疲劳拷问日夜上演，
枪尖下不许说“不知道”，
不然一枪呜呼套以“逃跑罪”；
闭口不语却招来跆拳道，
再连番赏以散打圈！
飞脚踢心胸，又击下部胯，
轰隆“雷吼”神经饱惊吓，
炸得耳聋目眩更脑伤！

（四）

不料千岛流亡事穿，
冷对追问怒火燔，
双手被扣受尽虎狼欺，
黑夜漫漫更漏残；
突传难友催命声声唤，
穿墙轧心痛欲绝！
从此被冠“大骗子”，
思虑清晰把住良知关，
心安理得再玩它连番！
囚笼独处心不寒，
餐包旧报入心眼，
凌云壮志刻石传；
斑斑血迹诗歌卷，
心吟强记不计年！

（1977年9月记于太平甘文丁扣留营
1997年9月重修）

大地吟

那绿
绿得满山
亮了
她的眼

那秃
秃得满山
哭碎
她的心

（1997年6月30日）

奉献

青春壮丽
他开辟这片绿

暮年伛偻
他守住这片秃

（2003年2月16日）

无题联

百川汇海涵天地
千鸟鸣林蔚霭霞

（2009年1月26日）

瀑布山百年榕树

（七绝）

苍榕兀立莽森林，
万丈参天若巨人。
挥斥风雷一百载，
晓晴含笑赏鸣禽。

（2002年12月）

咏方北方先生

（七绝）

时代洪炉淬赤心
一生沥血已成林
根深叶茂参天树
喋喋狂鸦没暮沉

（2007年11月）

题彭亨林明民众图书馆六十周年纪念联

奋臂黄流　林明好儿女　激浊扬清肩大任
凝眸碧水　书馆灿旌旗　迎风追日织千霞

（2014年7月21日）

老友会的定位

汤毅整理

谁是老友？

1. 曾是左翼阵营里共同斗争的老朋友；
2. 为理想/斗争而被逮捕坐牢的政治/社会工作者；
3. 曾是左翼政党，如当年的社会主义阵线（人民党、劳工党、社会主义青年同盟）及其同盟者（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参加武装斗争和地下活动的斗士）；
4. 过去与现在在各个领域里为人类的高尚理想作贡献的工作者；
5. 认同本会理念、理想的民主人士。

总之，在过去七八十年内，在反对殖民主义、军国主义，在争取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争取民主人权的斗争中参与和作出过奉献的各民族人士，都是“老友”。

为解决老友会会员接班人的问题，有建议提出，应该培养老友的子女成为老友并吸纳其为会员。

老友会的性质

1. 一个服膺于最终以人民利益为最高目标的民间组织；
2. 基于三互精神的“团结、联谊和照顾会员福利“的组织，但联谊不宜高过一切；
3. 一个关心社会和政局发展的民间组织，有政治立场和观点，其方向以人民利益为依归。与时俱进，提升社会主义理论的新认识；
4. 在不同组织间相互支持与声援，但不作为政党（在朝的或在野的）或机构的传声筒。支持国内外进步的民主、人权运动。以”超越政党、关心政治“为相处原则；
5. 通过舆论与行动，唤起民众，批判社会，促进社会发展；
6. 建议以”民间组织“自称取代”非政府组织“的称呼。

今日，老友会能做些什么？

1. 目前”老友会“的会员成分以华族为多。但，左派向来重视民族间的团结工作，这方面的工作仍是重要的。在可能的能力范围内，支持和促成这方面的工作；
2. 能力可及的范围内，支持各党派做有益于人民的工作；可扮演“推手”的角色，联合开明、进步的民间团体，促进两线制的健康发展；
3. 开办理论与实用班级，如理论的研究和电脑班、建立网络和部落格的学习等；
4. 跨出去，与其他团体（包括非华族团体）建立/扩大联系，如与有相近目标团体组织联办活动、发表合声明等；
5. 现在已具政党党员身份的会员以个人名义参加政党活动，但其政党意识不应带入老友会；
6. 创立福利机构、关爱小组等，照顾贫老福利；成立青年团，培育新人；
7. 建立会所，展开各种健康的文娱活动；有机会时可主办/联合主办文化演出；
8. 对领导人的培训。

关于团结

1. **团结的基础：**

   一、信仰、支持科学社会主义及其发展；
   二、反对族权、神权、王权，但要巧妙处理他们间的矛盾、支持正义的呼声、不对着干；
   三、主张民主多元开放；
   四、争取各民族权益平等；争取各源流教育育文化都有平等的发展空间和共享机会；
   五、反对内安法令和一切恶法；反对贪污滥权；反对独裁专制；
   六、支持符合人民利益的斗争；
   七、各兄弟会之间地位平等、独立自主；相处须相互理解与容忍。

2. **总会：**

   关于总会的讨论有两点：

   一、主张全国老友大团结，建议组织全国老友会总会，并立刻成立筹备委员会，但其他细则如注册的工作可容后商讨、遂步进行；
   二、主张全国老友大团结，建议目前在7个老友会的基础上组成联络委员会，加强建立各会间的联系；总会事须作进一步探讨，建立共识，待时机与条件成熟后再议。

   在讨论的过程中，大家都心平气和地提出看法，一致表达了团结的愿望，但也各自表达了上述二点。又基于快到汇报时间（已是下午1时3刻，汇报时间是2时），出席者建议将两点并列，交回各单位考虑，并向大会汇报。

   2009年第二届全国老友会大聚会在霹雳州老友联谊会会所的研讨会的总结。

老爸老妈该革运动

缘起

我国独立至今半个多世纪，许多当年年同我国一样、甚至比我国条件差的邻国，纷纷走到了我国前面。天然资源丰富、人民勤劳工作的我国，却一步步地在沦落。我们的国家，生病了！

经过多年的巧取豪夺，我们国家资源已经集中到一小撮朋党集团手里，广大的各民族人民分享不到发展的成果。我国成了贪污腐败的典型。为了少数人的利益，他们甚至勾结外资，引进污染和破坏环境、损害人民健康的有毒工业。

汇集着世界各种现代文明和文化的多元多彩的我国，民族关系向来融洽，但这种融洽关系却被政客长期贯彻的单元主义思想及种族主义政策，严重破坏了，以致距离各民族和睦相处、平等相待、互相学习、共同进步的理想越来越远了。

我国经历了十二届大选，但在黑箱作业底下，产生了种种不公平现象、例如选区划分不合理，幽灵选民四处泛滥，邮寄选票被操纵，甚至为了赢得议席，不惜典当国家利益，让大量外来移民成为选民等等，致使民意无法反映，民情无法伸张。

缺乏健全和有效的监督和制衡，我国各个行政和执法部门贪污丑闻频传，工作效率底下，社会治安不靖，攫夺抢劫层出不穷，人民生命财产得不到保障，妇女儿童人身安全时时遭受威胁。

国家的前途已经陷入重重危机，老百姓的生活日益困难，为了我们的子子孙孙能有一个安全和幸福的明天，我们不得不站出来，推动“老爸老妈改革运动”，并且提出以下七大诉求：

1）要求公正、透明的选举，反对违规操作和黑箱作业。
2）反对贪污滥权，要求设立健全和有效的监督机制。
3）反对一切单元同化政策，在政经文教各领域实行多元平等政策。
4）真正落实“不分种族，消除贫穷”的社会经济政策，扶持弱势群体，缩小贫富两极分化。
5）终止一切危害人民健康、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有毒工业和设施。
6）有效改善日益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加强公共场所与社区治安的管理，保护民众特别是妇女儿童的人身安全。
7）彻底废除一切侵害人民基本权利，违反民主法治的法令和法律，对所有害者给予道歉和赔偿。

2014年庆祝国际三八妇女节献词

苏淑桦

大家知道，国际三八妇女节的历史，最早起源于157年前发生在美国纽约，一场服装和纺织业的女工因抗议工作时间长、低工资、和恶劣的工作环境而展开的游行。当年的游行队伍被警察围攻并驱散。两年以后的三月，那些走上街头的女工们组织了属于她们的工会。

如今，每逢三八妇女节，或许有很多人还能记起这个象征妇女权益的日子，一些商场甚至举办特别节目或搞搞花招、举办促销活动，就像庆祝母亲节般来庆祝这个日子，但许多人并不清楚妇女节是纪念女性劳动者奋起争取她们的权益的日子。而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劳动妇女们都曾历经恐惧，不安和资本体制的剥削，必须突破重重的枷锁，才得以争取到她们应有的权利。

今天，有人说，时代改变了，男女之间越来越平等了。在许多国家，女性也能担当举足轻重的政治领导。从当年1857年起纺织女工就已上街抗争的美国，直到今天，已有三名女性前后担任了国务卿。亚洲世界也曾诞生女总理、女首相和女总统。我们的邻国泰国和菲律宾就曾诞生女性的最高领导人。而在我国，最具人气的公民压力团体净选盟Bersih的两届主席也都是女性。

当女性能够占据一些领导的位置，扮演领导的角色，这可能对女性起着一些激励的作用。但当我们更深一层的去思考，能够左右我们世界局势发展的这些女性，在庞大的女性总人口中所占据的比例，却只是极少数。广大的基层妇女们仍然面对着旧制度的剥削。

当我们的世界正快速地被新自由主义的政体所开发，社会上普遍的物质条件确实有了变化。尽管血淋淋的剥削已不常见，但层出不穷的各种剥削名堂事实上无处不在，只是在资本财团和统治集团的法律操作下，变得更有弹性和不容易被发现。

我们的劳工法虽保障工人每天工时不超过八小时，但是，在工资不足的情况下，很多工人包括女工，都被迫自愿超时工作来赚取更高的工资。

一些工厂以外包的名堂招揽女工承接部分工作在家进行，这些零散的工作确实为在家妇女帮补家计，但却以极低廉和不合理的价格，剥削在家妇女的休息时间。

许许多多的劳工议题，能够让我们勾勒出女性现在的处境。当世界的经济为大财团所瓜分，劳动者所享有的经济成果不断收窄，只有双薪家庭才能应付家庭开销。职业女性在职场上处于更弱势的地位，同工不同酬，还有父权主义下的家庭分工的不均等，让女性的重担百上加斤。

贫富悬殊日益严重，政治腐败让国家的财富被小部分人所搜括，而不是用在提升公共服务，解决基本需求等民生问题，被边缘化弱势群体当中，妇女确实首当其冲。

从308一直到505，我们的政治运动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相应针对妇女的一些福利政策，曾经在新政局下被提出讨论和试跑，如槟岛和威省市议会的性别回应预算案、职业妇女的托儿服务等等。这些局部的工作还不能带来广泛的效应。我们需要国、州政府提出更具体的方案，以及制定能对大部分女性带来更深远影响的具体政策。

最后，要实现一个更公平、公正、和性别平等的社会，我们只有再争取，和更有动力的去结合其他社会改革力量，进行基层群众的组织工作和串联，才能带来真正的改变。“妇女撑起半边天”不应只流于一句口号，而应体现在我们能不能促进女性享有我们所应有的权利，并真正的参与到我国社会的发展建设、以及介入到国家政治的决策中去！

愿大家共同努力吧！

（编按：本文曾作为全国老友联谊会联委会代表刘建立的演词，于2014年3月8日由风凤凰友好联谊会、21世纪联谊会暨老友联谊会所联办的国际三八妇女节庆典上发表）

柔佛州老友联谊会
会务报告

今年初，我会与友好团体的互动相当频密。

4-1-14　呈交了750份反对教育大蓝图签名表格给董总负责人。新山老友总共交上超过三千个签名。

26-1-14　我会主席何声让与总务林亚坤出席边佳兰自救联盟于新山凤凰会所举行的研讨会。

8-2-14　多位老友出席伊斯兰党于优景镇举行的新春团拜。

9-2-14　多位老友分别出席董总于新纪元及培群独中于笨珍校园的新春团

11-2-14　我会代表出席新山小商公会的新春团拜。

13-2-14　我会联合廿一世纪柔州联委会及士姑来凤凰友好联谊会等团体发表联合声明，全力支持边佳兰人民的反迫迁行动。

18-2-14　出席ENGAGE举办的有关选区划分的讲座。

22-2-14　十多位老友出席人民公正党的新春团拜讲座会。

23-2-14　廿多位老友出席士古来凤凰友好联谊会的新春团拜。

8-3-14　多位老友出席于彭亨州文冬举行的由绿色盛会主办，老爸老妈改革运动协办的〝308人民觉醒之夜〞宴会，并捐献一千元作为活动基金。

23-3-14　多位老友出席劳勿人民烈士碑公祭活动。

3-4-14　十多位老友出席新山歌文茶的抗日殉难同胞的公祭活动，并致送花圈。对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的举动与企图复辟军国主义表示强烈抗议。

12-4-14　我会代表出席支援边佳兰人民捍卫义山反迫迁的华团　章活动。

1-5-14　参与培群独中新楼动土礼，我会捐献一千元作为动土嘉宾。

8-5-14　砂州中区友谊协会秘书俞诗东老友到访我会，对伊刑法、华教、时事等课题进行了亲切交流。

13-5-14　新加坡人权组织“Function 8”和非政府组织“Maruah”为纪念1954年5月13日新加坡华校中学生反对英国殖民主义者强行实施征召男性服兵役，而展开的和平请愿与绝食斗争60周年而共同主办了午宴聚餐会。当天出席者多达八百人。我会也有十多名会员参与其盛。当天主要的演讲嘉宾包括林福寿医生令弟林福坤及傅树介医生。

1-9-14　我会主席何声让及多位会员出席于汶来孝思园和平纪念公园举行的纪念抗日卫马英雄〃九一忠魂节〃追思大会。纪念先贤烈士反侵略所付出的牺牲。　后，我会与马来西亚凤凰友好联谊会、马来西亚21世纪联谊会及多州老友会等9团体发表联合声明，要求董总搁置发言人机制，以免造成董总分裂。

我会的内部活动主要有以下几项：

2014年2月16日在古来新国泰酒家举办新春联欢午宴。宴开四十席。

5月4日在会所召开2014年度会员大会，选举第四　理事。并于5月11日进行复选，产生新　理事。

今年我会的重要活动是6周年纪念征途文艺晚宴。经过　宴工委会、　全体演员、新加坡友人及老友的一批子女几个月的努力工作之下，终于成功于8月17日晚圆满落幕。

这次晚会的节目〃征途史诗歌舞剧〃是描述那个年代我们所走过的征途。以诗歌串联整个故事，再以歌唱舞蹈、口琴演奏、快板及三句半等形式完成整个表演。故事从抗英、抗日的苦难岁月，爱国志士横遭逮捕、驱逐出境或惨遭杀害，迫使许多人走上抗争的道路。经过长期的社会运动，人民渐渐觉醒，开始看到改变现状的曙光。节目共分四段（1）苦难岁月。（2）火红年代。（3）　云笼罩。（4）大时代的召唤。当晚我们也推出一本印刷精美、内容丰富的纪念特刊。晚会宴开90席，筹款也超出指标。

我会将于26-11-14 举办6天4夜泰国　城游及20-12-14三天一夜全国老友大聚会之旅。

第四届理事会（2014-2015年）

会务顾问：赖益盛
主　席：何声让
署理主席：张北琛
副主席：罗明亮
总　务：林亚坤
副总务：陈传兴
财　政：李群熙
副财政：潘期浩
福　利：罗亚友
副福利：郑京华
文　教：刘隆昌
副文教：杨秋顺
康　乐：冯文基
副康乐：何声兰
理　事：徐金木　陈明　何凤兰　杜顺兰　李亚明　黄福贞
委任理事：杨和发　何声兰　冯文基　林金芝
查　账：潘淑华　林　修

走過征途 勿忘歷史
老友會歌舞劇震撼全場
中国报 19.08.2014 星期二 C11

2014年8月17日六周年会庆文艺晚宴报章报道

“征途”文艺表演

剪彩仪式

2014年4月3日出席
新山哥文茶纪念抗日殉难同胞公祭活动

前排左起：李群熙　刘隆昌　林亚坤　何声让　赖益盛　郑京华　何凤兰　张北琛
后排左起：罗明亮　罗亚友　黄福贞　陈传兴　陈明　杨秋顺
后排右起：杜顺兰　杨和发　冯文基　潘期浩　林金芝

槟州老友联谊会会史简介

第七屆全國老友大聚會

2004年间，槟州一群上了年纪的热爱华教人士，从报上获悉有关霹雳州老友联谊会的活动报导后，便与对方取得联系，并由前任副主席关书遐与现任主席陈克昌等创会成员，组团前往该会探访取经。经过一番努力和克服了主客观的障碍后，大家达致共识，于2005年12月4日成立了筹备委员会，积极着手草拟章程，并于2006年初向当局申请注册。本会的注册申请终于在2006年6月28日获得槟州社团注册局的正式批准。

创会初期，在大家合力支持推动下，会友们做了不少有益于华教的工作，如支持“救救白小”活动、协助新纪元学院筹款等。在联系各华教团体的活动中，本会也与槟州独中教育基金会、林连玉基金槟州联委会等团体，联办“槟州华教之旅”常年活动，即组织和赞助槟州五所独中及部份其他中学师生，于每年华教节参与公祭族魂林连玉与弘扬林连玉精神、提高对母语教育和华教历史的认识、以及扩大多元文化视野等户外教育活动。这项有意义的工作，在老友们的热心推动与各界人士的大力赞助下，多年来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前后成功举办了十届，受益师生达数百人。

在几经波折、历经人事变迁的摸索发展过程中，本会总算逐渐步上了与时代和人民需求相结合的正轨，正在努力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到当前各族人民的各项改革运动中去。

本会之所以积极参与各项与我国人民利益密切相关的社会活动，除了基于本会同仁一贯的理念外，也基于坚持贯彻各州老友会于2009年所达致的、要为人民利益和社会进步而奋斗的共识与誓言。

我们深信，个人会在社会实践与群众运动中成长，而人民力量也会在各种正义斗争中凝聚和日益壮大。因此，本会同仁愿本着一贯立场，一如继往地信守共同的承诺，继续为推进祖国人民的社会改革事业而努力。

槟州老友联谊会
第四届（2013-2014）理事会名表

主席：陈克昌
副主席：陈裕华，林福运
秘书：陈雪文
副秘书：陈志光
财政：刘国权
理事：刘建立
廖雍泉
李家全
杨孟显
方光烈
查账：钟友添
陈智扬

▼部分理事与部分会员合照于会所

槟州老友联谊会活动简报

第七屆全國老友大聚會

1月29日：陈克昌主席率陈裕华、林福运、陈雪文、廖勇铨诸理事，赴隆出席于新纪元学院举行的七州老友联谊会联委会议。会上从甲州老友会手中接过2014年度联委会主席州的职务。

2月25日：成立第七届（2014年）全国老友大聚会筹委会，以陈克昌为筹委会主席，杜乾焕博士为大会主席。会上为本届大聚会确立跨族群和多元团结的方针，议决举办专题论坛，邀请各族社运领袖主讲全民关心的共同议题，并广邀友好非政府组织代表及各族老友前来出席专题论坛和晚宴。筹委会也决定吸纳新血加入，以协助推动工作。

3月8日　：与风凰友好联谊会、21世纪联谊会联办三八国际妇女节庆祝活动。

4月13日　：举行第四届第二次常年会员大会。

4月19日　：受全国联委会秘书处之托，理事陈雪文、刘建立，陈志光与王益升代表全国老友联谊会联委会，前往卡巴星丧府吊唁及致送花圈，挽词题字：“向真正的爱国者、不屈的正义战士、人民英雄卡巴星，致以最崇高敬礼”；并于次日出席于槟州大会堂举行的州葬礼。

5月1日　：成员出席北马职工会于北海举行的五一劳动节庆祝活动。

8月16日　：数理事前往淡马鲁出席华教节序幕礼及时事讲座会活动。

8月27日　：第七届全国老友大聚会筹委会于会所举行新闻发布会。

9月16日　：数理事前往怡保出席霹雳州独中复兴运动四十周年纪念晚宴。

10月16日　：数成员赴隆参加律师公会于国会大厦前举办的“废除煽动法令”抗议游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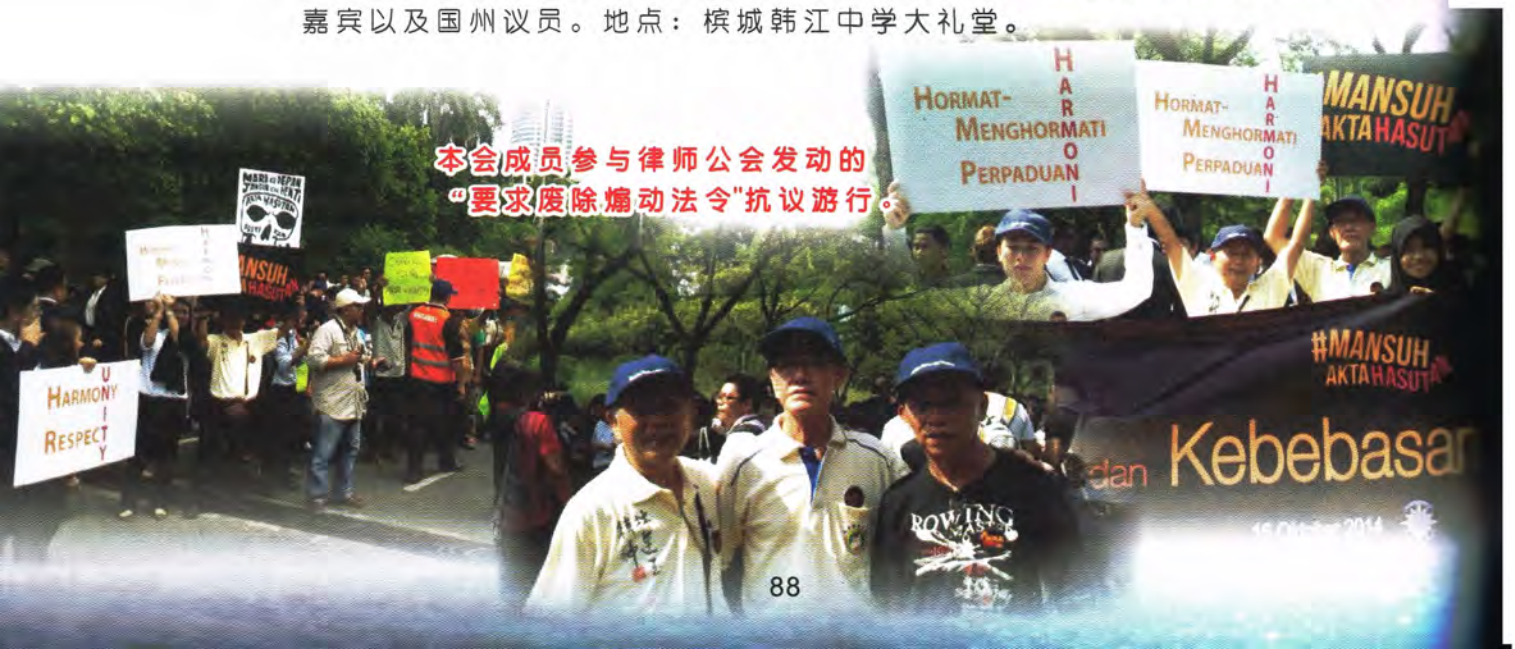
10月22日　：假雪隆老友联谊会会所召开2014年第一次联委会议。我会出席代表包括陈克昌主席、陈裕华与林福运副主席、秘书陈雪文、财政刘国权、记录郑有聪。

11月11日　：数理事出席槟州人民公祭南侨机工烈士暨二战殉难同胞纪念仪式。

11月15日　：与槟州独中教育基金会等团体于菩提独中联办“华教之旅半日营”，恭请莫泰熙先生为多所中学生讲述华教奋斗故事，弘扬林连玉精神。

12月14日　：与槟州独中教育基金会、林连玉基金槟州联委会等团体联办第十届“槟州华教之旅”，带领并赞助槟州五独中等80位中学师生，前往首都参加公祭族魂林连玉及出席林连玉精神奖颁奖典礼与林连玉纪念馆开幕典礼等华教节活动。本会主要理事皆随行。

12月21日　：主办由全国老友联谊会联委会主催的第七届（2014年）全国老友大聚会。活动内容包括（1）独立前后我国人民抗争史迹图片短片展（2）双语专题论坛：贪腐霸权下人民力量团结之路（3）千人联欢晚宴（4）出版多语纪念特刊。晚会宴开近90席，出席者包括来自东西马各州及友会老友、非政府组织代表、各族各界嘉宾以及国州议员。地点：槟城韩江中学大礼堂。



本会成员参与律师公会发动的“要求废除煽动法令”抗议游行。

雪隆老友联谊会
会务报告

01/01/14　本会十位理事在会长黄隆洲率领下，到巴生滨海老友会会所与滨海老友、万津老友进行友好交流。

晚上七点，转赴到兰花海鲜酒家出席陈凯希举行的“雪州老友联谊晚宴”当晚，陈凯希伉俪在台上捐款50万予11个团体，本会受捐助2万。

19/01/14　一年一度新纪元义卖会，本会众多会员参与其盛，并出钱出力参与义卖会，为华教献点绵力。今年是新纪元升格为大学学院第一届毕业典礼，场景异常热闹。

02/02/14　本会代表张南效及萧永兴出席了彩虹联谊会的新春团拜晚会，

09/02/14　董总在新纪元举办新春团拜，本会有二十多位会员出席。

15/02/14　第七次三会新春团拜（雪隆老友联谊会、凤凰（增江区）友好联谊会、廿一世纪（雪隆区）联委会），“辞旧岁励志犹在、庆新年老友同欢“在增江华小礼堂筵开76席，出席人数异常踊跃，

08/03/14　由凤凰友好联谊会、廿一世纪联谊会、全国老友联谊会联合举办“国际三八妇女节“在槟城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老友以及泰国朋友有约千人，联欢晚宴筵开百席。雪隆区三会老友共乘一辆巴士赴会。

08/03/14　今早九时许在富贵山庄，由董总举办的前董总主席林晃升逝世12周年公祭仪式，本会副会长杨静来代表本会出席，并献上花圈向这位华教运动杰出领导人致敬。

09/03/14　昨天MH370马航失联客机乘客有一位是本会会员黄世生，当接获消息后，本会会员上下无不感震惊、不安。今天本会有十多人齐到其住家向郑桂亮探 询、安慰，并希望奇迹出现。黄世生也是本会纪律组主任。

11/03/14　一连四天MH370马航失联客机依然音讯全无，我们全体会员和他的家人一样对黄世生的安危深感焦虑、不安。本秘书处向会员们发了一则短讯，“希望大家一起来向黄世生祈福、一齐等待马航的平安归来。用我们的关爱陪伴黄世生的家人一起度过这焦心的时刻”。短讯也登录到雪隆老友的面子书页。

16/03/14　雪森抗日抗英殉难烈士纪念碑家属委员会，在富贵山庄大门口右侧的烈士纪念碑前举行春祭追思祭拜仪式。

23/03/14　在彭亨劳勿荣华富贵山庄烈士墓前举行的春祭。本会有近十位会员出席祭拜仪式。并送上花圈一个向烈士们致敬。

20/04/14　下午两点的讲座会，本会文教组邀请到加影区前州议员李成金到本会主讲“加影攻略的分析“，主持人：陈笃焉。出席的会员有四十多人。

01/05/14　今年的五.一劳动节，我国在非政府组织号召下，人民走上吉隆玻街道齐集到默迪卡广场进行反对政府征收消费税集会。本会会员有参与这场征收消费税的抗议行动。

18/05/14　近期闹得沸沸扬扬的伊刑法，在我国社会引起极大的争论。本会文教组邀请到谢春荣律师主讲：“关于回教刑事法”。给我们会员讲解伊刑法，对我

国会产生怎样影响。

24/05/14为尊孔独中家协筹募学生福利与活动基金《尊孔独中家教协会2014园游会》本会参与了尊孔家协义卖活动，在尊孔独中校地开设了一摊位义卖糕饼、蔬果等物品，并在会员中兜售其固本，为华教献点绵力。

25/5/14廿一世纪诚邀本会参与联办《内奸莱特事件揭秘》一书推介礼，晚上七点半在假雪华堂二楼会议厅举行。副会长杨静来代表本会出席了推节礼仪式，本会出席者尚有多位会员。

04/06/14 本会以杨静来为团长率领了32人启程前往中国，《八天云南贵州（遵义）红色之旅》涉足当年红军长征路线和观光景点，浏览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路程。

19/06/14 由廿一世纪出版社及数个非政府组织（马来组织）主办“纪念抗英斗爭66周年”晚上八点在雪华堂楼上谢富年讲堂进行讲座会，全场以马来文主讲，吸引了七、八十巴仙的马来青年前来聆听。

22/06/14 “622终结莱纳斯行动”，本会驱车前往关丹格宾稀土厂参与绿色盛会的有杨静来、李文清、萧思莲、吕柏利、陈志坚、韦龙飞外，尚有好几位会员赴会。人群队伍有序地、和平地朝稀土厂前进中，不断受到警方的阻扰，停止、前进、停止、前进，当抵步到稀土厂咫尺之遥的路口时，警方蛮横地阻挡绿色盛会人群向前挺进。在绿色盛会负责人不间续地交涉，警方依然故我，直到下午四点左右激昂的人群情绪高涨，警方却采取强硬手段打压，驱赶、逮捕绿色盛会的负责人，导致十六人被捕。

1/037/14 由爱国同盟俱乐部及孝恩文化基金主办，大马凤凰友好联谊会、21世纪联谊会、老友联谊会协办，汝来孝恩园和平骨灰阁落成开幕礼。本会出席观礼的会员有廿位左右.

28/07/14 本会康乐组合唱团租赁一辆巴士，组团到彭亨关丹林明与林明客家公会合唱团和民众图书馆合唱团作歌唱交流，并顺道进行两天一夜游，除了合唱团员门外尚有本会的会员参与外游、观摩为合唱团员们打气、喝彩。

17/08/14 柔佛老友庆祝成立六周年纪念晚宴，及“征途歌舞剧“文艺表演。这是场感动人心、高技术的演出，它反映我国人民在反帝反殖过程中直到现在许多可歌可泣的史迹。本会除了部分理事出席外，尚有不少会员赴会。

23/08/14 董总六十周年会庆晚宴，在加影董教总教育中心草场举行。本会购席一桌，另有会员自购餐席，当晚出席的会员有二十多位参与其盛。

28/08/14 本会组团泰国勿洞和平村万果节之旅，一团四十多人按原定日期，晚上十一点半，在会所出发。

01/09/14 “九一忠魂节“追思大会在汝莱孝恩园和平公园举行祭拜活动，本会有二十来位会员参与公祭和追思大会。

13/09/14 “中秋佳节大团圆，老友齐盼圆心愿”本会庆祝一年一度的中秋晚会。

14/09/14 本会购券一桌出席霹雳老友在怡保育才独中大礼堂举行的十周年餐宴。

16/09/14 三会联办（雪隆老友、凤凰（雪隆区）廿一（雪隆区））。“纪念陈老总逝世一周年”在本会会所举行。

21/09/14 文教组书法班正式开班，喜好文书的会员到来上课的有十多位。

第七屆全國老友大聚會

第六届{2013—2015}理事会名表

会长：黄隆洲
秘书：韦龙飞
财政：张南效
文教：黄亚才
康乐：林志强
福利：林德兴
理事：曾彩芬　萧永兴　高天聪　韦莲妹　林东邦　李新亮

副会长：林亚华 杨静来
副秘书：谭亚英
副财政：赵福贵
副文教：陈笃焉　吕柏利
副康乐：叶光
副福利：李妹

书法班

26/06/14赠送纪念品予中国广东侨联代表

22 终结莱纳斯行动

24/05/14尊孔义卖会

森州老友联谊会
会务报告

(2014年1月至9月)

1.会议

1.1 2014年4月20日，本会召开第二十二次理事会议，再次通过“修改章程第九条：理事会9.2及9.4”，因去年迟交而受拒。

1.2 2014年5月11日，本会召开本年度会员大会，再次通过“修改章程第九条：理事会9.2及9.4”。

2.活动

2.1 2014年1月19日，第七届全国老友联谊委会假董总会议室召开第一次会议，赵华护、胡德周出席。

2.2 2014年6月29日，胡德周代表本会出席林连玉基金会员大会并投票选举第九届懂事会，候补代表刘钦洲与会。

2.3 2014年71月13日，汝来孝恩和平纪念骨灰阁推介礼，赵华护、刘钦洲、黄妹、何建昌出席。

2.4 2014年9月1日，本会参与九个友会，发表“坚决反对分裂董总，要求搁置发言人机制”的联合声明。

2.5 2014年9月26日，本会参与十一个华团及友会，发表“关丹中学是否可考统考，应要求教育部明文批准”的联合声明。

3.义举

3.1 2014年1月9日，本会参与新纪元大学学院嘉年华，义卖胡德周及赵华护老友所购捐的蔬果，筹获894令吉，加上理事推售义卖卷1500令吉，叶国安义奏87令吉，合计2481令吉。

3.2 2014年6月15日，森华董联会举办筹募购置会所基金联欢宴会，本会理事购捐宴席1000令吉。

3.3 2014年7月6日，芙蓉中华中学“101”义卖会，本会协助推售义卖券1200令吉。

3.4 2014年7月27日，本会参与波中百年校庆嘉年华义卖会，叶国老友义奏共筹得858令吉。

4.关怀。探访

2014年3月16日，在富贵山庄公祭烈士后，华护、德周、钦州、天福、黄妹、陈亚苟回程特往曾思桂家探候他。

5.公祭。追思。吊唁

5.1 2014年1月30日，理事刘佛通老友中风逝世，当日举殡。理事、会友到显南道堂送别他。

5.2 2014年2月25日，赵华兴老友病逝。不少本地与外地老友来赵府吊唁。

5.3 2014年3月16日，富贵山庄雪森抗日抗英殉难烈士纪念碑公祭，本会敬献花圈，数理事。会友与祭。

5.4 2014年8月10日，本会参与联办815世界和平日69周年纪念公祭，赵华护任筹委会主席，代表华团诵读祭文。

5.5 2014年9月1日，主席赵华护、刘钦洲、黄妹、郭宝珠赴汝来孝恩园，出席九一忠魂节追思大会。主席代表联委会联合主持和平纪念骨灰阁落成礼。

森州老友联谊会
第五届(2014-2016)理事会名单

主席： 赵华护

副主席： 张振松

副主席： 曾亚苟

秘书： 胡德周

副秘书： 刘钦洲

财政： 范天福

副财政： 阙菊兴

福利主任： 黄妹

副福利主任： 郭宝珠

康乐主任： 罗金龙

副康乐主任： 姚金堆

理事： 陈侨生、杨世明、张广源、任成发、
邓南坚、陈天生、

查账： 陈水生、陈哲纯

第七屆全國老友大聚會

马六甲老友联谊会2014年活动简报

(1) 2-2-2014华人新年初三，参与东甲老友新春午宴。来自利民达，砂益.利丰港、麻坡等地老友欢聚一堂，席开六桌。老友间言谈甚欢，互相交流，洋溢着浓烈的新春气息。

(2) 23-3-2014参与劳勿烈士墓祭拜。

(3) 11-4-2014参与甲华联合12个团体联办的讲座会：题为《烈火莫熄2.0.是剂改革灵药或失效药？》

(4) 13-4-2014早上召开会员大会，选出第三届（2014-2015）理事会。

(5) 13-4-2014下午参与培风中学礼堂，由马六甲华教董事联合会与27团体联办的相声大汇演。

(6) 20-4-2014早上祭拜1945年<九.五>殉难抗日烈士墓。

(7) 1-5-2014下午出席麻坡凤凰友好联谊会举办的五一劳动节宴会。

(8) 10-5-2014晚于马六甲日落洞殡仪馆为王兴文老友举办追悼会，当晚，有来自雪隆的陈友信，李万千，莫泰熙等老友发表追思演说，对王兴文老友生前于雪华堂的贡献给予很高的肯定。

(9) 17-8-2014晚上出席于新山南方大学学院大礼堂，由柔佛州老友联谊会为庆祝六周年纪念举办的<征途文艺晚宴>。这是反映我国从40年代至今历史的回顾，时代的召唤，汇成一部气势磅礴的历史诗歌午剧。

(10) 1-9-2014上午出席在森州汝来孝恩园和平纪念公园举行的“九一忠魂节”公祭大会。

(11) 7-9-2014在陈益花园举办中秋节晚会，来自淡边，东甲，甲州各地的老友欢聚一堂。当晚，有猜灯谜，手风琴和口琴演奏，卡拉OK歌唱等娱乐节目。

(12) 28-9-2014参与由马六甲华堂青集合各社团在三宝山举行2014年（第8届）《三山九九，重阳登高》盛大庆典。周毓豪老友代表本会担任祭祀陪祭人。

马六甲老友联谊会第三届理事合照
(2014-2015)

前左起：何贵龙，周毓豪，张奕雄，蒋木海，吕亚绿，邓世杰
后左起：林永生，林依然，王正群，温秀娥

马六甲老友联谊会于2014年4月13日召开会员大会，
选出2014-2015年度理事会：

主　席：张奕雄
副主席：周毓豪
秘　书：梁高材
副秘书：吕亚绿
财　政：邓世杰
副财政：何贵龙
理　事：蒋木海，王正群，陈益，林依然，林永生
查　账：温秀娥，陈书森

PERSATUAN KAWAN KARIB NEGERI MELAKA
DT 248, JALAN ROS 2, TAMAN MEKAR, 76100 DURIAN TUNGGAL, MELAKA.
TEL / FAX: 06-5531430 H/P: 012-6939394 (吕亚绿)
EMAIL: johnlu_2478@yahoo.com.my

中秋节晚会手风琴和口琴合奏二首曲子：
彩云追月与晚会圆午曲。

警惕日本复活军国主义

联合声明

近年来，在境外势力的怂恿和挑动下，东亚地区的紧张气氛持续恶化。特别是日本右翼执政集团借机大步走上军国主义的发展道路。他们公然祭拜供奉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犯下战　罪、反人类罪的十四名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他们修改教科书，掩盖日本侵略亚洲的战　史实；否认日军在二战期间，对中国、朝鲜半岛、马来半岛等地人民的大屠杀；否认强迫被侵占地区妇女充当“慰安妇”；否认对各地平民　征押去从事苦役劳作；否认秘密研发生物细菌战对生灵的虐杀。他们企图通过修改和平宪法，取消“不战誓言”，解禁“集体自卫权”，恣意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秩序进行挑衅。一句话，他们企图否认侵略战　的性质，美化战犯的罪行，重新复活军国主义。

我们马来西亚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深受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残害。我们不能忘记在二战期间，有近五十万的我们同胞被屠杀和迫害致死(其中有七万多人在新加坡遇难)；日军强迫华人缴纳巨额奉纳金和迫使无数人去建造死亡铁路。每当想起那段日夜伴随死亡、饥饿阴影的苦难岁月，人们仍然心有馀悸，痛恨填膺。我们强烈谴责那些反人类的战　罪行，　不容许这种惨酷的历史重演。

我们期望亚洲以至世界各国(包括日本)人民，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复活，不要相信他们宣传奉行什么“积极和平主义”的谎言，要警惕他们重新走上侵略扩张的阴谋，要共同维护国际反法西斯战　的胜利果实。

马来西亚凤凰友好联谊会
马来西亚老友联谊会全国联委会
马来西亚21世纪联谊会
2014年1月30日

用手中一票，反对国阵的各种不公政策和措施

联合声明

2013年5月5日举行的第13届全国大选过去将近一年，迎来了另一个补选——加影州议会补选。可以说，选举结果将反映出人民对一年来中央政府和雪州政府施政表现的评价。

大选前屡次表示转型优于改革、到处派钱换选票的执政当局，选后就要人民付钱买单了。税收大幅提高，物价急剧飞涨，搞得人民怨声载道，成了民生最大课题。一年来，以巫统为老大的国阵中央政府放任种族主义言论喧嚣尘上，默许威胁报复反对国阵选民的言论公开传播，纵容侵犯宗教信仰自由的极端言行频频发生。巫统内外的种族主义极端势力不断挑衅敏感课题，破坏民族关系，发出种族主义叫嚣。当权者及朋党们，更是忙于掠夺国家财富，搜刮民脂民膏，任由物价飞涨，社会治安失控。可以说，以巫统为老大的国阵，并没有吸取遭受人民唾弃的教训，也没有心思倾听人民发出的各种诉求，仍然延续过去那一套朋党垄断、单元同化、宗教霸权的种族主义政策。尤其令人感到愤慨的是，当权者粗暴操控司法的行径，许多涉及当权者及朋党的重大案件，高庭宣判嫌犯死刑或有罪的（例如杀害蒙古女郎的嫌犯），经过上诉庭，却无罪释放。最近，更对所谓“安华鸡奸案”，高庭宣判证据不足，无罪释放，到了上诉庭却又被判有罪，妄图以此阻扰安华参加加影补选，甚至颠覆雪州民联政府。

另一方面，人民群众也清楚看到：人民联盟虽然在揭发国阵执政当局贪污滥权以及各种施政不公方面做得很到位，但是他们没有善加利用已经掌握的3个重要州属的执政权力，特别是深入研究这些州属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和发展方向，也没有很好建立起同各民族社会团体、组织和群众的紧密联系，更谈不上搞出一个符合人民期望的、以民为本的良好施政的州政府样板，以便为迈向执政中央提供有益经验。可以说，民联各党的政策与施政，同支持者的期望，仍然存在不小的差距。

然而，当前的现实是，巫统/国阵的贪污滥权、朋党为先、物价飞涨、宗教霸权、单元主义、种族政治，等等，成了妨碍我国社会发展的最大阻力。如今，国阵又要以个别候选人的清廉形象来欺骗选民，我们决不能再受骗。因此，我们认为应该利用这次补选，通过手中一票，明确表达：拒绝操控司法！拒绝贪污滥权！拒绝朋党主义！拒绝物价飞涨！拒绝宗教霸权！拒绝种族主义政治！拒绝单元同化政策！！

我们呼吁加影选民们，支持旺阿兹莎，反对国阵的各种不公正政策和措施！！

马来西亚老爸老妈社会改革运动工委会

2014年3月15日

吁请政府尽快废除《煽动法令》
联合声明

01-11-2014

众所周知，《煽动法令》是1948年即66年前英殖民当局为了镇压我国人民争取独立的运动,而制定和实施的许多恶法之一。但是，独立后的我国执政当局，不但没有废除殖民地时代的恶法，反而在1969年“5·13”事件发生后，对1948年《煽动法令》加以修订，赋予执政当局更为广泛的权力，以对付一切异议者。

长期以来，执政当局频频沿用英殖民地时代的各种恶法，以莫须有罪名逮捕成千上万名反对不合理制度和措施、要求应有权益，以及争取公平与正义的人士，包括工人、学生、教师、社团领袖、工会领导，以至民选议员等等。

近年来，政府一再滥用上述《煽动法令》，逮捕和提控反对党领袖及公民社会的维权人士。许多国会议员、州议员、法律专家、知名学者、人权律师，都遭到对付，不是被调查、问话，就是被扣留，监禁。但是，那些公然发表种族主义极端言论，破坏宗教信仰自由，挑战宪法赋予公民应有权利，破坏民族团结，挑动族群互相猜忌，损害社会和谐的极端的宗教和种族主义政客，却逍遥法外，横行无阻。这就造成独立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社会和谐屡遭践踏，民族关系日益紧张，国民团结难以促进的恶果。

首相纳吉曾在2012年7月承诺废除《1948年煽动法令（修订）》，两年多来，政府既没有兑现诺言的意愿，也没有废除该恶法的迹象；反而频繁的动用该恶法来排除异己，以及危害公众利益。

我们吁请政府尽快废除《1948年煽动法令（修订）》，在废除该恶法的过渡期，严禁警方继续动用该法令，对付所有相关人士。

凤凰友好联谊会	廿一世纪联谊会	全国老友联谊会联委会
槟州老友联谊会	霹雳老友联谊会	雪隆老友联谊会
森州老友联谊会	甲州老友联谊会	柔佛老友联谊会
彭亨老友联谊会	吧生滨海老友联谊会	万津老友联谊会
砂拉越中区友谊协会	美里友谊协会	马　西亚彩虹联谊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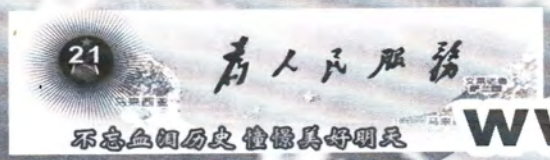
槟州老友联谊会
PERSATUAN KAWAN KARIB PULAU PINANG

至诚祝贺

槟州老友联谊会主办
第七届全国老友大聚会志庆

心系人民
脚踏实地

马来西亚 PERSATUAN ABAD KE 21 联谊会 世纪联谊会



二一老友网
www.of21.com

梁希元基金

21 21世纪出版社
21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enerbitan Abad Dua Puluh Satu

热烈祝贺

槟州老友联谊会成功主办
第七届全国老友大聚会志庆

團結友愛
和諧共處

雪隆老友联谊会 敬贺

热烈祝贺

槟州老友联谊会成功主办
第七届全国老友大聚会志庆

多元開放綠千山
一心為民納百川

马来西亚彩虹联谊会　敬贺

槟州老友联谊会成功主办
第七届全国老友大聚会志庆

不積跬步，無以至千裡；
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

騏驥一躍，不能十步；
駑馬十駕，功在不舍。

鍥而舍之，朽木不折；
鍥而不舍，金石可鏤。

森州老友联谊会　敬贺

热烈祝贺

槟州老友联谊会主办
第七届全国老友大聚会志庆

不是一番寒徹骨
爭得梅花撲鼻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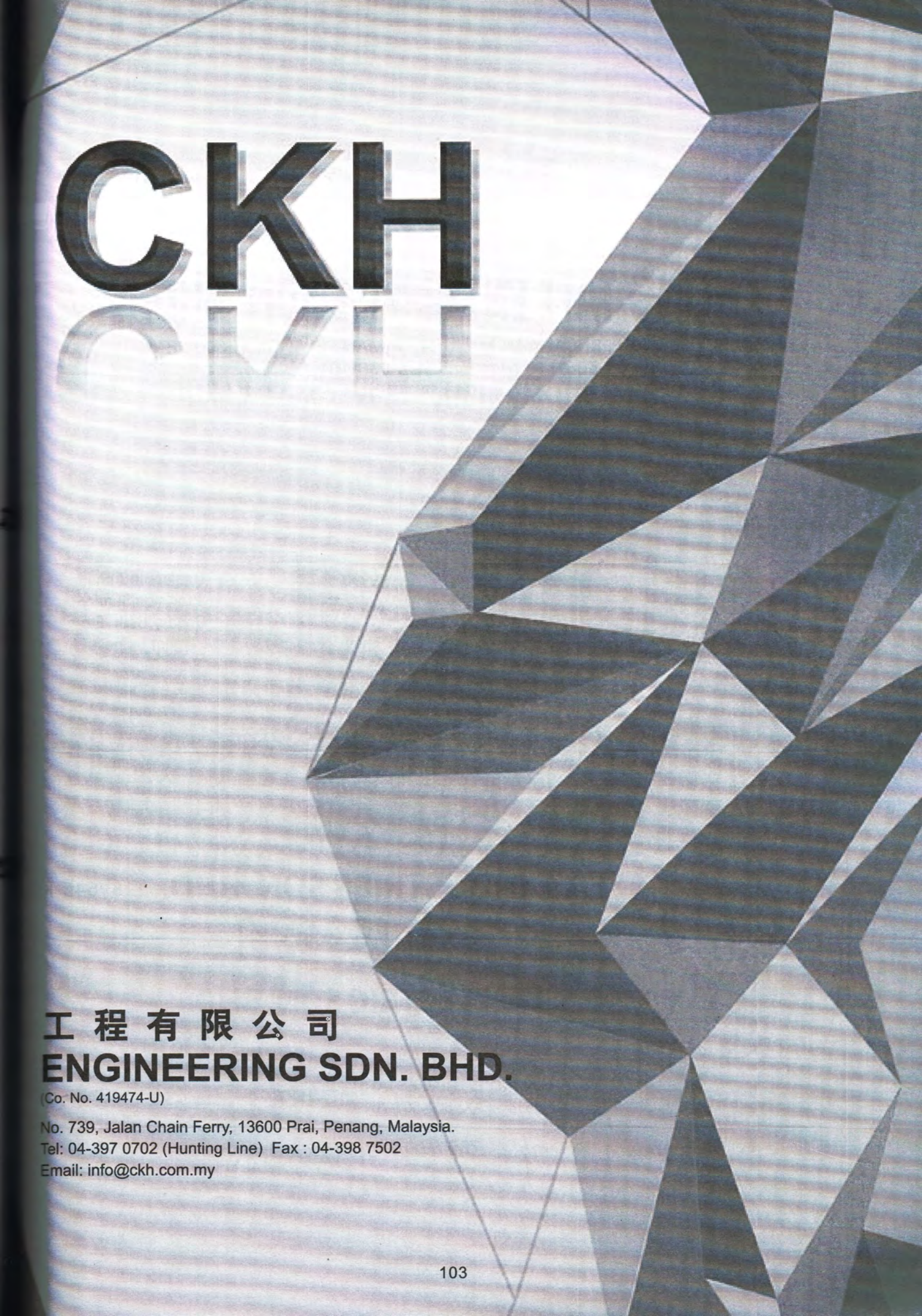
增江凤凰友好联谊会 敬贺

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
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

巴生滨海老友联谊会 敬贺

暮色蒼茫看勁松
亂云飛渡仍從容

万津老友联谊会 敬贺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ENGINEERING SDN. BHD.

(Co. No. 419474-U)

No. 739, Jalan Chain Ferry, 13600 Prai, Penang, Malaysia.
Tel: 04-397 0702 (Hunting Line) Fax : 04-398 7502
Email: info@ckh.com.my

棕達企業有限公司

威省北賴彩虹工業園 (244819-K)

CHONG TATT ENTERPRISE SDN. BHD.

NO. 7, LORONG PERUSAHAAN MAJU 11, TAMAN PELANGI, 13600 PRAI.
TEL: 04-5081179 (Hunting Line), 5081181, 5081182
FAX : 04-5081192

本號專營：
歐亞罐頭什貨啤酒
黑狗啤酒
代理：虎標啤酒
錠標啤酒

Dealers In Tinned Provision Sundry Goods, Beer Etc. Agent Guiness Stout, Tiger Beer and Anchor Beer Products.

鋒達工業有限公司

HONGTAT INDUSTRIES SDN. BHD. (289646-K)

馬建大電業有限公司

MAGENTA ELECTRIC SDN. BHD.

PLOT 62, PHASE 4, PRAAI INDUSTRIAL ESTATE, 13600 PRAI.
TEL: 604-507 7613, 507 6614 FAX: 604-507 7617

Switchboard Assemble, Electrical Contractor

合力電器工程有限公司
HELID ELECTRICAL ENGINEERING SDN. BHD. (573037-V)

合力電器工程
ALLITE ELECTRICAL (AS 0046011-D)

53, 55, Kompleks, Taman Siakap, Tingkat Siakap Tiga, 13700 Seberang Jaya, Prai, Penang, Malaysia.
Tel : + (604) 399 5725, 390 3032 Fax : + (604) 390 3032 E-mail: allite_letrik@yahoo.com

欢迎战友 *Lagu Sambutan*

1=F $\frac{4}{4}$

曲 *Irama* ：彭少雄 遗作
词 *Seni Kata*：Kamarudin
（向红原作，老友改编）

0 5 | 4 4 3 2 4 3 3 2 1 3 | 2 2 1 7 2 1 0 5 | 4 4 3 2 4 3 3 2 1 3 | 2 2 1 7 2 1

0 5 ‖: 1 3 5♯4 5 · 3 | 5 1 7·6 5 · 3 | 1 3 5♯4 5 · 3 |
旌 旗 飘 扬，战 歌 嘹 亮，激 情 满 腔，掌
(Ber) - kibar bende - ra, La - gu me lan - tang, Pe - nuh ter ha - ru, Te -
（为） 人民 权 益，团 结在 一 起，为 公平 正 义，战
(Un) - tuk kua-sa rak-yat, Ber - sa tu bersa - ma, Un - tuk ke - a-di - lan, Ber -

| 5 1 7·6 5 - | 4 4 3 2 4 3 3 2 1 3 | 2 2 1 7 2 1 - |
声 荡 漾，热烈 欢迎 欢迎啊 我们 亲密的 战 友，
puk berkumandang, Dengan meriah sambut sambut Kawan tercin - ta,
斗在 一 起，热烈 欢迎 欢迎啊 我们 亲密的 战 友，
tempur bersa ma, Dengan meriah sambut sambut Kawan tercin - ta,

1. 2. 3. 4.

| 4 4 3 2 4 3 3 2 1 3 | 2 2 1 7 2 1 · 5 :‖ 2 2 1 7 2 1 ‖
热烈 欢迎 欢迎啊 我们 亲密的 战 友。
Dengan meriah sambut sambut Kawan tercin - ta, 为
热烈 欢迎 欢迎啊 我们 亲密的 战 友。 Un
Dengan meriah sambut sambut Kawan tercin - ta.

我站在铁窗边

1=D $\frac{4}{4}$

5 ‖: 5 · 6 5 3 2 1 | 3 – – ^{V} 3 5 | i · 7 2 i 6 3 | 5 – – ^{V} 6 |
我 站 在 铁 窗 边， 遥望 祖 国 万 里 天。 壮
(我) 站 在 铁 窗 边， 遥望 祖 国 万 里 天。 先

| 6 · i 5 3 5 | 2 6 – ^{V} 5 6 | 5 6 5 3 0 | 2 1 – – |
志 冲 云 霄， 仇 恨 满 胸 膛!
烈 洒 鲜 血， 革 命 有 方 向!

| 3 3 5 3 · 5 | 1 6 i 5 – | 6 6 5 6 5 | 3 – – – |
无惧 虎 狼 铁 锁 链， 铁 锁 链，
人民 苦 难 水 样 长， 水 样 长，

| i i i 2 · i | 5 3 5 6 – | 1. 2 – 7 6 i | 5 – – 5 :‖
奋斗 终 身 永 向 前， 永 向 前! 我
开创 历 史 新 纪 元，

2. | 2 – 7 6 5 | i – – ‖
新 纪 元。

越是艰险越向前

1=F $\frac{4}{4}$

坚定，有信心地

5 · 4 3532	1 – – 3	2 · 3 2176	5 – – 6·5
明 知 征	途	有 艰	险， 越是

3 5 1217	6 6·5 1 2	5 · 6 5432	3 – – 2·2
艰 险 越 向	前， 越是 艰 险 越	向	前。 任凭

5 5 4 32	1 – – 35	2 7 61 5	6 – 3 · 5
情 况 多 变	化，	一颗 红 心 似	火 焰。 立 下

1 1 1217	6 – 0561	2 6 5 –	0523 1 –
愚 公 移 山	志， 迎来	春 色	换人 间。

坚持一贯立场

1=C $\frac{4}{4}$

坚定，有信心地

$\underline{3\ 4}\ \|:\ 5\ 6\ 5\ \underline{3\ 2}\ |\ \underline{1\ 1}\ 2\ 3\ \underline{2\ 3}\ |\ \underline{4\ 4}\ \underline{4\ 4}\ \overset{\frown}{3\quad 2}\ |\ 5\ -\ -^{\vee}\ \underline{3\ 4}\ |$

不管　我们被关在　什么地方，都要　坚持一贯立　　场。　　任何

(不管)　我们被关在　什么地方，都要　坚持一贯立　　场。　　任何

$|\ 5\ 6\ 5\ \underline{3\ 2}\ |\ \overset{\frown}{1\quad 2}\ 3\ \underline{2\ 3}\ |\ \underline{4\ 4}\ \underline{4\ 4}\ \overset{\frown}{3\quad 2}\ |\ 1\ -\ -^{\vee}\ 1\ |$

困难难不倒　我　们，坐牢　到处都是　一　　样。　　在

困难难不倒　我　们，坐牢　到处都是　一　　样。　　在

$|\ 6\ -\ 6\ 6\ |\ 4\ 6\ 5\ \overset{\frown}{\underset{3}{3\ 3\ 4}}\ |\ 5\ \underline{5\ 5}\ 6\ 5\ |\ 3\ -\ -^{\vee}\ 1\ |$

恶　劣的　环境里，我们要　锻炼得更　坚　强，　　要

恶　劣的　环境里，我们要　锻炼得更　坚　强，　　要

$|\ 6\ -\ 6\ \underline{i\ i}\ |\ 5\ -\ 3\ \overset{\frown}{\underset{3}{2\ 2\ 2}}\ |\ 7\ 7\ 6\ \overset{\frown}{7\ 6}\ |\ 5\ -\ -^{\vee}\ \underline{3\ 4}\ |$

做　光荣的　战　士，时刻把　思想来武　　装。　　不管

做　光荣的　战　士，时刻把　思想来武　　装。　　不管

$|\ 5\ 6\ 5\ \underline{3\ 2}\ |\ \underline{1\ 1}\ 2\ 3\ \underline{2\ 3}\ |\ \underline{4\ 4}\ \underline{4\ 4}\ \overset{\frown}{3\quad 2}\ |\ \overset{1.}{1}\ -\ -^{\vee}\ \underline{3\ 4}\ :\|$

我们被关在　什么地方，坐牢　到处都是一　　样。　　不管

我们被关在　什么地方，都要　坚持一贯立

$\overset{2.}{|\ 1\ -\ -\ \|}$

场。

团结紧

1=C $\frac{2}{4}$ ♩=96

5 3	1 · 3	5 6 i	5 –	5 5 5 6	i 5 i 3	2 · 3	2 –
团 结 紧 呀 团 结 紧，				各族 人民 一 条 心。			

3 3 3 2	i i 6	5 · 6	i –	2 i	6 6 6 i	5 –	3 –
我们 永远 跟 着 真 理 走，				打 倒 不合 理的 制 度。			

5 5 5 3	3 3 2	i · 2	6 –	5 3	2 2 2 3	2 –	i 0
我们 永远 跟 着 真 理 走，				走 向 自由 光明 世 界!			

团结就是力量

1=C $\frac{2}{4}$

5 · 4	3 5 i 2	3 –	i 0	5 · 7	i 7 i 6	5 –	3 0
Sa - tu padu berke kuat - an,				sa - tu padu berke kuat - an,			
团 结 团结 就是 力 量，				团 结 团结 就是 力 量。			

5 · 4	3 5 i 2	3 –	i i i	2 2	i i 7	i –	i 0
Sa - tu padu berke kuat - an,				sa tu pa du	berke kuat - an,		
团 结 团结 就是 力 量，				团 结 就 是	力 量。		

鳴謝

第七届全国老友大聚会全体筹委会同仁，谨此由衷感谢百忙中远道前来出席大会专题论坛的五位主讲人蔡添强国会议员、Dr.Jayakumar国会议员、Dr.Mujahid Yusof Rawa国会议员、社运青年代表Adam Adli与王泽钦；以及为纪念特刊惠赐专稿的特约作者与评论人孙和声、王国璋、朱进佳、李万千、莫泰熙、江伟俊以及Dr. Syed Husin Ali 、Dr.Poh Soo Kai、Hishamuddin Rais等名家。

同样地，我们衷心感谢槟州政府首长林冠英，以及所有在本届大会筹备过程中，给予我们慷慨赞助、热心协助与精神支持的槟州国州议员、各界友好与商家们，包括槟州议长刘子健、行政议员曹观友、彭文宝、章瑛、以及沈志勤国会议员、谢嘉平、李凯伦、王敬文、黄汉伟、郑来兴等州议员，还有砂拉越中区友谊协会、凤凰友好联谊会会长陈秀英、孙中山协会会长林秋雅、以及蔡有德、林木荣、林亚宽、郭晃霖、张经招等老友。

此外，我们要感谢为本届大聚会的成功举办，提供了以下宝贵支援的单位与个人：

槟城韩江中学惠借礼堂、食堂、课室及展览挂板
隆雪华堂惠借主要历史图片展资料
星光电脑植字有限公司精心排印纪念特刊
Winnerpoint广告社报效及制作横幅、对联和舞台布景
甲州郭挺劲老友负责设计特刊封面及舞台布景
霹州刘道南老友挥毫惠赐对联墨宝
首都马金泉舞蹈家赞助编舞、亲领共享空间舞团支援演出
首都Teater Bukan Teater为大会创作及呈献马来短剧
菩提独中校方师生派出舞蹈团、西乐团、华乐团支援演出
甲州谢培根老师专程担任特约舞台总监
甲州梁博慈专程担任特约司仪之一
森州符祥原口琴家担任特约领衔伴奏
首都赖兴祥老友担任特约手风琴伴奏
柔州吴连兴老友协助编曲担任指挥
首都蔡耀成老友协助翻译文稿
槟城李蕙卉、杨健燕协助翻译等工作

同时，感谢所有热心报效物品、惠登广告、慷慨解囊的各界友好商家们！
你们的支持，促使这次盛会得以在槟城成功举办。谢谢大家！

隆情厚谊，铭记心中
倘有遗漏，容后补上

編后語

为了突出本届大会主题与论坛重点，本刊除了依往例为各州老友会的活动进展作一般性报导之外，也整理了一些值得老友们共同珍惜的前人创作与精神遗产，希望藉重温大伙的战友情谊，温故而知新。

但最具现实意义的，也即是本刊的要务，不外是选刊了在有限时间内所能收集到的各地老友们对大时代所作出的回应和理性思考，以及对我国社会现实所进行的深层剖析与批判。尽管微不足道，但从特约作者们针对大家共同关心的全民课题所发表的论述中，相信必能多少触动我们几许焦渴的心灵。正因为广大老友们心中还燃着不灭的火种，才会对真理的探索产生较强烈的共鸣。

本着站在人民的立场和一颗正义之心，我们欢迎各种朝向真理所开展的实质性探讨，即使当中可能发出不尽相同的声音。今天，迈步在民主改革征途中，我们确有需凝聚各方志士高瞻远瞩的智慧，去启动新生的人民力量，进而汇成推进社会改革的巨浪。甚于此，本刊愿意提供这样一个平台，让过去和现在都在为人民利益和国家未来而积极发声的作者们，以他们的思想火花，为我们指点迷津、拨开迷雾，有助更好的看清前路。

当然，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认识上和看法上的差异在所难免。不过，共识才是我们所要加强和　固的重点。所谓“多元团结为正义，存异求同捍民权”，正是我们所要弘扬的精神理念。因此，这里所刊载的多元多角度的论述与作者的观点，仅供读者们参考，并不代表本会的立场。

最后，本筹委会特刊编辑组，在完成这项力所不逮的任务之际，衷心地向所有及时向我们伸出援手与给予鼓励的先进和友好们致谢和致敬，特别是百忙中慷慨供稿的名家作者们与译者们不辞辛劳的奉献，和不计版权的特许转载。他们的大爱，正是人民力量与集体精神的崇高体现。

宥于学识能力上、人力资源与时间上的局限，本刊编辑组只能凑合出如此水平的微小成果，以敬献给大家，还望爱护我会的各方老友们多多批评和指教。

谢谢大家！

第七届（2014年）全国老友大聚会筹委会
特刊编辑组同仁　敬启

2014年12月21日于槟城

槟州老友联谊会
PERSATUAN KAWAN KARIB PULAU PINANG

全国老友联谊会联委会主催・槟州老友联谊会主办

第七届(2014年)全國老友大聚會

多元團結為正義・存异求同捍民權

第七届全国老友大聚会 筹委会名表

顾问团：	拿督刘子健州议长，YB黄汉伟州议员，各州老友联谊会主席，李崇顺前主席
大会主席：	拿督杜乾焕博士
筹委会主席：	陈克昌（副）刘国权
秘书处：	陈雪文（副）郑有聪，陈志光
财政：	刘国权（副）刘建立，章美凤
联络：	郑有聪，陈雪文，王泽钦，苏淑华
征求：	陈克昌，刘国权，蔡有德，黄小明，李家全
文宣：	郑有聪
查账：	林鸣枫
专题论坛组：	王泽钦，苏淑桦，朱进佳
特刊编辑组：	主编/陈雪文，翻译/朱进佳，校对/陈裕华，陈志光
图片/短片展：	方国华，黄伟强，庄意添，王文卓，庄慧扬
演出节目组：	陈雪文，刘国权
舞台总监：	前台/谢培根，后台/许佩珍，龚宝镭
主持人/司仪：	苏淑桦，庄意添，梁博慈
网络/投影组：	王文卓，庄慧扬
音响/灯光：	刘国权，廖勇铨
布置组：	刘国权，林良彪，廖勇铨，陈智扬，王文亮
餐宴组：	杨孟显，刘建立，章美凤，朱幼香
票务组：	林福运，陈志光，廖勇铨
接待组：	刘建立，陈裕华，陈湘荣，王益升，龚宝镭
住宿：	谢蔡梧，陈雪文
交通：	王益升，林福运
督厨：	刘建立，王益升
摄影：	胡耀坚
纠察：	陈裕华，王文亮
委员：	阮伟伦，吴秀梅，陈若飞
对联墨宝：	刘道南
特刊封面/舞台布景设计：	郭挺劲

HAI-O

靈芝酒

一份关怀 无限温馨

海鸥灵芝酒代言人童冰玉
2006马来西亚中华小姐环球大赛冠军
2006中华小姐环球大赛最具文化气质奖

售卖处：海鸥 连锁店

AEON、 Giant、 AEON Big、Econsave、NSK及
各大藥行酒庄以及百貨超級市場。

电话：03-3341 9675 传真：03-3342 8285